

泥比邻 土邻 香

2015年3月
NO. 柒
社区伙伴出版

解·读 汉字里的生活

专题·青年导师

对话青年牛奶
生命的成长与陪伴
将精神发展带入社会转化的探索之路

见·远 把人当回事的经济人生
和平经济学

行动者 创造基于真实生活的文化





**泥比
土邻
香** 《比邻泥土香》第七期
2015年3月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出版:  社区伙伴
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地址: 香港九龙佐敦西贡街20号志和商业大厦13字楼

电话: 851-24580011 传真: 852-24307099

编委: 邓文嫦 陈宇辉 黄励 薛启婵

编辑: 高雪松 梁笑媚 陈靖

插画: 全海燕 罗靖

承印: 广州今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声明: 刊内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如需转载请联络: blntx@pcd.org.hk

网址: <http://pcd.org.hk> 往期下载地址: <http://pcd.org.hk/zh.hans/content/刊物>

(本刊使用大豆油墨及再生纸印刷)

《比邻泥土香》不知不觉成了“慢生活”的一份子: 一年一刊, 从头细说。恰好这几期都是在初春3月前后印出, 《皇帝内经》曰: “春三月, 此谓发陈, 天地俱生, 万物以荣”。可以在这个时候与大家分享这一年来我们采集来的故事, 犹如农夫和远朋分享历经四季而得的果实一样, 内心欢欣。

过去两期比邻的专题是“返乡青年”和“留城青年”。青年与可持续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们参与推动的是一场从个人而始、影响社会的“静悄悄的存在变革”, 青年人的成长在其中十分重要。

这一期推出的专题是“青年导师”。在许许多多的返乡青年、留城青年的成长和生活探索中, 都有很多导师的陪伴。当这些导师成为激荡荡湖面的一个个“小漩涡”时, 他们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 个人的改变、以至社会的改变, 就在这一场场盛宴般的相遇中展开。我们有幸请到了这些年来一直陪伴青年成长的五位导师出场, 并十分感激有十多位青年伙伴参与到与这些导师的对话中。专题文章是这些对话的呈现, 但不是全部。我们相信唯有生命之间的对话才可让那些沉入生活和时代的故事清晰起来, 让人瞥见新的自我; 而透过对话, 青年人也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和探索、甚而获得一个空间反观自己与这些导师的关系。专题的插画来自我们以前一位同事——海燕。海燕行走在云南乡间时, 就经常以画笔记录她与自然、与伙伴、与乡亲相处的点滴, 这次有缘邀海燕画下那些发乎生命深处的成长及对话, 为专题增添不少朝气和灵气。

这期《解·读》带来了一位新朋友——子绮, 她跨越学术与实践、台湾与大陆、城市与农村等多重界别, 解读“打工者社区”; 还有一位老朋友——罗靖, 比邻的插画师, 这期他再次以作者身份出现, 送上的一篇令人大呼过瘾的有关文字、亦是有关文化、有关生活的解读。

《见·远》以一组文章初步探索了“社区经济”这个议题。在主流的有关经济的论述中, 经济往往意味着资本、金融、增长、竞争、消费……但当我们细细梳理过去的传统、及如今多地涌现的新尝试, 我们发现经济其实是与人的生命价值、人与人的关系、自然生态等等紧密结合在一

起的。我们有幸能以舒马赫学院创办人萨提斯·库玛的文章《和平经济学》作为这个栏目的收尾，一语破的“金钱不应是量度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准”。

《行动者》一如既往的鲜活，感谢伙伴们的敞开和付出，让我们看到理念落地的过程，是如何透过不同的话题，聚集不同的朋友，从城市到乡村，从厨房到课堂……特别感激久别的老朋友——朱明，分享了他对过去工作的反思、这两年在云南的生活。提醒我们这些还在机构工作、在城市生活的人，不要在“可持续生活”这个答案中停步、蜷缩起来，唯真诚、用心，才可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文化。

《比邻泥土香》创刊于2008年夏天，至今已走过7载有余。这个过程我们感恩与许多伙伴相遇，交流彼此的故事。古人说“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我们深感自己的积累不够深厚，历经这几年“挥霍”，更加惴惴不安。所以今年我们对杂志作一整体回望，既不要忘了我们为何出发，亦期待对未来的路有更清晰的想象。各位老朋友、新朋友如果对比邻的选题、栏目设置、出版频次、发行和流通方式、设计风格等等有什么建议和想法，请发送邮件到以下信箱：blntx@pcd.org.hk。十分期盼你的分享和参与！

《比邻泥土香》编辑小组



目录

01 刊首语

解·读

- | | |
|---------------|-----|
| 05 打工者社区的萌芽之路 | 欧子绮 |
| 09 汉字里的生活 | 罗靖 |

专题·青年导师

- | | |
|---------------------|------------|
| 14 前言 | 薛启婵 |
| 16 对话青年牛奶 | 熊琼、杨国琼 |
| 25 生命的成长与陪伴 | 彭燕辉、宁佐梅 |
| 35 从工作的指导者到生命的陪伴者 | 陈志君 |
| 47 将精神发展带入社会转化的探索之路 | 孙国嫒 |
| 56 农的芬芳，还要一代代流传 | 詹炜、高雪松、张传辉 |
| 67 后记：寂寞繁华皆有意 | 郝冰 |

见·远

- | | |
|------------------------|------------------------|
| 70 导读 | |
| 71 把人当回事的经济人生 | 曾德平 |
| 74 小农与经济，或，小农的经济 | 周思中 |
| 79 城市的未来——英国转型城镇的思考与启发 | 严晓辉 |
| 延伸阅读：实践坚韧的力量：转型网络 | Julie Richardson 译/巫爱金 |
| 89 和平经济学 | Satish Kumar 译/张彩云 |

行动者

- | | |
|----------------|---------|
| 92 创造基于真实生活的文化 | 朱明 |
| 99 我的返乡青年探访路 | 小朱 |
| 104 朴门农业实践 | 张扬 |
| 108 城市故事 | 周娅 |
| 112 半塔社区的快乐厨房 | 阳光（谭依雯） |
| 116 机构刊物 | |

- | | |
|-------|-----|
| 封面封底 | 全海燕 |
| 专题插画 | 全海燕 |
| 非专题插画 | 罗靖 |

解·读



打工者“社区”萌芽之路

文_欧子绮

编者按

作者子绮出生于台湾，现正于美国修读人类学的博士课程，过去六七年子绮与北京的打工社区结下了不解之缘。2013年底子绮因为调研的需要，再次去到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¹在半塔村的社区中心，以半职研究员半职工作人员的身份生活了一年，与同事及社区居民发生了真诚的碰撞和交流。

这篇文章子绮参考了庄雅仲老师刚出版的新书《民主台湾：后威权时代的社会运动与文化政治》²中关于“社区”一概念的讨论，思考自己在北京打工社区工作乃至生活的意义。庄雅仲老师长年关注台湾的社区运动，在《民主台湾》一书中辑入了三篇关于台湾社区运动的人类学田野研究，思考十几年以来社区运动的限制与可能性。两岸的社会脉络虽然大为不同，但居民对安居乐业、更友好的社区生活的渴望是不分边界的，而从这里出发我们大概便更容易理解到子绮的思考与期许。

1. 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简称农民之子）是一家民间公益机构，由北师大农民之子社团毕业老会员于2006年创办，以打工社区青少年教育、自然教育实践探索和民办教师生存状况改善为主要工作内容，2008年创建半塔社区学习中心，探索平民化的教育实践。

2. 庄雅仲：《民主台湾：后威权时代的社会运动与文化政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打工群体的栖息地

夜已深沉，一辆公交车在尘土飞扬中驶来，阿飞的父母站在车里。每天上午六点，当阿飞和妹妹还沉睡着，他们早已起身出外打工。这时已是晚上八九点，他们刚结束手边的装修工作，从东三环的工地，换乘地铁辗转回到这位于北五环的城边村。

车停妥，门开了，疲惫的乘客像是鱼群，穿流挤过渔网的破口，巡游回到这个小小的栖息地。从公交站步行回到租屋处那不算短的一段路，或许是一天之中，少数属于阿飞父母的时刻。在烟雾四起、五光十色的主街上稍作停留，他们尝试为自己和孩子添饰一些温暖：秋衣、鞋帽、内衣裤，水果、蔬菜、腌渍物，烤串、面筋、麻辣烫。带着小小的满足，他们遁入一个又一个胡同深处，直到背影缓缓消失在昏暗的夜色之中。

阿飞一家四口住在一栋三层公寓的顶层，长廊里最末端的小单间。推开门，一张大床准备好承载着一家人的重量，阿飞的妹妹等不及见到父母，早已饿着肚子进入梦乡。在这十来平米的小屋里，有一台坏了几个月的电视、四五个碗盘、几张不成套的桌椅板凳。一个简单的炉灶搭在门外，爸爸下了面条做了一顿安静的晚餐。局促而温馨，这就是他们在北京的栖息地。

从流动人口聚居区到“社区”

数以万计的来京务工人员居住在北京的城边村，和阿飞的父母过着类似的生活。他们中有建筑、装修、家政、收废品、做小买卖等行业的中壮年打工者，也有在销售、保险、IT等产业就职的专科、大学毕业生。他们被赋予多种名字：农民工、打工

者、蚁族、白领、北漂……尽管来自五湖四海，由于房租和生活消费的负担，蜗居在城边村却成了他们共同的处境。城边村，是一个打工者住了十数年却无法称之为家的地方，是一个人们连怎么称呼都感到困惑的地方。

从外观上来看，它显然不像市里的社区或商品楼，也不再具有传统农村的样貌。它是北京城郊最杂乱丰富、野蛮生长的一道风景线，流动人口聚居区、城中村、倒挂村、挂帐村，是它在媒体或政策上的代名词。在坊间，甚至不难听到民工村、破地方等带有强烈贬意的称呼。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近几年，一个新的称呼悄悄出现：流动人口社区。当“社区”取代聚居区，新的命名提醒着我们，过去的暧昧不明和贬低之意，阻断我们真正靠近和认识这么一个地方。

它真的是“社区”吗？如果不是，什么样的过程会让住在这里的人称呼它为社区？当北京市城区里的居民已经熟悉社区一词，对于城边村的居民来说，社区还是十分陌生的称呼。对不少打工者来说，与草根社区服务中心接触，是他们第一次认识“社区”的概念。这些城边村里的社区服务中心，看见打工群体的需求，提供一个集合居民活动中心、图书馆、二手爱心衣物义卖、亲子教育、劳动维权、成人学习、社会交流平台等功能的复合空间。

将打工者聚居的地方视作社区，突显了这个群体所面对共同的机会和挑战。

“社区服务中心”不单单只是提供社会服务，它挖掘打工者共同生活、连结彼此、互助合作的可能，成为打工群体社会力量开展的场所。因此，在“第一届流动人口聚集区社区服务中心发展论坛”³上，北大社会

系的卢晖临教授归结这些中心的工作，认为他们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重建社区。

亟待重建的社会关系

流动人口社区需要重建，意味着居民之间最基本的联系，失落了。过去的城边村，多数居民拖家带口，密集居住在以平房为主的大杂院里。几户人家共同使用水槽、厕所等设施，邻居常碰面、能够打上招呼，但交往不是特别深。某次我和陈大姐聊天，很惊讶地发现，虽然她和四个妹妹一共五个家庭都住在同一个大杂院，但为了工作和家庭各忙各的，平时并不常见面。

近几年，不少城边村兴起盖楼的风潮。一栋栋出租楼拔地而起，强调厨卫网络齐备，吸引越来越多“小年轻”们入住。“公寓”里，幽暗深邃的走道两侧是一间间门扉紧闭的出租房，里头的主人早出晚归，便利却疏离，和城里的小区生活相似。阿飞家和几个老乡同住一栋公寓，爸爸平时工作回来，还能跟同样从事装修业的老乡说上几句话。至于我所认识的一些年轻人，大多把城边村当作一个下班回来睡觉的地方，甚至周末时也待在家里睡觉或上网，不大认识自己的邻居，平时互动的朋友也不多。

从这些对社会关系的观察可以发现，如果社区指的是“面对面关系的同质空间”，打工者聚居区远远还不是个“社区”，而是无数零散的打工者密集居住的地方。在这种条件框限之下，“流动人口社区服务中心”可以说是在真正意义的“流动人口社区”诞生之前就出现了。当居民还不能在北京扎下根，社区服务中心从寻找社区骨干着手，和骨干一同工作、共享生活、激荡彼此的“社区生活想象”。当一

群妈妈坐着挑菜闲谈家中琐事，当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筹办一场激动人心的社区音乐会，当大小朋友像是过年一样七手八脚地包饺子，居民在疏离的生活中找到与他人连结的线索，一种让人想起老家的温暖，一种地方感油然而生。

社区里外的生活想象、空间和权力关系

正因为“流动人口社区”有名无实，“流动人口社区服务中心”的努力，提醒我们必须从眼前疏离淡漠的人际互动、社会关系中跳脱出来，理解“流动人口社区”诞生的真正困境和发展可能。否则，我们只是将社区等同于“一种行政管理的形式”。⁴这就像是将社区等同于社区居委会，把对社区的理解局限在行政管理的范围内，因而无法看见不同的群体、社会力量、政策或政治等因素如何限制与创造真实的社区生活。

庄雅仲的《民主台湾：后威权时代的社会运动与文化政治》，有助于我们去重新思考“社区”这个大家习以为常的概念。⁵仔细检视台北市永康社区居民的社区运动，庄雅仲主张“社区”本来就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存在，而是都市空间中的一个“关系丛结(articulation)”。我们必须看见“社区”这样一个关系丛结，如何连结不同的生活想象、社会关系、空间意义、甚至是多种势力与权力的角力。

就像理解“流动人口社区”时，我们首先要检视它如何连结不同的社会关系、生活想象。尤其是暂时性的打工身份，如何使得城边村难以出现共同的社区生活想象。工友们常说来北京就是为了挣钱，盼望着有出头或是落叶归根的一天。就像阿飞的父母，把聚居地视作“睡村”，对于居

4. 郭净：《从社区故事说社区》，载《书写社区》，香港社区伙伴，2013年版，页14-19。

5. 《民主台湾：后威权时代的社会运动与文化政治》以作者二十多年的扎实田野为基础，从台湾政治、社会与经济变迁的过程中，分析民主、参与等抽象理念的具体在地实践。书中检视公共、本土、地方三类关键概念，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粗略地涉及书中第三部分关于“地方性问题”的讨论。

住空间和环境的好坏不是太在意。他们每日在外辛勤地工作，回到村里就只为了吃饭、洗漱、睡觉等最基本的需求，当下的生活只是为了过渡到未知的将来。

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不同势力与权力的交错、碰撞，如何形塑流动人口社区今天的面貌。当北京地产开发的范围像是煎饼越摊越大，土地变成最重要的经济发展资源，城边村拆迁只是迟早的事。然而，这种“征地—拆迁—开发”的城市空间变迁方式，通常排除了社会经济条件较弱的外来打工者。拆迁时外地房客没有任何保障，只能往更外环的郊区搬迁，而此时打工者的社会网络就得打散重组，进一步剥夺了他们稳定地开展社区生活的可能。

社区：对抗发展机制的力量

更为根本的困境是，由于外地人口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政策上受到种种限制，难以成为真正的市民。处在城乡之间的打工身份困境，使得居民认为自己在北京只是暂时、阶段性的生活；加上排除外来、低收入群体的城市发展策略，更使得打工漂泊成为主旋律，城边村的“社区生活”往往还没开始就注定结束。这些问题是“现代化、发展机制”的一种缩影，也是流动人口社区发展时最大的挑战。许多流动人口社区服务中心的努力，就是在扭转这种长达十几甚至二十年的“暂时”生活。

在一个注定拆迁、流动的社区，他们试着让居民产生地方感、社区感，渐渐能与“现代化、发展机制”相抗衡：不到商场，居民在爱心超市就能买平价实穿的二

手衣物；孩子不需上幼儿园，藉由社区妈妈们的力量，就有丰富的早期教育；不用到培训班，年轻上班族和家政阿姨都可以自学英语；不怕孤单，工友可以抱团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减少对外食的依赖，大小朋友一起下厨做菜、透过食物联系感情。在这些细微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社区服务中心不断创造社区的感动、在地意识或认同，并进一步形成“对抗现代化、发展机制的有效抗衡力量”。

然而，流动人口社区重组社会力量的过程，同时是漫长且阻力重重的。首先，当社区服务中心“替代”在地的社区组织（由当地居民自发产生的社会组织），成为社区意识的催生者，由它发动的社区发展是否良性、可持续？虽然许多社区服务中心将重心放在培养骨干居民，但如果骨干和核心参与者不能意识到自己主人翁的角色，在社区服务中心撤离后，社区仍旧很难动起来。

其次，如果社区发展只停留在以社区之名，没有社区的实质，是否还能催生出理想的社区生活？在不少城边村，“社区”已成了草根机构的代名词。有次我和陈姐带着她八岁的儿子去往社区学习中心，大姐一边走一边问孩子：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孩子笑容灿烂地回答：去“社区”。当居民在口头上将“社区服务中心”等同于“社区”，很可能他们仍然将自己的社区生活框限在服务中心的范围之内。

当城镇化的浪潮向北京城边村袭来，重建打工者社区的过程，正是一段异质和动态的历史。对抗现代化、发展机制的抗衡力量，仍在困境中生长萌芽着。■

汉字里的生活

文 罗靖



编者按

作者于2004年在成都华德福学校做了一年多的志愿者，之后到泰国的一所华德福学校担任中文老师，2010年回到广州，开始新的探索。吟诵和汉字是他近两年的“爱好”。

字书之缘

如果有人说不认得几个字，你会反驳吗？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反驳，只要上过小学，字肯定是能认识几个的吧！可台湾作家张大春¹却谦虚地写了本书《认得几个字》²（以下简称《认》），读罢此书，真心得承认自己认不得几个字。因此认字非彼认字，在这本书里，不会说话的汉字被作家父亲、年幼的儿子女儿三个人搅得活络了起来。这本书也是继十年前第一次阅读字书《汉字王国》³（以下简称《汉》）之后，第二次触动我的汉字书。如果说《汉字王国》是对我的汉字启蒙，那《认得几个字》则让我触摸到了一本字书的体温以及文化传承。

1. 张大春，华语小说家。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曾任教于辅仁大学、文化大学。现任辅大中文系讲师、News98电台主持人。曾获时报文学奖、吴三连文艺奖等。著有《鸡翎图》、《公寓导游》、《四喜忧国》、《小说稗类》、《聆听父亲》、《认得几个字》等。

2. 中国内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8月出版。

3. 作者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教授、作家和摄影家。1961—1962年在北京大学留学，此后曾数十次到中国访问。1971年起在瑞典任汉语教师，1978年后为瑞典电视台做有关中国语言的节目。现专心研究中国文化。出版有关中国的著作多部。《汉字王国》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中国文字的起源的特点，选取200多个与人的生活有关的字进行细致的讲解，如与人的身体、住房、器皿、丝和麻、家畜、农具、车船、道路等有关的字，同时分析和描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从而使人加深对文字的理解。初版于1988年，至今已被翻译成七八种语言，是西方人学习汉语的主要读物。

在《认》书里，作者摆脱了一般字书的程序，没有以文字学的研究去解字，而是通过他和他的两个孩子与汉字之间的生活关联来展开，有时我读到某处，会忍俊不禁，呵呵的笑出来！例如在书中有一名为《公鸡缓臭屁》的篇目，乍一看，此五字皆识，却全然不知所何事？读到最后才明白这是作者的女儿张宜在幼儿园创造的谐音，幼儿园老师在教孩子们吟诵《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老师解说这是“王之涣作品”时，孩子们用闽南语说就成了“公鸡缓臭屁”，他们觉得很好笑，我看完整篇后也觉得好笑。这让我忆起童年时大多孩子都有的改诗经历：我们会把李白的《静夜思》改成“床前明月光，地上鞋两双……”因为儿童在童年呀呀学语期，他不可能理解诗的意境，能带来感受的只是对词诗的平仄押韵及好玩声音的模仿发现以至创造，一旦有趣，他们就会重复。我觉得作家父亲是理解孩子的，他在文中这样写道：“孩子们不要诗，他们要笑，你不能让他们笑，就不要给他们诗，等他们老了，就回味过来了。我觉得幼儿园老师教对了，也并非因为那是‘王之涣作品’，而是因为孩子们自己发现的‘公鸡缓臭屁’。”

在另一个《西》字篇目中，当作家要准备用毛笔写字时，儿子张容问：“你不是只会打计算机吗？你忘了怎么写字了吗？”作者此刻想到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孩子为什么要认字？有没有比书写文字本身更深刻的目的？”

随后作者的答案是：“我想我不应该只是为了教会孩子写出日后老师希望她能运笔完成的功课而已，我应该也能够教的是这个字的面目，身世和履历，这些玩意儿通通不合‘时用’，也未必堪称‘实用’，但却是最希望孩子能够从文字里掌握的，每个字自己的故事。”所以，他给女儿

解说：“西字原来是指鸟巢，后来被借用来表示方向的‘西’。”女儿就问：“为什么表示方向的字要借鸟巢的家？小鸟把自己的家借给别人哟？这样好吗？”这么富于童趣的追问，是不是让汉字的寻根之旅因此而变得更生動也更有内涵呢？

《汉字王国》是我的第一本汉字启蒙书，作者是瑞典汉学家林西莉女士，她也是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学生，这本书很直白易懂，毕竟是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汉字的书。十年前初读此书时，除了惭愧还是惭愧，为什么当我们是孩童时，不知道我们的汉字起源是图画，描绘的是生活和智慧呢？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过外国人的描述才能与自己古代的文字相连接呢？那个时候，我还在成都当志愿者，再后来去到泰国做志愿中文老师，我开始在低年级教学中使用甲骨象形文字，并坚持在认字前不教孩子拼音，因为那个时候起，我就坚信拼音只是工具，是可以在年龄稍长时慢慢习得的。可是对于汉字的母体认知，让孩子从一开始就爱上汉字字形里的每一个形象，每一个构件却是比使用工具更深刻的事……可惜的是，如今的校园，早就把汉字和拼音当作工具带给了幼儿园的小娃娃，这让汉字的字形美，声韵美在年幼时没有机会感受到，等到年长时，感受的能力就没有了。

谈谈汉字之革命

在上个世纪初的汉字改革中，中国知识界的“热血有识之士”接触了西方，学了西学，觉得中国的落后除了没有西方的坚船利炮，汉字是另一大落后因素。持此观点并努力践行改革的有钱玄同、胡适、鲁迅、黎锦熙等众。其中以钱玄同最为极端彻底，他一度鼓吹要废除汉字，改用罗马拼音代替。他说：“什么是汉字之根本改革？就是将汉字改用字母拼音，像现在的注音

字母就是。什么是汉字之根本改革的根本改革？就是拼音字母应该采用世界的字母……”

当初的汉字改革有一大出发点，就是觉得汉字难写难记，要让教育普及，启迪民智，汉字非简化不可。可就是这样的出发点，让汉字从一种智能的载体沦为使用工具，剥离了汉字中蕴含的丰富信息资源。在《认》一书的序言中阿城先生⁴觉得张大春的这本书给了我们“小学(注：即为语言文字之学)的体温”，他也简单地回顾

了汉字改革的历史大事记，最后他说：“简化字的提出和最终实行，说明我们的思维是狭窄的，线性的，是一种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将简化字视为先进工具，在电脑输入的今天，这个理由已经不存在，而且从脑科学的图形辨识实验中，我们知道，区别大的形，易被辨识记忆，区别小，则易混淆，只有将中文字视为一种资源，我们才能从繁简字的工具论的辩论中摆脱出来，准备成为现代人。”

附解字笔记二则

壹

立冬前几天，下了点雨，淅淅沥沥的，气温明显是降了一层。之后虽转晴了，但早晚还是有些凉意的。每次傍晚回家，都要经过一个拐角的火锅食铺。这家铺子前些日子还食客稀疏，这几日却座无虚席，好不热闹，食客们的车把马路都占了大半，生意甚是红火。

他们在吃什么呢？

是在吃羊肉火锅……去年的冬至，也是在这家店，不怎么吃肉的我被家人硬逼着喝了一碗羊肉汤，吃了几块羊肉。说来奇怪，身体虚寒的我，汤一进肚，全身竟暖和了。母亲在一旁说：“吃了羊肉(汤)就不怕冷了……”为什么吃了羊就不冷了呢？羊这种动物带给人在生活中的文化究竟是什么？我查了相关的文字资料，从羊(以羊为部首)的字中有美，善，鲜等字，这些字的含义都非常的好，可见羊在先民的心目中是被赋予了相当美好的特质，可这依然没有解开我的疑惑：吃羊为什么能暖身子？一次，我在一篇讲中医里

4. 原名钟阿城，笔名阿城，1949年出生在北京，籍贯为四川江津，中国当代作家。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棋王》，短篇小说集《遍地风流》，散文作品集《威尼斯日记》、《常识与通识》、《闲话闲说》等。



古无阳字 羊同阳

的汉字文章里，找到了答案：古无阳字，以羊代“阳”。我当时眼睛一亮，豁然开朗。

在古人的生活 and 经验里，阴阳可以指代很多事物，且这些事物总是相互对应着出现，有阴必有阳。日为阳，月为阴，白天为阳，晚上为阴，温暖为阳，寒湿为阴，春夏为阳，秋冬为阴。在最寒冷的冬至吃羊，无疑能让身子觉得暖暖的——因吃羊就补“阳”气，所以，在这个节令，吃羊肉的食客爆满，也就不足为怪了……

贰

再说“新”字。要是让现代人造个新字出来，说不定会想坏脑门，何者为新？似乎无从描拟。我对“新”字的兴趣是偶于宫崎骏映画馆⁵的中文网页，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两位日本人的一番谈话，其中一位说他很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人造的“新”字是“砍伐树木”的意思？这是不是也为现在中国人为了发展经济而去破坏自然环境找到了继承的理由？

不废不立，不破不立，也常听人讲：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难道“新”字的字形意义真的是要把旧有的完全废除吗？

我试图去找自己的理解，新字右边是斤，有“斧”及“砍”之意，左边有木，自然是木属类，可砍的具体是什么东西呢？是一整棵树，还是树的一部分？砍掉一整棵树，怎么也不可能有新的含义吧，我继续寻思。

在广州，树木全年葱绿，也没有冬天，人是很难感受到四季的更替的。记得很多年前，我从五羊新城的天桥上下来，陡见栏杆边的树枝上有一颗新芽儿冒出来，那股新绿，着实让我喜悦，这新绿真能代表整个春天了。我想，“新”应是指这新冒出来的嫩芽儿新叶儿吧。我又忆起，曾经有果农说过：当树枝树叶很多时，是要给果树剪去旧枝叶的，目的是为了让新叶有更多的养料，所以，两种经验之后，这字的含义就慢慢清晰了：砍的不是整棵树，砍的是“残枝旧叶”，砍的目的是为了让新芽嫩叶更好地生长，此新之蕴意也。一意既明，心喜不自胜。

今年春节，我短信问候在云南生活的好友明。明说立春的时候，他的房东农家阿叔去剪枝了。我即回信息：立春日，嫩芽细叶乘木气而新生，农人持剪，去其残枝旧叶，以致不耗养分，助其新生，是谓伐木立新。

明复：百姓日用而不知。☺

新：伐木立新



专题·青年导师

5. 宫崎骏映画馆是一个网站，由几位网友成立于2005年，网站中收集整理日本吉卜力工作室作品及其著名导演宫崎骏的资料，并为影迷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前言

文 薛启婵（社区伙伴青年发展项目经理）

过去一百多年，工业文明以其大一统之势逐渐席卷全球，主流发展模式通过推崇消费主义来支撑无止境经济增长的神话，造成环境破坏、物种消失、乡村衰退、文化单一和贫富悬殊等问题。身处这个时代的青年，也在不自觉间被全球性的主流价值体系所洗礼，表面看，似乎拥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深究其后，其实到处都是陷阱和束缚。在广西，听现在的大学生说，从大一开始，学校就开设了就业指导课，四年教学都是围绕着就业进行，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在学校的考虑范围里，提高就业率才是关键；跟一些大学生志愿者聊天，他们说身边的同学不是沉迷于上网娱乐就是忙于考证、兼职、学生会，视参加公益活动的同学为傻子；再看现在的出国潮、考公务员潮，以及年纪轻轻的房奴、车奴，就知道当今青年的奋斗重心了。

在这个强调竞争、物质的时代，大多数青年的生命里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宏大的社会意义，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地位与物质财富的追求。但是，这真的就是青年的内心所愿吗？还是他们在现实世界里被裹挟的无奈？或是说青年有创造另一种追求的可能？在访谈钱理群老师时，他曾说：“青年的本性充满好奇、想象、激情，偏重于精神追求。”这些在主流价值里被压抑的部分，大概也需要有空间去释放和生长。

社区伙伴从2005年开始针对青年群体开展工作，即是希望支持青年去反思主流发展模式，找到个人生命成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结，去重新建构青年群体新的文化价值。不管外在环境和青年自身在如何变化，有几个问题都值得我们不断去探寻：青年对社会发展的想象是怎么样？他们期待成长

为什么样的人？青年如何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安身立命？

因为工作的关系，时常有机会与泰国NGO里的朋友碰面，看到泰国不同年代的NGO伙伴在一起，代代传承，相互支持，很是羡慕那样的薪火相传。一次，泰国朋友跟我们说，在泰国的NGO里，他们很看重“导师”（mentor）的角色，每个青年的身边，都要有一些相对更有经验的人去给予建议、指导或是支持。导师的角色，不同于同龄人之间的彼此陪伴，而是一些更有经验的“先行者”所进行的言传身教，他们用自己的信念、行动与经验，去支持年轻一代的成长，给予未来更多的可能。

过去这些年，我们有幸与众多青年伙伴一路同行，共同去探索关于上述问题的答案，因缘际遇，也在路上结识了很多一直在用生命陪伴青年人成长的导师。这样的相遇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和触动，让我们萌生了做一期“青年导师”专题的想法。希望通过青年伙伴与青年导师的对话，一方面，呈现青年导师的生命故事，记述他们如何理解青年人及青年人的成长，如何看待人的成长与社会改变的关系；另一方面，让对话与记录成为青年伙伴与前辈深度交流对话的过程，通过相互的激发与碰撞，给青年伙伴一个回观思考的空间，在看见前辈的同时，也能照见自己。

这期专题，我们邀请了五位不同背景、经验和视角的青年导师出场（虽然他们中有些人并不愿意这样称呼自己，但在以上特定的语境下，请允许我们姑且用之）：有笃定地要在水泥地上种出花来，给后来的青年一个榜样的台湾学长李易昆；有将心理学与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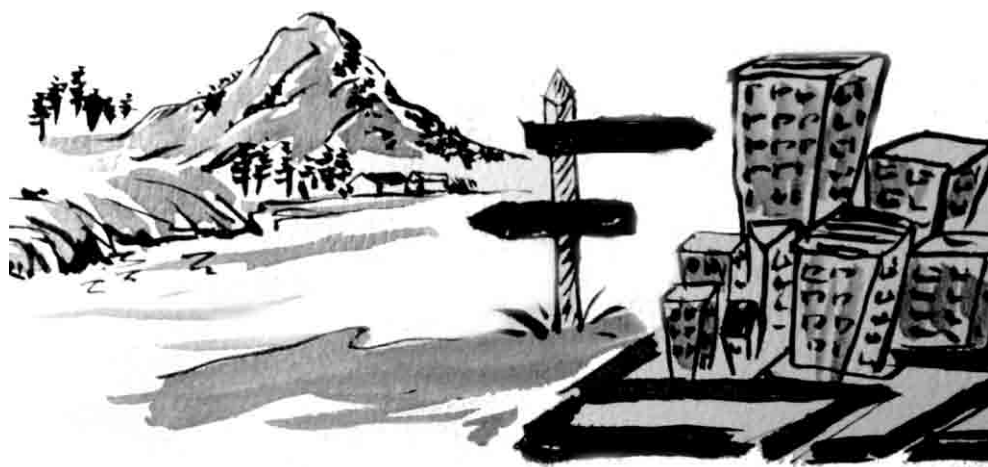
关怀融合起来，在个人成长方面给予青年人诸多支持陪伴的陆晓娅老师；有为乡村教育、公民社会几十年如一日奋斗，从大学课堂走向广阔社会，却依然实践着教育理想的梁晓燕老师；还有致力于以内在力量的建立来推动社会改变，以慈悲与爱关怀着年轻人的泰国姐姐P'Nit；以及在贵州传统的侗族村落，以长者的智慧与包容，努力为年轻人撑出一条留乡路的吴世先会长。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或严厉或温存，或激昂或平和，或坚定或从容，与青年人一起朝向梦想努力。在青年人眼里，他们是带领者，教育者，指导者，陪伴者，支持者……这些身份或许偏重其一或许兼而有之，也或许，所有身份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一直与青年并肩在路上，并仍将在路上。

与此同时，我们也邀请了十余位这些年与我们一起走来的青年伙伴参与其中，他们走在自我探寻的路上，同时也关心自己所属的青年一代与社会如何改变。他们分成不同的小组，分别与这些老师进行了形式多样的对话，在办公室、在咖啡厅、在田间地头，或是在共同工作的场景里，去深入了解老师的生命故事，聆听他们鲜活的思考，并与之交

流对话。受限于对话的时间或别的条件，有些青年伙伴的生命故事还来不及呈现在对谈中，抑或是老师们的话语太吸引人，大家的思绪也随之飘去，一下子来不及回到自身。不管怎样，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些对谈，已经成为了大家共有的经历和记忆，那些思考和启发，定将在回观自己生命历程之时慢慢发酵。

感谢所有接受我们邀请的老师和青年伙伴，过程中因为种种的限制，大概还有很多的遗憾或是意犹未尽，但那真诚地开放彼此生命经验和思考的对话，却可以让我们在有限的空间里，瞥见生命交互时互放的光亮。也特别感谢撰写专题后文的郝冰老师，她在百忙中细读了所有文章及参与伙伴的资料，为这期专题带来敏锐的观察与思考。为了更好地预备本期专题，我们邀请了多年的好伙伴高雪松加入编辑团队，她在过程里为对话的推进与文章的编辑投注了大量心血，在此也深表谢意。

很多的关系，在对话之前已经存在，更多的可能，在对话之后仍会继续。现在，就先让我们静下心来，享受那一场场的相遇和对话吧。☺



对话青年牛奶

访谈_熊琼、杨国琼

编者按

看台湾芦荻社区大学¹的网页，里面有很深刻的对于人的改变的论述，也有很鲜明的对社会发展的想象，再接触芦荻的掌门人李易昆，听他娓娓道来他的办学理想与实践经历，充满洞见而又风趣幽默，令人印象深刻。在这期专题里，当我们想写一篇台湾的案例时，脑子里一下蹦出了易昆的形象。正巧社区伙伴支持几位NGO青年工作者在台湾短期实习，熊琼所实习的组织便是芦荻社区大学，而在另一所社区大学实习的杨国琼也对易昆感兴趣，趁近水楼台之便，熊琼与国琼便跟易昆有了如下的对谈。

1. 台湾芦荻社区大学，1999年在台北县创办，芦荻为芦苇，取其柔软、坚韧、美丽之意象。芦荻社大是一所草根实验性的学校，探索新型学校的实验，为那些早年为台湾经济垫底的成年人，将其原先失去的学习资源，透过课程与教学网络（学习组织）的设计，输送到主动寻求生命转机的学员手上，启动他们为自我生命寻找另类可能的机会。



李易昆，台湾辅仁大学心理系博士。曾任台湾希望职工中心社工员、台湾劳工教育信息发展中心讲师、台湾行动研究学会理事长。现任芦荻社区大学主任、社区大学全国促进会常务理事，兼任辅仁大学心理学系教职。



作者



熊琼，社会工作专业出身。2006年赴安徽省阜阳艾滋病村做田野调查的经历，影响了她整个大学生活以及工作选择，促使她想去从事社工的职业，但后来因为种种机缘却进入安徽草根NGO工作。后来南迁广州，进入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继续她NGO的培力工作。熊琼曾描述自己，“关注自我成长和觉察，同时也在从事‘推动公民社会和社会变革’的工作，两者似乎不矛盾，但有时候却很难平衡，往左，被视作‘太关注个人而不行动’，往右，自己觉得不舒服，因为内心会认为社会要与个体相关联，为了宏大的梦想去拼去闯却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这个梦想跟自己有什么关系，甚至为了它而没了自己和生活，我觉得可怕。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出路，能连接起自己和社会。”



杨国琼，小时候曾经相信“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直到有一天遇到一个马来西亚留学生，蓦然发现历史和世界都不是原本想象的那个样子。在接下来的找寻自我的过程中，因为一个偶然的去农村支教的想法改变了人生轨迹，踏上了NGO之路。之后的十年，一直在重新学习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自己的成长经历让她相信：阅读、遇到一些不同的人以及志愿服务，能够为自己和这个世界带来改变。她不仅期待可以以亲身的实践，活出不同的价值观；更期待公益组织能够成为青年人实践另一种价值观的场域，而不是埋葬青年人理想的墓地……



写在访谈文字之前

文_熊琼

让我写易昆，我觉得有点困难，因为他太丰富了，而我知道得太少。想了想，就把访谈他的文字记录整理给读者，原汁原味，各自体会。

李易昆，又称泡屁——光从绰号就感觉到这人年轻时调皮捣蛋的样子。六十年代人，属于台湾社会运动中生代。台湾野百合运动时，他尚在大学，在广场上经验到政治启蒙，1991年毕业后开始参与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服务过外籍劳工，组织过工会。1999年，他参与芦荻社区大学的创建，此后一直扎根在芦荻社大，陪伴社区的民众一起走向身心的“解放”。

第一次跟易昆约谈时，介绍我们有个任务要采访“青年导师”。他哈哈笑，直说自己“不敢称导师”，只是“多走两年的学长”，能当一碗强壮骨骼的“青年牛奶”就很好了。的确，和易昆相处非常自在，他不会因为年长几岁而让人有距离和敬畏感。你可以跟他讨论很多事情，哪怕是在别人看来比较愚蠢和幼稚的事情，他都会认真地听，认真地跟你谈。当然，如果有酒一壶，就谈得更酣畅了。我们访谈易昆的时候，围坐在芦荻社大门前的平台上，没酒，只能就着一壶月光畅谈。

访谈时，问起泡屁成长过程中对他影响比较大的老师们。他说，有一次他送一位老师回家，两个人对饮高粱酒，聊着聊着就聊到“诚实”这个词，听到这个词时，他愣了十分钟，内心被震撼到。这个词，在他之后的生命过程中很重要。他说，“我不是一个很彻底的人，我身上有很多小资产阶级的习性。诚实地面对我很软弱，很多东西没有过关。包括愿意勇敢地面对事情原来是什么样子的。后来，觉得诚实不仅是人生的原则，而且还是一种方法，想想看，行动研究就是这个。行动研究不以事先预设的框架来理解事物，而是准备从事物中发生。我的脚走到哪里，我就准备从这个实际的现象当中发展出知识来，不带既有的思考去看事情。很多时候也许我走了一年，三年，五年，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说不上来，心会慌。于是心慌慌的

时候，勉强给自己一个诠释：我做了什么。这其实都是搪塞。有些时候真的面对实际发生什么，是需要勇气的。包括面对某一种焦虑，自己一事无成的焦虑，自己什么都不懂的焦虑，都需要诚实的勇气。”他还说，“有人问，‘你蹲在芦荻这个小学校干了十五年，那你培养出几个学生来？你这个学校还寄生在某一个国小里面，有一天说赶你走就赶你走。这十五年你干了什么？’坦白说，要诚实面对这个事情，有可能结果就是零。或者说不是零，那又是什么，有很多可能。不管是哪一种，我得真诚地面对这十五年干过了什么。如果有一种可能是零，我准不准准备接受它？也得接受啊！但是不能否定掉我曾经真诚的投入。”

这段话，我没有放进采访稿里，因为当时谈的时候，我们觉得没谈清楚，诚实像是一种感觉，玄而又玄的样子，但是这种感觉对于易昆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我们不懂。之后，整理采访稿的时候，我发现这是整篇访谈里面最触动我的。

我在NGO工作已经五年多了，离三十也近了，常常有一种一事无成的感觉，还有身无一技之长的焦虑。陷进焦虑中，自我否定掉这五年多的过程，其实蛮痛苦的。因而一度想要离开这个行业，想要寻找新的方向。看到易昆对诚实的解说，我问自己：你愿不愿意诚实面对，虽然你努力过，但是的确这五年没有做成你期待的事情，也没有你期待中的成长？当我接受这个事实时，突然觉得放松好多，不纠结过去，就从当下继续往前。

除了“诚实”，打动我的还有他对他人不同“生命状态”的理解和适时的“陪伴”。这点在访谈中也能看到。记得我在芦荻社大实习的时候，每次会议时团队都会谈到在芦荻实习的年轻人的情况。有一次易昆对团队提出一个问题：“现在的实习跟他们的生命状态有什么关系？”我愣住了，天呐，“生命状态”！我在之前的成长中没被这样关注过，也不曾这样关注过别人。易昆如是问，也如是做，在之后的一次以实习生为主体的活动中，他了解这群年轻大学生的近况和想法，动员他们承担起活动的主体角色，不要对活动成败有太多焦虑，启发他们“将过程当做田野行动”，“从实践中发现新认识，累积成知识”。他真诚地关心这群青年人的生命状态，尽力地为其创造学习空间，尽职地承担督导的责任，这种态度让我很感动。

易昆比我年长，他有很多对生命经验的体悟，我很喜欢跟他聊天。诚如他所说，他就是“多走两年的学长”，他的生命经验只是分享，可做对照。他不是导师，是朋友。期待更多的青年朋友认识他。

问：易昆，你都会做哪些与青年人相关的工作？

答：我带着一群青年朋友一起工作，也在大学里兼课。另外身边有一些有志于投身社会实践和社会运动的青年人，不管他是来自其他组织还是个体，只要能帮上忙我都会帮忙，这种时间花得还挺多的。他们可能在种田，可能在当公务员、读研

究生，无论他们现在做什么，只要想推进一件事，来找我谈，我就想办法跟他一起工作。是一种广义的青年人工作。

问：你为什么要做青年人工作呢？

答：（哈哈）看到年轻人就开心啊！另外，这个事情我把它视之为任务，是在工作中我们必要的工作环节。对外我们要开

拓,发展方法,对内也要有能力带领青年人,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带人的时候我也在学习,我得要更有效地提炼实践的知识,好让这些知识对青年人有帮助。因为我有具体的对象,要带他们,就会回头看在实践中我犯过哪些错,希望青年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这样反复对照,对我的学习其实帮助挺大的。

问:为什么你要用“青年牛奶”来代替“青年导师”呢?“青年牛奶”是什么意思?

答:我不敢称自己是导师,真的是师兄,或者学长。即便我比我的同事大十五岁,已经隔了一个世代了,但我感觉自己就是比他多走两年的师兄吧。我不一定对,也不一定都懂,只是有些事情稍微笃定一点,有些把握。但很多事情我也不是那么清楚,我也在思辨。所以跟他们更像是伙伴。我就说我们讲“青年牛奶”好了。牛奶是让骨骼强壮嘛。我当“青年牛奶”,帮助他们骨骼成长。当然真正的骨骼是要自己长的,如果你有一个师兄姐或老师,真的对你的骨骼成长有帮助,剩下的你也得自己去长。所以前提是他自己想要成长,把成长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身上。用牛奶作为隐喻还有一层意思,即使牛奶有营养,也不是人人都能消化吸收,有些人喝了就要拉肚子;我与青年人的工作也是如此,我主观上希望能帮上忙的东西,有时候是人不对、有时候是时间不对,不见得总是能有帮助。

问:那在你陪伴青年人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答: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带掉了很多人。从你的成长历程中,可以想象一个青年人有多少困惑。如果你有一个师兄或者学姐带着你,你可能会期待他可以解惑、对话、相互思辨,因为青年人自己那时想不清楚。可是我刚开始当别人学长时,不

见得能立刻做到那样,有一些学弟学妹在现场遇到了困难,我未能及时帮忙,他们很感挫折,我未能及时支持。在我年轻的时候,三十出头的时候,还不能明白,什么时候该紧,什么时候该松,什么时候该鼓励,什么时候要跟他一起整理经验,什么时候需要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你行,不能退……”总之没能适当地帮上忙,后来有些人就离开了。

问:你说带掉了很多人,是不是你对青年人的成长有某种道路上的期待?

答:期待是有,比如希望我的青年伙伴能长得更好,更强悍一点。当然最高境界是没有期待。但对于走什么特定的道路,倒不会期待。比如,年轻的伙伴不想搞社大了,想要去做其他,都可以。那不是我真正在乎的,我在乎的是他们是不是真正地诚实地走一条发展自己也发展社会的道路。我带他们不是为了接班。他们也是在实践自己的人生道路。诚实,认真,自我改造,想要朝向一个更好的生命,追求成为更好生命的同时也不放弃对社会进行变革的工作,我认为这是我对年轻人的期待。这个道路不一定在NGO。我在辅仁大学上课,那些学生才大二大三,更多是在思辨自己作为大学生在社会中的位置,如果他们能够更诚实地想这个问题,我认为更重要。不要说妈妈让我干嘛就干嘛。对自己诚实很重要。

问:台湾有许多青年人似乎特别喜欢抗争的议题,喜欢上街。这一点你怎么看?

答:这很正常啊,但是不能停留在这里。我也有一些学生,他们虽然没怎么了解某个议题,可是一听到说,某一天警察会驱离、可能会有冲突,他们就去现场冲。似乎那一刻他们特别能感觉到自己的某种存在感。我可以理解这是他们身体的感觉,我也完全尊重这种感觉。但是不能停留在



在不同时代里不同的年轻人都有对他们那个时代的苦闷……

这里,因为身体感觉能量释放完毕也就结束了,不会有什么推进。我跟他们讲你们不能停留在这里,还是要想,你这个身体感觉是什么意思,要反复对话,思辨。

我认为我是理解青年人的苦闷的。在不同时代里不同的年轻人都有对他们那个时代的苦闷,用他们的身体直接冲撞完全合理,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这一代的年轻人去抵抗怪手,去和警察推挤。而在我还是个年轻人读大学的时候,很多朋友把他们的身体感觉强化到某种极致,譬如用烟头去烫。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拿烟头烫自己,但又不是直接按下去,而是非常靠近皮肤,好像汗毛已经被灼烧,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压抑的状态,你可以想象到那种生命的苦闷。他跟我说,只有这样,他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青年人面对时代的苦闷,迷茫,是每个时代都有的,他们都要寻找出路。以身体寻找出路的方式,是最直接的,只是不同时代的表现形式不同。不过不能停留在这里。要不然只是年轻浪漫的心,然后被体制驯服了……如果没有前进,用烟头烫自己,写几首诗,飙车,完了啥事都没干。

我们的政治性没有被拿起来,没有把它转化为社会变革的力量,就只是一个愤青,然后从愤青过后,变成一个世故圆熟的青年人。所以我认为,要从愤青到愤中再到愤老。愤怒不是在原始阶段的,只能用身体作为对抗的,而是要到最后建立一种以对世界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主体,到那时候我知道我是谁,面对吃人的体制始终持续要磨去你的反抗意志,怎么样我都不会服从,这是一种真正的野。

问:那么从过来人的角度,你怎么去陪伴和支持这一代的青年人呢?

答:陪伴和对话。他的感觉是什么,我不去否定,这样至少青年人愿意跟你讲话。青年人最怕他一讲话,你这个学长就开始否定或者谆谆教诲,基本上我是不干这样的事情。我是真心想要了解他是怎么想的,怎么感觉的,会不会害怕……我会跟他对照。例如他们这一代跟警察对撞都不会害怕,我做了这么多年社运,但是遇到警察也会有深层的害怕,看到盾牌,这是代表着国家机器铜墙铁壁的工具,我骨子里会害怕,我会好奇他们为什么不怕。他

们会纳闷说，泡屁你搞运动搞那么多年，还会害怕啊。然后我们就有机会对照。我没有陪伴的具体方法。但陪伴作为相互的关系和理解，是在发生。

问：前面提到你用自己的经历跟现在的青年人对照。接下来可不可以聊聊你过去的成长经历？比如你的政治启蒙是怎么发生的？

答：我的政治启蒙是在广场上（开始的）。1990年是台湾野百合学运。我只是参与学运的学生中的一个，当时在现场当志愿者发板凳、发便当。学运人很多，辅仁大学去了很多人，新同学来需要有人招呼，我就主动地去招呼。当时做任何事都是主动的，没有人布置任务。

在此之前，大二大三时，还处于脑袋昏昏的状态，想要世界变得更好，政治变得更好，就觉得一定要有权力。可是权力怎么来？（当时觉得）一定要进入体制，一步步往上爬，你不可能推翻它，就要循着体制往上爬，到了某一个高度，取得权力，然后改变它。

可是，在广场上我经验到一个事情，在广场上像我这样的学生很多，七八千人，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其中还有几次广场上的全体会议。比如有一次上面决策中心说李登辉后天要见我们，我们是见还是不见？于是大家以校为单位，一群一群地讨论，然后一级一级选出代表，由代表上前去表达我们的观点。好有意思！虽然我们都是很小的大学生，但是集合起来我们可以做成一些事情。这件事情让我很激动，这些小老百姓团结起来还是可以做些事情的。我的政治启蒙就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

我还有一个政治启蒙就是：不一定先讲道理，而是先讲感觉。如果我已经有感觉，但是还讲不清楚道理，宁可以感觉优先。这也是在广场上学习的。举例来说，我闻到空气里有人烧垃圾的味道，不舒服，

到环保局检举，但是他说排放的废气完全符合环保标准，那道理是讲不赢人家了。但那就错了吗？不是，你的感觉是对的。在广场时，我们都很小，很多事情不能很有条理地讲清楚，但是大家有感觉啊！

这一点特别有政治性。比如政府说，你觉得我的政策不好，那你提出一个方案来啊。可我凭什么要给你提个相对方案来，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啊。我们在讲知识霸权如何作用，就是趁你还没有讲清楚时镇压你。我的意思是，人类文明的推进是感觉优先于思辨的。

这两点都是没有人教的。

问：那工作以后呢，年轻时最让你困惑的又是什么呢？

答：1991年，我大学毕业之后，开始进入天主教的劳工中心，主要做服务工作。礼拜天，劳工朋友来做弥撒，我就烧开水、烧红茶，准备板凳、点心。之后他们被警察抓到了外国人收容所，我去见他们时，就会像乡下的阿伯一样，摩托车后面载个购物的篮子，带很多生活用品，比如吉米让我帮忙买牙膏、莎莉让我帮忙买电池等等，发完再登记他们需要的东西。我那时候好困惑，这叫什么社会运动啊？！

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我很痛苦，边抵抗边想办法弄清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我边做服务边想，在帮他们买东西发东西时，还会跟他们发生很绵密的交流，其中有个姑娘，我好喜欢她，长得很正的，是马尼拉大学毕业的。我就懵了，马尼拉大学在他们国内是很好的大学，相当于台湾的台大，她还是硕士，干嘛要来台湾打工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她说在台湾打工钱很多。当时有很多是属于这个世界怎么运作我都还不懂的规则，但在具体服务的过程中，我看到某些矛盾的现象或者某种表现形式。那些问题让我思考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慢慢弄懂

了，在国际间，在不同环节上是怎样的一种控制，资本家是怎样剥削的，而且剥削还是跨国界的，然后通常是什么样的企业会引进外劳……这样就进入对现象背后问题的理解，于是意义感就出现了。虽然我通常还是给他们买机票啊，牙膏牙刷啊，但这个背后的意义感是不一样的了。

问：感觉人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困惑，从你前面提到刚工作时对服务的迷茫，到后来办社区大学推动成人学习，中间又经历过什么新的困惑吗？

答：2004年，我经历了一个恐慌，这个恐慌基本上是因为我无法确认我在芦荻社大是推动一个什么样的运动，我在做什么，这条路会走到哪里去。一群成年人来学校里唱唱跳跳跟社会运动有什么关系？我好像只是在服务他们。这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说不出来。那段时间我非常严肃，很紧。

我为什么对放轻松很有感觉，因为我从前是一个非常不能放轻松的人。我的对错感是非常紧的。感谢2004年的那些恐慌，真的是把我本来有的坚持都给抖落了。那个时间点，我来芦荻社大已经五年，我们的各种业务已经上手，维持运作没问题，可是我们到底要干嘛，我们这个学校要发展成什么样，我们是怎样一种社会变革，我们要走到哪里去……这些问题当时已经非常迫切了。从第三年我已经觉得非常迫切了，何况已经到了第五年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没办法，所以就爆了。

爆了有什么具体事情发生吗？其实没有，就是有一天我洗澡的时候，正在洗头，然后恐慌就来了，慌到不知所措。

那个经验对我来说有几个意义。第一，你千万不要那么自大，不是什么都能控制。（你以为）你的心情能控制，你的情绪能控制，好像你做任何工作成败也能控制，可千万不要那么自大，谦卑一点。以前

睡不着我就吞安眠药，回到家不能放松就喝酒，晚上不能把自己心情静下来就看电影，我用各种手段对付。但实际上人的心情需要对待，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我从来不觉得我要放轻松，我要好好地去散步。我总是要求速效，喝酒把自己弄晕，赶紧睡觉。为了讲究效率，我不喝啤酒，喝啤酒把自己喝醉太没有效率了，要喝白的，比较有效率。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恐慌刚来的时候，我想喝酒，可是来不及了，我发现我做什么都处理不了它。最后，就只能松手，let it be。持续了三四天，心慌慌的感觉。

第二点是不要那么快地判断对错，不能总是执着于对错，执着于现在该是什么进程与阶段，有些时候要接受失控。后来我给自己开了个药方，就是随遇而安，也就是我应该学习接受现在我所是与我所处之境。倘若我一再抱持着社会运动该如何如何、群众组织工作该如何如何等等种种我对于社会运动的发展的应然想象，我只会被眼前的现实一再挫折，好像只有发生与我期待相符的事才算是前进了。这样的思路不但没能推进工作，更是昧于现实。

因为这个恐慌的经验，我才稍微放松下来。我再去看社大的大哥大姐们在玩什么，放掉原先的看法，把眼光投注到他们身上。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当你紧抓着什么是对错，你根本学习不了新东西，没有新发现。这是我非常深刻的体会。当你放松以后，你的状态会改变，你在人群中的状态也不一样，你会听得懂别人的话，哦，原来他是这样看事情的，很有趣。

所以，放在我的实践与台湾社会的脉络中来看我的恐慌经验，这个恐慌不是我偶尔地发神经病，完全不是个人的情绪经验而已，而是情绪的政治性表达。诚实地面对现实是需要勇气的，特别对于我们从事社会变革工作的人而言，诚实面对更是严格考验。我们的工作到底对社会发展起

到了什么作用?我们的工作是否对人有益?会不会只是我们一厢情愿地投注心力努力工作,但其实只是原地踏步?特别是我在芦荻的工作中,这是一个以学习与个体发展为媒介的基地,不容易立竿见影,本来就是个缓慢的过程,我过去没能打开对于社会运动的想象与执念,于是实践工作的困顿与焦虑,累积久了便以恐慌这种激烈的表达形式展现出来。

关于我这些实践上的种种困惑,放置在台湾社会的具体脉络与背景里,特别令人感到心焦。持续地投注了那么长时间的努力工作,累积性的成果很不明显,消费文

化铺天盖地,文化成为商品,革命的话语也可以成为广告词。台湾社会看似多元开放,事实上是快速消费,各种讨论看似百家争鸣,但却是真伪难辨。我们在芦荻的工作,常常看来无异于主流媒体里所报道的教育服务业。我们在社区小群体中的实践工作,更像是在水泥地上种花。

“似乎总让人看来是白忙一场”其实是个发展的焦虑,也是在台湾社会这样的环境下,实践者会有的困惑。但在大陆,由于她特有的社会发展进程,大陆青年会感到如是的困惑吗?或是有别的困惑呢?辨识困惑本身即是重要的实践问题啊!



对话后记

文_杨国琼

上面这段跟泡屁的对话,已经是十个月之前的事儿了。这十个月我跟熊琼都有很多变化,熊琼升级做了妈妈,而我,离开了之前服务的机构,变成了自由职业者。在经历这样一个选择的过程中,跟泡屁那晚的对话时常会闪现出来。有时候会担心,会不会我已经变成了那个被“带掉了”的青年人?尤其是对于泡屁提到的“恐慌”二字。似乎自从三十岁以后,就一直没能从这种感觉中走出来。刚开始时还能自嘲一番是三十岁的青年危机,可时间久了,怕是无病呻吟,更何况我还得面对带领比我更加年轻的青年人,于是便不再把“恐慌”二字放在心上。有时还有点担心,过多地关注个人内在的这些焦虑与恐慌,是否会削弱外在的行动。我对自己的期待可是一个实践者,而不是多愁善感的林妹妹。不过,我真的很喜欢这些台湾的前辈们,他们都是非常努力的行动者,但是跟他们在一起你感觉不到压力。我也很希望能跟泡屁一样,做一个松而不紧的人。而泡屁谈到的他自身的成长经历也让我相信,这种转化是可能发生的。☺

生命的成长与陪伴

——对话陆晓娅

访谈/文_彭燕辉、宁佐梅

编者按

虽然没有参与到两位青年协作者与陆老师的访谈实境中,但从后来形成的文字里,依然感觉身临其境,仿佛能亲身感受到陆老师亲切舒缓的态度,以及对话中给人的恰到好处温度和力量:青年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感到的困惑和无力都有正向的价值,都是理解自己和他人生命状态的契机;青年协作者与他们互动的青年人之间,也正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陪伴,我们要做的就是支持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每个生命在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中探索生命不同可能性,发现人生的价值感和意义感。



陆晓娅，曾经是报社码字的（《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曾经带领志愿者坚守青春热线18年（官至“线长”，志愿者团队在首届评选中获得“北京十佳志愿者”称号）；曾经参与很多公益机构的培训，并在退休后创办公益机构北京歌路营，服务处境不利的青少年（现为理事长）。现在照顾失智老妈之余，在NGO打零工，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影像中的生死学”公共选修课。




彭燕辉，别名燕子，目前从事性少数权益倡导工作。2007年开始工作以来，一直在“人的成长”与“社会运动”两边挣扎。一方面很喜欢做人的陪伴的工作，与人温和地相处、见证其自身的变化，让我觉得很有价值，尤其在看见不同的人去冲破生命中各种束缚的时候。但同时自己还不能接纳社会改变的缓慢性，试图跳脱这套人的成长的框架，去参与社会变化的行动，但换来的就是不断的纠结与挣扎，预计还需要经历一段生命过程……



宁佐梅，还在北京林业大学读书时就来到绿色大学生论坛做志愿者，毕业时，带着“和机构一起成长”的期望成为全职。尽管后来在工作中也遇到很多挑战、压力和困惑，但每次回想起自己当时这个果断的决定都更加相信：青年人要成长，重要的是不断探索自己的可能性。目前担任绿色大学生论坛总干事，全面负责机构的战略发展、机构治理、团队构建和管理等工作，也负责个别重要的项目。机构致力于通过提供培训、环境实践、交流等方式，培养有志于在环境保护领域探索和实践的大学生。



我们之前主要是从青春热线和歌路营的相关“传说”开始知道陆老师的，据说这两个团队在支持青年人成长方面都相当特别，陆老师的心理学知识及她的经历，如何影响她与青年人的互动？她陪伴青年人成长的经验，对我们这一辈的青年工作者会有何启发吗？

我们带着这些问题，想跟陆老师一起聊聊。见到陆老师的时候，她一身简单朴素的衣服，始终微笑的脸，让我们完全被她身上自然而然的亲切感所包围，之前的忐忑不安一下子就没有了，感觉就像一位很久没有见面亦师亦友的伙伴。

看见不同年代的青年人

文化大革命对那个年代的青年人影响很大，陆老师是其中之一，她15岁就离开北京到陕北上山下乡了。文革后《中国青年报》复刊，陆老师通过公开招聘考进了报社工作。她先后在文化生活部和科学部当编辑，后来创办了“青春热线”，开始了青少年心理支持的工作。是什么让她产生了办热线陪伴青少年成长的念头呢？陆老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采访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他插队时就结了婚。文革结束考上大学后，他的妻子要和他离婚，他一时失控，捅了老婆一刀，结果被判了刑。他和我聊起这事说到，如果当时像国外一样有条生命热线，在他需要的时候能够咨询开导，（激烈的反应）可能就不会发生了，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热线）。”

1991年11月，在心理咨询专家和志愿者们支持下，陆老师创建了面向青年人服务的“青春热线”。

“（青春热线）什么都聊，从比较抽象一些的，比如说人生的价值、意义，到很具体的，比如说失恋啦，和好朋友闹别扭啦，上级搞不定之类的，也有不想活了来咨询的、同志话题等等。大概是2008年，我们还做

了一个接线内容的纵向研究，发在《中国青年研究》上。”

说起90年代，让我们想起了崔健的歌，想象那时的青年人内心的躁动、对独立精神和自由的向往与压抑的环境之间的张力。当时的青年人和现在的青年人有何不一样呢？陆老师觉得社会是有变迁的，现在青年人选择的自由更大一些，生活更丰富一些，交流方式也更多一些，而那个时候青年人的信息量和交流表达的途径少些。但是不同时代的青年人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也有很多共同点，爱情、职业发展，永远是青年人最主要的问题。

陆老师提起她接触到的一个青年人，当时大学毕业了，决定给自己一年“间隔年”，参加一个公益项目。

“他说他很迷茫。我问他，‘迷茫是怎么来的呢？’他告诉我，‘同学考研的、考公务员的、出国的、创业的，都已经该干什么就去干了，可是我还不知道我自己干啥呢。’

正好当时在大学体育场的跑道边上，我就说，‘似乎大家都在跑道上各就各位了，是什么使你 not 把自己放到跑道上呢？’

‘我觉得他们的生活一眼都能看到未来是什么，但好像都不是我想要的。’我说，‘哦，原来你还在寻找不同的道路。’

我们通常会觉得一个人不应该迷茫，但我看他的‘迷茫’有正向的价值。迷茫，是因为他在独立思考，不想随波逐流。父母说什么、社会说什么，就跟着走了的人，反倒不迷茫。”

“选择”是各时代的青年人面临的共同难题。但要如何在整个时代的背景中去理解个体的“选择”呢？是进入大潮、是被裹挟、还是挣脱束缚？

看见不同年代的青年人不是为了去区分和比较，而是为了更好地去理解“人”的处境，去想象我们的青年人工作还可以创造一个怎样的社会面向。

支持青年人的个人成长

“青春热线”似乎是一群较成熟的青年人和一群较年轻的青年人之间的相互陪伴。

“‘青春热线’除了陪伴电话另一头的人，反过来看，也是对志愿者的陪伴，他们当时大部分也是很年轻的，还有一个当时18岁。志愿者自身也有成长的需要和课题。”

陆老师找来一些资源，开始了与这群志愿者的相互陪伴：从讨论个案到后来加入了个人成长，通过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自画像等活动，帮助大家自我觉察和自我发现，理解自己的生命状态，看到自己的特点、优势和限制，找到需要突破的地方。个人成长成为热线志愿者培训中的重要部分。

陆老师就从创办热线那个时候开始学习心理学，上硕士班，上博士班，后来有更多的机会不断参加培训，例如萨提亚模式¹，叙事治疗²等等。课程从了解自己开始，而不是从理论开始，让陆老师体会到自我成长的重要性。她细致地和我们分享她的理解：

“心理助人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我这个人。我们自身越健康，越整合，就越有能力去帮助他人。青春热线是陪伴青少年成长的，所以我们志愿者的自我成长非常重要。我们要理解自己助人的动机来自哪里，自己有哪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有没有一些重大的创伤，面临着哪些重要的成长课题。志愿者的自我成长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也让他们在助人中变得更加敏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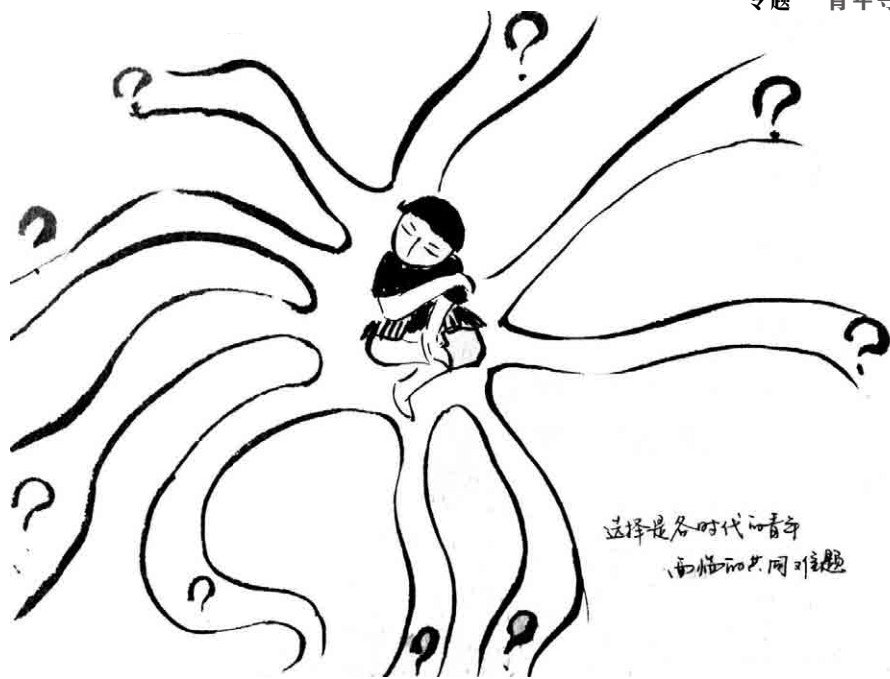
NGO的培训有很多是参与式的，很少是一个老师在说教灌输。心理咨询中的团体咨询，每个人也都会参与其中，运用团体动

力和真实的人际互动，来促进自我觉察和改变。两者在形式上有一些相近，但两者的焦点不一样：NGO的参与式培训考虑比较多的是社会问题，或者说机构怎样做得更好，比较少将焦点放在机构中的人要怎么样；但是心理辅导对自我觉察做得更深，会去了解人在生命过程中遇到过哪些事情，这些事情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可能有些影响是比较好的，但是也有一些可能限制自己。

青春热线志愿者培训中，个人成长做得比较深入。歌路营的青年领袖营也做了一些，包括帮助他们去了解影响自己生命发展的因素，即便是团体活动，回到个人层面，也比其他机构做得要深。我们做生命之树是很正向的，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根、自己的特质、自己的资源，对他们后来的发展是挺重要的，例如对个人的价值观的发展。在我们的青年领袖营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机会和任意一个导师单独交谈，这个交谈本身有一些辅导的性质，有一些团体中的冲突在那个时候会得到反思。冲突可以帮助人很好地自我觉察，如果简单化地处理，能够带来的成长也会很有限。”

我们在工作中经常听到NGO工作者问：“这些‘个人成长’的内容，跟NGO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并用这句话当作不愿意做“太多”支持人成长工作的“原因”。我们自己并不认同这样的“原因”，也为此与陆老师探讨。她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

“NGO很自然地关注社会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在无人的环境中做事，一方面我们服务于他人，另一方面我们也需



要他人的支持。NGO的工作者可能会遇到很大的压力，比如来自家庭的阻力，做着做着做不下去了，这背后是不是与我们这个‘人’的自身相关？我们是如何与他人互动的？我们的行为是让他人更了解我们，愿意支持我们，还是相反？在我们的努力付出背后，有哪些需要？如果他有很强的获得社会赞许、通过社会赞许得到自我认同的需要，就不容易扛住压力。能认识到这一点对做NGO很重要，因为有些时候，你觉得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别人不一定也有同样的感觉，当你得不到支持时，就会感到自我挫败，那个没有被满足的自我认同的需要就会跑出来，让你产生很多抱怨和指责，越发不容易和周围的人处理好关系，工作起来就越困难。

我觉得支持青年人去自我探索很重要，这可以赋予他们动力。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有许多选择，为什么你要选择来做公益呢？这个动力除了社会层面的，也要看到每个人一定有个人的层面的。要了解，这个过往的经历和自己生命之间的关系，哪些是可以帮到你的，是很好的，是自己的特质、资源和力量，还要看到哪些是需要超越的。所以，自我成长虽然不是解决具体工作中的问题，但支持青年人的自我探索可以帮助其把工作做得

更好。前不久我参与了一个志愿者的培训，他们在帮助一些有创伤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志愿者说，她在工作中感觉自己和孩子很疏离，投入不进去，她也特别难过。我和她一起探索，她觉察到‘难过’的背后是害怕，害怕最后要和孩子分离时彼此舍不得。她意识到了，就能够更好地面对和处理分离，而不再无助和自责。”

陆老师的话让我们想到，我们在做青年人工作的时候也会放入类似的内容，但是常常陷入到死胡同里：当个人成长方面做得较深入的时候，就不知道如何去拿捏这个部分和社会问题的连接，当更加关注自我的生命成长时，参与社会改变的部分就好像很少了，当然这跟我们自身对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和协作能力有关。同时，我们在工作中会常遇到，参与的人后来并没有选择做公益或直接参与社会改变的道路，而是去“发展自己”了。虽然我们理解，在参与社会改变的过程中，也在实现自我的成长，而个体在任何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与社会的改变也是一体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是经常感觉很难平衡这个“矛盾”。于是我们向陆老师表达了这个困惑，陆老师回应说：

1. 萨提亚模式又称萨提亚沟通模式，是由美国家庭治疗专家维吉尼亚·萨提亚（Virginia Satir）女士所创建的理论体系，又叫联合家庭治疗，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新方法，从家庭、社会等系统方面着手，更全面地处理个人身上所背负的问题，该方法最大特点是着重提高个人的自尊、改善沟通及帮助人活得更“人性化”而不只求消除“症状”，治疗的最终目标是个人达致“身心整合，内外一致”。

2. 叙事治疗是一种心理治疗方式，与传统上将人看作为问题的治疗观念不同，叙事治疗相信当事人才是自己的专家，咨询师只有陪伴的角色，当事人应该对自己充满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并且更清楚解决自己困难的方法。叙事治疗透过“故事叙说”、“问题外化”、“由薄到厚”等方法，使人变得更自主、更有动力，让当事人的心理得以成长，也让咨询师对自我的角色有重新的统整与反思。



自我成长虽然不能解决具体工作中的问题,
但支持青年的自我探索可以帮助其把工作做得更好。

“我觉得是两个方向，例如社区伙伴青年实习生第一期学员中有一个学员，项目结束以后，他选择了去企业，当时他是很挣扎的，因为他家庭很贫困，如果他马上选择来做公益，那他会面对极大的经济压力。我觉得他选择企业很正常，也很应该，反之我反而会怀疑，因为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我们对社会有责任，对家庭也有责任。尽家庭责任不会有人夸的，人们会认为那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我们去做推动社会变革的工作，就会有人夸啊。另外，青年人在不同的机构间去选择自身发展的时候，也会考虑学习不同的东西，所以他去企业，除了尽家庭的责任以外，也希望学习到现代企业管理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去看他时，我发现他把很多NGO的工作方法带到了企业，他当时所在的那个小小的分支机构七八个员工，关系非常好，他的同事跟我讲，他的管理很人性化。后来他又回到了NGO。所以我觉得，种下了公益心这个种子，什么时候会发芽只是时间问题。心里有这颗种子的青年人，即使在其他的领域，也会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可能是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度不一样，也可能是把NGO的理念带入到企业的工作中。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带在身上的，这个种子可能很多年以后发芽。

我觉得现在能够跳出来做NGO的青年

人还是很少的，做出这样的选择需要对自己的人生使命非常清楚。个人成长很重视人生的价值感、意义感，而这价值感和意义感是和社会有连接的。这些也是个人成长的重要议题，去发现对自己的生命而言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人可能会发现，对他而言，最有意思的不是赚很多很多钱，而是在一个小孩子需要时陪伴了他。很多人都是慢慢发现，我的生命要过得很好，和社会发展之间是有关联的。所以我觉得，参加过我们公益培训的青年人，跑去企业没有什么不好的，但你要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甚至，我会觉得NGO缺少这样经过职业化训练的人。比如，做个文件，在企业可能做到那个程度就不行，但是在NGO比较温暖，比较人性化，有时比较随便，做不好，可能上级就帮忙做了，或者也就这样接受了。NGO的管理也比较松散，有的机构给人的感觉像个俱乐部，大家在一起很高兴，但是事情做出来了吗？做得好吗？效率高吗？成本怎么样？如果是企业，就一定会考虑这些事情。NGO要获得社会的支持，是不是也需要有职业上的要求，也需要在所做的领域里达到专业化的高度？

在个人成长内容中，价值观是很重要的，它引领着我们的人生选择，不仅仅是说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工作中也有很多机会，例如

选择要不要升职？我们在活动中做价值观排序，每个人（的排序）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和个人经历相关，不一定是好坏对错，最难的选择是在两个‘好’或者两种责任之间排序，不同的生命阶段会有不同的选择。要思考自己在这个阶段需要什么，如果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我要坚守的底线是什么。如果价值观上不能接受，就不要去了。”

前面的谈话也提到，这个时代的青年人选择多一些。但我们感觉，表面上看选择好像是多了很多，而实际上选择是更少了，因为周围主流的声音如此强大。走到这一步，下一步是什么，早已由各种不相关的人帮你选好，要想跳出这默认的路径，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有多坚定的内心，多无畏的自我认同。我们不禁把这样强烈的感慨和陆老师分享。

陆老师说选择是在打开了视野之上看生活还有其他可能性，我们也非常认同这一点。回顾自己接触NGO，到后来在NGO中工作，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那些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们，他们在不同的生活场景里，用不同方式生活和实现自己，在不同的境遇中丰富自己的生命，这让我们从被别人期望的、也曾被自己认同的小世界中跳出来，知道生命原来还可以有哪些不一样，这也是发现自己的更多可能性的过程，原来的“非分之想”似乎也是可以实现的。

NGO的场域，是否能让参与者开阔视野，看见各种可能性，在参与中焕发内心原有的力量，在参与中实践对社会的想象，在实践中学做公民？

NGO作为公民训练的场域

“非常重要是有不同的视角认识社会，比如在农村社区工作，不是高高在上地说我们是有资源的，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我记得在社区伙伴的一次培训中，受训的实

习生说农民很保守，赵群老师就问了一句：‘是他们很保守，还是他们和我们的感觉不一样？’这个柔柔的问题，对这些青年人，不是技能的提升，而是思维方式的引导——不再觉得只能用一个角度看问题。这就是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结合。可能过去做公益就是先进入一个人群，觉得自己是带着先进的理念进入，我觉得现在变了——不仅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而且是大家共同参与，一起来促进社会变革，产生很多不同的视角，发掘并珍惜在地的资源。其实，放下自己固有的想法，去倾听不同的声音，不仅有利于做好公益，同样也有利于我们的个人生活，比如在婚姻中，也会有冲突，这时不是去指责谁好谁坏谁对谁错，而是发现和接纳彼此的不同。我觉得NGO能够贡献给社会的，不仅是一些先进的理念和促进变革的方法，这种参与的、尊重的、多元的、在地的姿态，也许是更重要、更有价值的贡献，也是参与公益事业的志愿者非常重要的学习。”

我们觉得那种参与到社会里的成长很有意思。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成长过来的，但似乎这一价值并没有得到NGO的肯定，我们猜想，这其中有个奇妙的、还没转过来的思路：“致力于某个社会议题改变的NGO，怎么可以说你们的价值是你们这些人的成长而不是事情本身的改变？”会有这样的疑问是因为里面缺了一步想象：去看人的成长如何反过来去回应到这个社会、时代的变革。于是我们又向陆老师发问：我们该用怎样的角度和多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待这个改变中两者的关系？

“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是，小到一个组织的发展，跟组织里每个人的发展息息相关，有些组织遇到发展瓶颈，说是社会环境造成的，但这样的瓶颈往往与领导者的个人局限相关。

二是，我们能不能看到，在参与NGO的工作或公益事业中，人有哪些成长的维度

和可能性。咱们举企业家的例子来说。例如阿拉善基金会的企业家们，我想他们开头并没有想到自己会经历一个民主训练过程，他们想的就是治沙、保护环境什么的。但是阿拉善基金会无形中变成了一个民主训练场。对于中国的未来来说，这样的民主素质训练和养成，是极其重要的。这是NGO的重要产出，也是个人的重大成长吧！”

我们和陆老师提到，曾听微乐益³的小伙伴们讲起，他们与大学生公益团体互动时有个核心的内容是团体协作能力的学习。我们想象这种团体的聆听、表达、决策，贯穿其中的多元尊重、民主协商，应该就是非常重要的公民训练。

“对，学生组织，从官办的学生会到民办的学生组织，都非常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去学习倾听别人，放下自己的东西。我觉得

这些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所以要找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之间有什么联系，（这联系）恐怕就是‘关系’。个人成长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关系’，和自己的关系，和他人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比如可以去问：我要实现自己的梦想，那伤害到别人怎么办？这样考虑就是放在关系上去看。”

说到“和社会的关系”，我们和陆老师分享了我们在工作中的一种感觉：现在大多数青年人很少参与有关国家、社会的讨论，感觉离得很远。

“我觉得关心社会这一部分，不是简单地讲，很远的地方有一群人在怎样怎样，但是（青年人）他们感觉不到自己和那一群人的关联。（我们）要自然而然地引发思考，而不是去灌输，或者批评他们说：你们不关心社会。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机制，他们会说，

我觉得自己不妨碍社会，不行吗？所以需要更有意思的、更适合青年们的方法去做，去慢慢地影响他们。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说过，‘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他认为每个人都有寻求意义的冲动，不只是为了生存、要过得好，还有生命的意义这样超越性的需求在。所以青年人想要自己过得好是正常的，例如父母让考公务员，也许我们不是告诉他该考还是不该考，而是和他讨论，透过一些方式告诉他们，人有不同的生存方式，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去考公务员，有一些人去考农村发展，有一些人去考无国界医生⁴，看到可能性也很重要。参与公益的过程，跟不同人群的互动，其实就在协助年轻人去思考自己的人生。”

青年工作者的思考：陪伴

很多青年人，自己关心社会，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没有看到变化，觉得很无力，经常会觉得，没有变化的话，意义何在呢？包括我们这些跟他们一起互动的人，也经常看不见改变，我们所处的世界苦难每天都在发生，人的改变如此缓慢，很无力。我们想知道陆老师是怎么处理这种无力感的。

“我通常就会和他们讨论，你们都做了什么呢？做的过程中，周围的反应是什么，做这些事情，希望的改变是什么？还能做些什么让这个效果加强呢？通过问问题，他就会想，自己的行动带来的是什么。社会变革就像精卫填海，我们可能扔下的就是一个石头，但它会产生涟漪。在SARS那一年，我们的青春热线被迫停止服务。但是热线的志愿者，在各自的岗位上做了一些很不一样的事情。比如有一个志愿者是中学老师，全市都要停课了，其他老师就急急忙忙让学生走了，她不是这样。在最后一节课上，她和学生们有很多的互动，跟

学生一起讨论：碰到这样的事情让人害怕，我们可以怎样去克服这种害怕？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怎样帮助自己？还有哪些人我们应该去关心？还有一位进入一线医院做护理工作的志愿者，人们碰到病人都尽可能地躲避，不在病房多停留，但是她可以去握病人的手，用在热线学到的方法给他们进行心理疏导。还有志愿者传给我文章，写一个女孩，她的父母都得了SARS，邻居们很恐惧，（作者）觉得这个时候最需要人们相互支持。我们以《非典时期的怕与爱》为题将这个故事发表在报纸的头条。很多年以后，我到广州，有朋友说到，在SARS期间最恐惧的时候读到这篇文章，一下子就感到特别温暖。我为我们的志愿者在社会危机中，在各自的岗位上做了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感到特别骄傲。回头去看我们在一起的相互陪伴和成长，就会觉得如此奇妙，充满力量。”

陪伴本身是一个生命互动的过程，也许我们平常有太多的“框”，用这些“框”去设计我们与人互动时的投入与产出，也去设定人的“应该与不应该”，在与人相互陪伴的过程中想着过去或未来，计算着如何才能去“支持”到对方，反而无法好好地去看见：与我们在一起的这个人，本身就有的独特经验与能力，足够可以去创造各种可能性。我们也把这一反思和陆老师分享。

“我后来学的叙事治疗，和对方一起去探索，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专家。这是非常重要的赋权。例如，我们和孩子互动，开始就会说：你愿意我怎么称呼你呢？你愿意怎么称呼我啊？这就已经是开始把权利给对方。

在跟每个人互动的过程中，我们总是有很多所谓‘正常’的标准，青年人就是应该怎样，走了这一步下一步就该怎样等等，这些标



与青年人一起相互陪伴成长，也许不在于掌握某种技巧方法，而在于你怎么看见每个人的生命实践。

3. 微乐益是广州一家由一群年轻人组成的支持大学生在公益参与中成长的NGO，现更名为“微辣青年”。

4. 无国界医生组织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Medecins Sans Frontiers — MSF) 于1971年12月20日在巴黎成立，是一个由各国专业医学人员组成的国际性的志愿者组织，是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

准都内化在我们日常行为中,我们必须得经常自省,去看到每个人的独特经验,尊重每个人的不同。而其实,每个个体的经验都能让他有能力和智慧去回应其自身的问题。而我们与之相伴要做的,就是与他一起去寻找、看见自己的经验。”

我们这些青年协作者,本身很年轻,又要去陪伴其他的青年人,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正走在自我成长的道路上。对于我们自己的生命实践,我们都经常经历着各种困惑和迷茫,在成为自己的过程中挣扎搏斗。但我们经常忘记自省,很容易将那些内化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控制”、“束缚”、“这才是对的/好的”等等价值套用在我们与更年轻的青年人的互动中,一边说要遵从内心去相信生活的各种可能性,一边却成为限制他人可能性的其中一环。也许我们心里有太多的期待,常常生活在那个期待里而不是当下的每一刻。这限制了 we 跟身边的每一个年轻人当下的相处,去了解、好奇、倾听,去发现、欣赏属于他自己的动能与可能性。在我们看来这一切不只是技术,更多的是对人的生命的理解。我们怎样更好地理解人的生命?我们在谈话里直接向陆老师寻求建议。

“我觉得作为青年人的陪伴者,还是要懂点心理学,但不是用来分析别人,恰恰是去理解每个人在这个生命阶段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怎样去看到这些,然后再看到生命还有什么可能性。还有就是对自己的成长有更多觉察,有时候我们觉得焦虑无助,这个的背后是什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我不觉得要到多少岁,才能去做这样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看个人的生命状态。周日我在协和医院听一位医生讲舒缓治疗⁵,我觉得那个医生就很有天赋,

例如,要不要告诉病人时间不多了,家属都很为难,她却可以很自然地跟病人一步一步对话,使得病人和家属都不再回避,让生命的最后阶段有质量地度过,完成那些应该完成的事情。她其实很年轻,能做到这点,我觉得是因为她很谦卑,这个谦卑就是去尊重别人生命的不一样。

在具体工作方法方面可以学习团体辅导,因为团体辅导会看团体动力,看待团体中的冲突等,看到团体发生了什么,觉察自己是以一种怎样的状态去应对。我觉得NGO中有很多的团体工作的手法,但是对团体背后的动力没有更多的思考,有时用了很多互动式的活动,但是不深入,不敢深入,或深入不下去。

对于陪伴青年人的青年工作者来说,自身的学习是相当重要的。例如去听别人的故事,再问问,多说一说,‘那时候你那么焦虑,你是怎么办到的呀?’对人对社会保持好奇心,知道世界是复杂的,什么时候都不是说唯我是正确的,当你保持谦卑的时候,会发现和别人不一样。要保持自我觉察和持续的动力,工作者之间的相互陪伴也相当重要。”

和陆老师的对话进行到这里,我们已更加明白,人的成长并不是三言两语的事情,与青年人一起相互陪伴成长,也许不在于掌握某种技术方法,而在于你怎么去看见每个人的生命实践,在于与这些鲜活的生命互动的过程。正如陆老师所说,每一段的生命都是充满可能性的。通过自我探索、陪伴和讨论,让大家看到这些可能性,就是建立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第一步。这个过程里,无论是服务于青年人的工作者,还是参与其中的青年人,但愿始终保持内心的追问和对自我的认同,生活会因此更加自在、无畏。❶

5. 全世界每年有上千万人罹患癌症,其中半数以上是晚期癌症,他们经受病魔的折磨,遭遇肉体 and 精神的痛苦。舒缓治疗最早在欧洲开始实行,本着减轻、舒缓患者及其家属身心创伤痛苦之目的,让千百万临终患者安详地度过余生,取得了整个医学界和全世界的广泛认可。之后,由于其人性化的特点,该治疗迅速传入美洲。

从工作的指导者到生命的陪伴者

访谈_陈志君、陈焯宏、洪图 文_陈志君

编者按

说起梁晓燕老师的名字,大家首先想到的或许是“公益”、“民间组织”、“公民社会”等字眼,但其实,除此之外,梁老师或许更看重自己作为青年人成长的陪伴者的角色。我们很好奇她如何看待青年人的生命状态及青年人在社会发展里所扮演的角色,或许,这些会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她对于培养青年人公民意识、担当公民责任的思考。

为了打开这个话题,我们琢磨了些时候,如何让对话在一个不太正式的情境下柔和地展开,而且更重要的是邀请到可以与梁老师对话的青年伙伴。思前想后,我们想到了在广州恭明中心与梁老师有很多交流的焯宏,以及曾乐于将“梁粉”贴在自己身上的志君,还有对教育和陪伴有较深理解与体会的洪图。

梁老师的案例跟进了大半年,原期待能有更多的参与乃至协作,只是能力与机缘都不够,只好静静地在背后聆听和默想。文字读下来好多遍,总能带来不同的反思与启发。与两位青年协作者沟通,过程虽不容易,却也在每次的碰撞与讨论中受益良多。原来,理解一个人可以有好多角度;他们与梁老师的对话,或许会启发我们,更好地想象自己与陪伴我们成长的师长的关系。

导师

梁晓燕，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在高校工作、任教十四年，后多年从事传媒与出版工作。1993年作为发起人之一成立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并担任执行理事至今；2000年赴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2003年后全职投入民间教育公益事业，曾任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总干事，同时，2005至2009年，共同发起了公益杂志《民间》并担任主编；2007年赴广西偏僻农村学校调研、支教一年，探索民间力量介入乡村教育的各种可能性。2008至2012年底，任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现在多家民间公益组织担任理事和顾问，致力于推动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



作者



陈志君，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专业学士、英国华威大学教育戏剧硕士。自大学三年级开始投身教育及公民社会领域。2003至2009年供职于“灯塔计划”教研部，研发包含个人成长内容的志愿者系统培训课程。2004至2006年期间，曾参与乐施会资助的“青年教育项目”，开展包括讲座、沙龙、展览、工作坊等的系列青年公民教育活动与公民传播工作，并成立和维护公民图书馆。2005年，与伙伴一起发起国内首个民众戏剧团体“木棉剧团”。多年来，与伙伴一起学习实践一人一故事剧场、被压迫者剧场、综合剧场艺术工作坊以及转化剧场等，通过剧场艺术探索教育与社区参与的手法与理念。2008年与几位公益伙伴共同发起了“义工成长日”并促成了“V-BUS义工加油站”的成立，开展公益培力的新尝试，致力以协作、艺术为凭，推动参与式教育及社群的建立。

印象

第一次见梁老师是2003年，我还在灯塔计划里头脑发热地搞教研，被梁老师邀请到北京参加乡村教育支持组织的研讨会。那是我第一次认真听到关于乡村教育的各种尝试，以及梁老师对于乡村教育的宏观分析。有很多关于她的形象，从那时就开始了，比如说五指并拢坚定有力地划下，像切西瓜一样，是她演讲的典型动作；还有高昂坚定的语调、凌厉的眼神、以及无论面对20人还是200人都能全数笼罩的气场。

之后我与梁老师的接触，很多时候也是在听她的讲座。我确实很喜欢听她说话，因为她总是能给我带来新的思路，和某种称之为感召的东西。一个人若是有人格魅力，已然非常让人敬服，加上她从过去数十年的社会变迁中走过来的经历，以及对宏观社会分析的睿智，一般如我等众生没有不拜服的理由。“梁粉”一词，曾经我是如此自然地说出，并乐于贴在自己身上。

然而这个访谈却并非设置为偶像面谈会，而更像是一个解构的尝试，想了解一个“更真实的她”——以陪伴青年人成长为名。至于为什么，请容我最后再表。不管怎样，盛夏的一个晚上，我们约上她在一个清幽的咖啡馆里倾谈。这是我们常去的地方，绕樑古琴、满馆书卷、简单天然的食物、温热的黄酒，似乎要到一个毛细血管刚好舒张的温度，对话方得开始；就像在诱捕一只珍稀的灵兽，或是期待一株不在人前盛开的花。

她眼中的青年

青年成长在梁的工作或观点中是有向度的，她主要关心到的是那些关注社会、投身公益行动并有所承担的青年人，她常常在公众活动中鼓励青年投入到社会的

思考和行动中。在多次的演讲中笔者都听到她对某乡村教育团队的盛赞，于是谈话从此开始：

笔者：我知道这个乡村教育团队做的事情不单单是图书馆，很重要是做乡村少年成长的工作。在你看来，它是不是做“人的成长”方面的典范呢？

梁：它不是典范，而是试验器。它到不了典范的程度，而且工作还很粗糙，需要提升的地方有很多。但我很看重的一点在于，它生发于创始者和参与者内心的强烈愿望，以及工作模式的自组织性很强。

梁非常欣赏这个团队的“半开放性”，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团队，但也有对外的很多触角，在各地、在各种不同的层面上自发生长出新的可能性，带有互联网式的有机延伸方式。“在这样的公益社会工作中，青年人的成长也是一种开放的、受到挑战的、在互相激荡的环境中的自我成长，带有某种粗糙、‘野蛮’的风格。这和相对封闭的、机构化的、比较精致的发展状态是不同的。”

谈到青年，她尤为感慨的是这个团队后来发展出来的一种民间教育尝试：

梁：我非常有感触的一个地方是，这个民间教育尝试从头至尾就是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做起来的。第一年是发起人在做，第二年他就放手了，带着一个更年轻的团队开始做。后来因为碰到了很多麻烦，他们就灵活地分成几个团队，各自为战。结果每个团队都有一个人——只是本科或研究生刚毕业，从来没有担过大事的——突然一下就被推到了负责人的位置上。这给了他们信心和机会，来不及多想什么，顶上去就干，“稀里糊涂”就把事做下来了，还感觉自我成长很大。第三年更进一步地去完善和探索，把一些挺有创造性的想法付诸实践。一群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就把那么一个看起来挺“没谱”的事情慢慢地做起来了，



而且至少可以打70分。今年是第四年，他们的团队又将展开一些很有趣的尝试。你会发现这样一群青年人，在干中学、在干中总结，在干中痛苦和纠结……一起再干三五年，心里朦胧想象的那个东西绝对做出来了。

她对这种野生状态，有着近乎讴歌般的赞美。

梁：所以我反过头来想，也许没必要那么苛求吧，做得好不好看怎么说。他们可能不像我们这样，每个环节都抓得那么紧，针对每个环节可能会出的问题做一堆预案，他们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地做，有一种特别强的“我们要把它做下来”的内在动力，然后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挑刺和回应，着力解决问题。我从第二年开始跟着他们，第二、三、四年我都有参与，深感到，这个团队真的就是青年人自己在做一件创造性的事。他们确实不完美，有的时候我都受不了他们做事那么不细致、不明白。但是回头一想，人家不就是刚开始干吗？他就真不明白又怎么样，他干着干着不就明白了。他这次就是不明白，但是磕磕碰碰地碰出很多事来，有人批评他，有人跟他吵架，他的工作对象给他

反馈，他不就知道了，不就成长了吗？我在反思，是不是我们都要手把手地把年轻人从自己手里带出来？一放手就是一个成熟的，特别好的？我们能带出几个人来？

梁最关注的，似乎不是青年人应该变成怎么样，而是青年人的发展空间以及他们的内在动力。“我非常欣赏他们的一点是其内生动力极强，尊重自发生长性并且对此有着很深的体验。”

这种以人的发展为本位的思考，对于一个团队的顾问而言并不特别，而对于自己带领的团队仍能如此，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梁：我在好几个公益组织、机构做过负责人，从团队开始组建、开始工作，我就比较有心地发现和培养有领导潜质的年轻人，并且有意识地压担子、开眼界、给他们挑战自我的机会，并在团队中培养对他们的认同感。一旦时机成熟，顺理成章地就把他们推上负责人的岗位。与我有关的几个组织和机构，在不长的时间内，都已经是年轻人在主持工作，不仅胜任，而且有他们独到的思考和关怀，对使命的理解和工作的开拓也有超乎我想象的作为。公益组织（尤其是

草根组织）人力资源比较匮乏，成熟的职业人士很少，大多数是刚毕业或职业经历不多的年轻人，期待找到现成的、合适的负责人往往很难。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这未必不是公益组织对年轻人成长的一个长处——他可以较早地通过承担责任来获得发展机会；较早地站在一个需要统筹思考的位置上去锻炼自己的领导力；较早地在挫折、失败和焦虑中体会成长的艰难和欢欣。当然，从我来说，有意识地这样做，不完全是被动的，也带有一些思考在里面。

同时，一个公益组织的发展，是一批年轻人的成长，但在一个组织内，负责人的岗位总是有限的，而且，还有些虽不全面但在某些方面优势突出的人，也需要关照。如何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和激励空间？这也是我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一个选择是机构需要快速发展壮大，有更多的高层岗位来匹配成长起来的员工；另一个则是放开眼界，在圈内、甚至在圈外为他们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甚至，帮助他们创业、“单飞”，开辟事业的新起点。

作为组织或机构的负责人，你很喜欢员工要离职，你肯定不愿意吧。有时，我也会诚意挽留，但不仅仅是因为机构工作需要，而且因为在这里工作对他的发展阶段来说是有益的。一般来说，我基本不反对员工离职，而且，有时候还会主动帮助他们。比如，有些年轻人表现还不错，成长性很好，但我觉得在我们机构内成长空间较小、局限性较大，我就会跟他谈，基于对他的了解，应该去哪里寻找发展机会。我觉得这样是对他们的职业生命负责，也是对公益事业负责。有好几个年轻人就是这样，我观察你适合做什么工作，什么样的组织或机构、哪种岗位更适合你，如果你愿意，我会推荐。这样，他们出去以后就肯定不一样。在我的记忆中，曾经至少和四个年轻同事有过这样的经历。从机构角度出发，我当然希望能力

强的不要走，但不是绝对的，从机构还是从人的角度出发要有相应的平衡。

和我共事的伙伴中，有一位小伙子，自身非常努力，成长性很好。他原来在我们的机构里负责一个项目，机构中大的决策他很难参与，项目发展也会受到机构规划的很多牵制。我觉得，他所带的项目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他也需要更大的生长空间，去发挥潜力和创造力。要让他去做更多的事，有更大的承担，说不定会有真正的突破。于是，我较早就和他讨论独立发展的可能性，条件成熟后，就把他推出去了。他出去独立发展后，无论是新机构还是他本人，时间不长就有了长足的进步和相对宽阔的发展前景。对此他非常有拥有感和成就感，当然，也少不了承担和责任。他有一次跟我说，“哎呀，原来做机构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真是很不一样，压力和要求都不一样。”

对于绝大多数NGO考虑的“如何留住优秀员工”，像梁这样的考虑无疑是边缘的。不过，她对于青年人发展的理解，不难找到与她的社会理想的契合之处。

梁：关于NGO，我现在有两个定义，一种是组织化发展，一种是机构化发展。有何不同呢？组织化发展很多时候是开放的、半结构性的，会有很多“触角”展开，它的特征是事随着人走，人为核心。而机构化发展是完整的、结构性的、相对封闭的系统，人为做特定的事而聚合，事为根本。现在NGO里面机构化发展是主流，组织化发展比较少。可是大量的社会公益工作，尤其是以互联网为纽带的公益工作都是组织化而不是机构化的。既落地又联网而且带有互联网那种有机延伸模式的，像“大爱清尘”、“老兵回家”以及上面提到的乡村教育团队都是做得比较好的。它在摸索一条路，跟我一直想倡导的、与公民社会发展的方向是吻合的——某种程度的多中心化、去中心化。

有些事情不是自上而下地规划出来的，

不是仅靠一拨“领导”和“牛人”把它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一个核心理念下，因缘际会，很多人在不同层面发挥作用，自发成长、随机组合出来的。什么样的人，就带出什么样的事，形成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由此形成丰富的社会生态。这个我恰恰认为是民间组织最重要的东西。

基于这个认知，我常常觉得，在公益领域中，人的成长比事情的成功重要，或者说，人的成长才能带来更多事情的成功。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这三十多年来在我身上，事情的起起伏伏、成成败败真是太常见了，但我这个人在，什么事情不能重新再来？什么样的团队不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尤其是公益和社会变革的事，因为很多都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发展，大多事情都磕磕碰碰，今天不知道明天，各种条件的变化偶然性很大，人有没有足够的内心力量，有没有担当和坚韧，有没有应变和团队共识的能力，太重要了。人能成长得多好，事情就有可能走得有多远；即使一时走不远，也可能另辟蹊径、柳暗花明……所以我觉得把心思、力气花在人的成长上，对事情的成功只

有帮助不会破坏。当然，把事做好本身也是在促成人的成长，但在选择排序上，我将人的成长放在前面。人的状态好了，损失的时间很快就会回来；一次事情不成功，锻炼了人，何愁以后没有成功的可能？我在自己身上也有太多这样的体会——你说我今天成就了什么事，谈不上。有哪一件公益的事离开我办不成？几乎没有。可是，如果说我在很多公益年轻人的职业发展、生命成长过程中有一点作用的话，我认为自己对公益的贡献也蛮大哦——毕竟，公益事业真正发展，有赖于更多的人全情投入，更多的人创造性地发挥和承担。

她眼中的“成长的助力者”

笔者：如果说自发生长性是最重要的，那么一个资历极深的“前辈”，该处在什么位置、扮演什么角色呢？

梁：我曾经是多年的大学老师，有很多教师的“职业病”，尤其是好老师般“循循善诱”，特别积极主动地给别人指点迷津。我曾经是这样，现在想来是不是有一点讨厌（笑）。但后来还是有蛮大变化的，那是基

于我这些年来对教育的思考和认知。我越来越觉得教育是一个或然性的东西，不是必然的。不是说有一就会有二，因而你就应该先做这个后做那个。教育的或然性有的时候甚至不是理性的、不在单一逻辑中，它取决于多种因素。过去自己觉得只要把道理和经验说明白了，年轻人是会循着道理走的。但后来我越来越发现，道理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实际上起的作用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对于年幼的儿童、少年尚且如此，对于已经工作的成年人就更是如此了。对我这样有“教导欲”的人来说，恰当地看待教育者（引导者）的作用，是一种自我警醒。教育者的自我膨胀有时候恰恰是让教育丧失作用而不自知的一种作为——自我膨胀，就是你觉得这个事情就应该这样：“我什么都经历了，你还不听我的？”

一方面是我自己的成长过程给我这个领悟；另一方面，在公益组织里工作的差不多都是我的晚辈，在和他们共事的过程中，我经历了很多挑战和刺激，每每反省自己的角色和心态，总有新的认知产生。

对于年轻的同事和伙伴，我现在的心态是，儿孙自有儿孙福，不要指望他们的成长符合我们认知的那些过程。当我说到教育的或然性时，我指的是教育的结果不是必然的，不是一个逻辑过程，因此很多经验和感受是无法直接传递的。成长其实也是一样，有很多东西一定要他自己去体会、自己去尝试、自己在困顿和挫折中反省、提炼。那么你最适合的一个角色——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的——是陪伴者。

我觉得自己经历了从工作的指导者，到成长的助力者，再到生命的陪伴者这样一个过程（不完全线性，是交错的）。我过去主要是做工作的指导者和成长的助力者，前者是站在上面，后者常常是主动的。慢慢地我感到，对于他人，包括很多跟我打交道的年轻人，很多时候最好的角色就是陪伴者。陪

伴者就是，我会站在旁边看着你，关切你，鼓励你，在恰当的时候提醒你。当你痛苦的时候、纠结的时候、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出现——也就是说，是一个相对被动的角色。还有一点是我后来发现的，当我出现的时候一般不教方法。方法是怎么出来的？方法是你把这个问题想顺了，通透了，与自身的能力和资源能够匹配，这时出来的方法是最好用的。如果上来就教方法，这个方法到那个人手里很可能不好用。所以我跟年轻人交流，一般不会说“这事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会说：“如果我是你，我怎么想这件事，从什么角度思考这件事，怎么体会这件事；如果我是你，我接下去有哪几种选择……”至于你该怎么做你会自己决定，不需要我发表意见。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的人生经验是别人的参考和对照，而不是他应该学习的东西。这里不存在“应该”，只有交流时的信任和启发，所以，交流的氛围和你的传递方式就很重要。我都以个人身份来谈，讲我的认知、我的体会和可能的选择。但是，你怎么样，请你从你的角度去想。交流方法的转变实际上预示着自己角色的转变，从一个指导者、助力者，慢慢地变成一个陪伴者。

笔者：从一个所谓人生导师到陪伴者，往后退是很需要勇气和智慧的选择。这个勇气是怎么来的呢？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经历让你突然觉得以前的方法行不通，需要寻找另外的方法？

梁：我觉得这跟自我修炼有关，与你对自己、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有关。我慢慢接受了不完美，接受了自己的有限性。但接受并不是消极的，如果在积极的状态下接受这种不完美，也许就能找到更好的一种位置和姿态。人该犯的错永远都是要犯的。你看古今中外任何的爱情小说和爱情故事，在感情关系上，母题从古至今一代一代重复。但是，没有人因为看了上辈人的东西就聪明了，如果有，那他的聪明是以他的人生过早



萎缩为代价的。只要他想生命充分地展开，他就一定会去犯错。可是，既然什么都能总结出来，为什么一代一代人还是义无反顾去犯错呢？人怎么就学不聪明了呢？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很多事情跟爱情是一样的：人是要从自我的挫折中去汲取经验的，有相当多的经验不能通过语言和文字来代际传递。语言和文字能让人具备反思能力，帮助你从自身的经历中提取东西出来矫正你的行为和方向。但是语言和文字给你的东西并不自然在代际间无缝传递。不犯错本身是有另外的代价伴随着的，这个代价是正面的吗？并非；所以不犯错就是好的吗？不见得。我慢慢地也开始想，以帮助年轻人少犯错作为目标，是不是作为年长者的一种自我狂妄？对于年轻人来说，最大的帮助，是不是创造条件让他自由发展，尤其是在大的生长阶段上，去经历应该经历的，承受应该承受的，获得应该获得的？可是，这样说说也许简单，但不做过多的约束、指导，给予恰当的要求、指点，在分寸上真的很难把握，这也就是自我修炼的一个内容。

当然，“自由”在任何人那里都是有边界的。梁在访谈中也谈到，如果事情涉及一种重要的习惯或品质的时候，她也会严格地批评，并适时地去纠正。

在前面那个推出去“单飞”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她的这种焦虑。

梁：在他独立发展之初，同时去大学读了公益方向的硕士。舞台变大了，视野开阔了，五颜六色的光环自然产生很强的吸引力。他想变化，想让自己的工作更出彩，开始觉得组织大学生支教是一个很低档、很小儿科的事情，应该做那种系统性的、高大上的事情，比如要做完整的课程，要发展出级别来等等，如何踏实地服务于从事公益活动的大学生群体，针对他们的真实需求开展工作，反而不那么在意了。开拓新的工作空间无疑是正当的，应该鼓励的，但我又感觉到

一丝不那么对头的味道。看出这个苗头以后，就跟他很随机地聊过一次，给他一个婉转的提醒。后来，我和他在一次电话中交谈说：“对现在的公益圈，我有一种隐隐的担忧，你觉不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氛围，公益正在变成一个名利场中的东西？这个名利场的‘利’可能不是钱，而是争相露面、争相展示那些拿得出手、说得出来、大家听了以后‘哇’的一声的东西……想想你们的团队和工作，近来和大学生们的联系是不是足够，对大学生的人生困扰和公益动力是否有切身同感……回头看看，你走进公益的时候，什么东西最打动你……”总之，再一次地提醒了他。

其实我可以跟他说：“你这样是错误的”，“虚荣心太强”，“必须……，不能……”，然后，把我一整套想法都塞给他，但我没有这样做。我想跟着他走，再看看。一段时间以后，我看到他的关于机构发展的战略、远大图景的文字、PPT一稿一稿地出来，我觉得问题比较严重：越来越华而不实。

这时，我认为应该要直面问题了，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我看到了你的变化，可是我不知道应该称赞你是进步了还是说你走入迷途了……”那封信写得挺长，之后他没给我回信。我有点纳闷，但没问，也不催。一直到半年多以后，他发了一个年终总结给有关的人，里面说，“最近半年我处在特别自我搏斗的状态之中，有很多问题想不清楚……连梁老师给我写的信都没回，我写不清楚，那是我自己最最激烈交锋的时候。直到最近，我觉得我有点想清楚了”（大意）。然后他真的写了一个非常好的自我反省，看完我太高兴了！随后我又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第一句话就开玩笑说：“你还欠我一封回信呢……”。这个时候，我觉得才是水到渠成，沟通效果是最好的。前面那个特别纠结的过程，他必须要自己走过。我作为外力推一

把，但是我不要夹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正向的外力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我只是其中之一）。让他自己搏斗去，让他搏斗到筋疲力尽，越是艰难，记忆越是深刻。如果这个时候我去把他拉出来，表面上看好像解决得快，实际上他并没有投注最大的心力，汲取的教训反而不会那么深刻。年轻人成长我觉得要有过程、给空间。别怕他走弯路，甚至走一走弯路也是好的，如果所谓的引导太直接、太强势，效果如何且不说，其实对他来说也不是个好事情。因为，人生的各种维度在这里没有充分展开。

笔者：那这个结果对你来说是意料之外还是意料之中？

梁：他后来写得这么好、认知这么到位，是超出我意料的，但我一直觉得他能走回来，我要等等他。在心里我有一个基本判断，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个朴素的、不贪慕虚荣的人。当一个抵抗力不强的人到了一个虚荣的氛围中，一下子就会晕头，但是晕了头以后本性中的东西是会参与抗争的，我对他的本性比较信任。事实上，他自己想清楚以后，立刻把机构的工作做了一些调整，回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轨道上，并且开始新的探索。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人基本上成了。当然，这个结果并不会发生在我面对的所有年轻人身上，但即使是发生不那么理想的结果，对出手的自我克制也是应该保持的——毕竟，我们不能“包打天下”，年轻人的路怎么走，最终，还是要自己选择和承担的。

笔者后来与故事中的这位青年也有过一席谈，谈到梁对青年人的期待以及他与梁关系转变的故事。

尽管之前说到，她希望让青年人自由生长。但在一个后辈眼里，她对年轻人的基本期待还是非常明显的，在价值方面，“对自己内心价值的认可”、“坚守良知”、“敢于去闯而不是懦弱的”、“有主见的”、

“鲜活的、眼中闪烁着追求的”、“别干坏事、别做帮凶”、“有充分的道德自觉性”……在能力方面，梁非常强调职业素养、注重细节。因此，她给青年人带来的影响，除了“感染力、追随感、信任感”，还有“畏惧、紧张”——“她太权威了”，她的标杆给人压力很大。但有时候她设立的标杆未必为自己所意识到，她也没有这么要求别人，因为她就是这么做的，这些就是她生活的信条和自我要求。

“当大家把她当标杆和偶像的时候，就是要推远自己与她的距离。有些人不想成为那样的人，因为太完美了，一般人做不到。而另一个影响是，在这棵大树面前有很多遮挡，很长时间人们不敢离开大树：既然有一棵大树在挡风挡雨做决定，你就不那么主动去思考，把你自己负责的事情想清楚，顶多提点建议就行了。况且，与一个有很强影响力的人，你很难跟她产生对话和讨论。我觉得和她共事的过程中，很少能去反驳她的意见。”这位青年说。

这种关系直到他单飞，有一段时间没见之后，才慢慢改变。“后来，她选择在旁边看。例如，现在她还会看我微信发的东西，她会点赞，但不会说太多；而她看到跟青年人成长有关的资料，一定会转给我；有事去征求意见，一定有及时的反馈；想有更多的交流，相信会得到充分的接纳……这就够了。总体来说，她现在已经没有那些要教诲我的东西表现出来了。再加上这两三年我是自己做的，自信心也起来了，我靠自己的本能来做选择而不是由她做选择。这样我们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亲切了，我没当她是老师，而是朋友，每次看到她都特开心，也没有检查工作的意思了。现在她给我的意见我都会听，但我会自己做选择。而她认为这样就是最好的。”

除了这个故事，梁在与我们的交谈中也提及与另一位青年人相伴的往事。

梁：512地震之后，我们机构在四川援建了一所小学，建设过程中有非常多的麻烦，全靠我们一个极棒的工作人员在当地维系和解决。有一天，我在北京接了她给我打的电话，说实在坚持不了要辞职。她在电话里哭，因为当地县教育局援建过程中做得一塌糊涂，我们公益组织肯定要有反馈，教育局的局长就骂她，而她实在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当时，我没有说什么劝慰的话，只说，“你现在收拾一下东西到成都，明天我到成都见你。”第二天我在成都见了她，见面就说，“明天是端午节，我来和你一起过节……”她特别高兴。我们俩去看了建川博物馆，逛了街，吃了好吃的东西，在这过程中，我跟她聊了很多我经历的事情和这些事情对我人生的意义，她也非常贴心地和我交谈自己的经历和困惑。其间，我们一句也没有提到小学，提过工作。我说：“我们都会经历很多事，现在也许很难，难得都不愿意去想，可是，二三十年后，这些事情都会非常珍贵地成为自己的财富……”交谈的感觉非常好，在一起，两天，到了第二天晚上，我什么话都没有说，她就说，“梁老师我回去了……”好啦，淤在心里的垃圾清除啦。我不需要跟她谈怎么解决问题，具体的工作上的问题我也没法替她解决，有些问题不是要马上解决，而是应对问题的内在状态要改变。我知道她情绪和心理淤在哪儿，原来她觉得应对不了，调整后就觉得可以应对。那次我们各自的感觉也非常好，非常亲密地交心，过程中很开心。最后我不用多讲什么，她就知道该要做什么，心情平复了就回去了。这个时候我的角色就是陪伴者，不是指导者。对很多人来说，这个陪伴者角色是有意义的：第一，无论在什么时候，让你感觉我跟你在一起；第二，我们在一起，我相信你有能力、有方法会面对问题。要激发他们内在的自信，给他们这个动力。

看过两个故事，再回来看看梁对于距离的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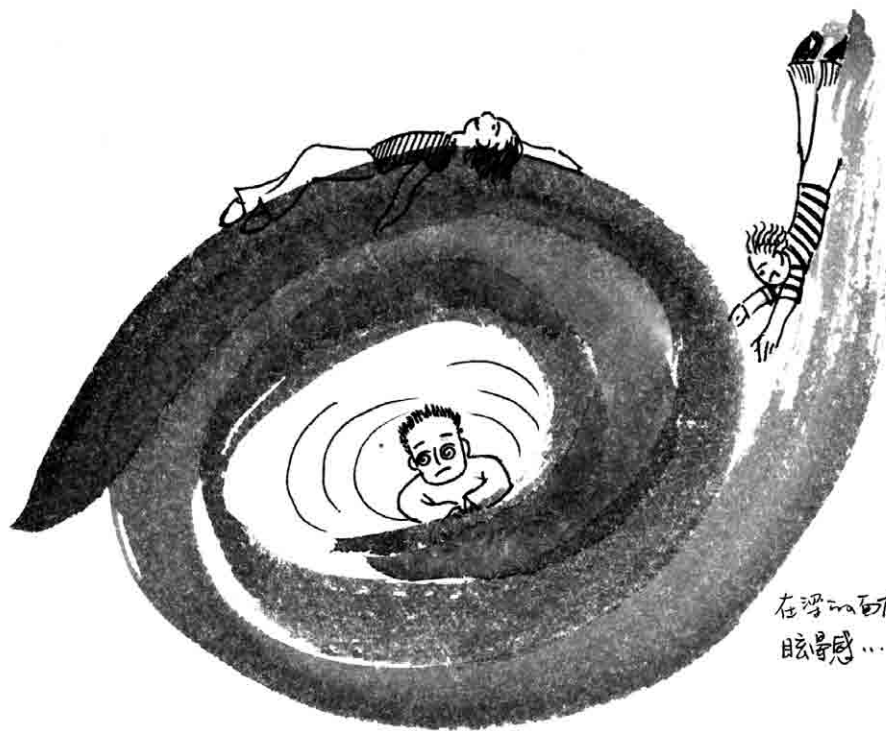
梁：有的时候，当你不那么自信、不那么膨胀地觉得你的“指导”就是别人需要的，反而容易让人感受到一种恰到好处的温暖——有一点距离、但是不很远；你知道我有个温度在，同时你不觉得我烫人；你能感受到、你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触摸得到，但又对你没有强制和压力。有的时候，热情似火、自以为是反而会把人吓走。

另一方面，你不过度去走得太深，反而是信任感建立的一个契机。贸然走深了，也会伤及信任感的。这个是在慢慢打交道的过程中自己体会到的。你给别人的感受最好是，他如果要向你伸出求助之手，他不会害怕难堪，害怕受拒。传递这个意思就够了，如果他需要，自然会来找你，而你能给出的帮助，又基本是他所需。我觉得，重点是你怎么去营造出这种恰当的距离感。因为有了这个确切的感觉，所以我后来有很多的调整，不过于急切地直奔主题，更相信人和人之间的“化学反应”。

不过，要一个像太阳一样散发能量的人作为陪伴者，她需要多大的适应，才能给予人火炉的温暖呢？对她来说，其中的艰难和修炼仅仅是没有道出而已。正如前面所提及的那位单飞的小伙子补充到：

“其实梁特讨厌别人把她当领袖的，例如人们把她放在一群人的前面，还放个姓名牌等。如果可以，她一定会在人群中，她希望别人对她简单自然，尽管人们经常都隆重而重之地对待她……其实应该营造更多机会，跟她私聊，像朋友一样。别把她当神，而且不要去捧她。”

为什么一个走在时代之巅的人要如此自我设限、要保持这样的在场，为什么她如此珍视年轻人的“可能性”，或者仅仅只是她在过去几十年以来对自身的有限性的切肤体会？“我们中国的这四十年变化非常非常大，从我的童年到今天，世界已经翻了三个个儿了，所以我们的生活经



在梁的面前，我们很容易有眩晕感……

历给我们的东西，除了那些恒久的人生信条外，还有多少在年轻人的生活中还有意义？我存疑。”或者，珍惜和寄望于青年人的“可能性”，除了理念认知上的通达，也还有让她自己“见证未来”的需要吧。

谈话的发酵——眩晕感与青年主体性

在准备的过程中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梁老师实在有点完美，这个完美的人有什么软肋？有没有一些地方能让我们感到她终究是凡人一个？我们想过，她有没有一个精神上的支持者？有没有棘手或软弱的时候？有没有搞不定的人或是失败的经验？可是，对于这个固化的形象，我们居然无从入手。

在梁面前，我们很容易有一种眩晕感。那是一种犹如坐过山车或从山坡冲下，那种心跳加速、时间极大地凝聚、个人完全进入一种宁静而心无旁骛的时空状态，结束之后心跳不止，让个人得以净化，既刺激又回味。她的讲话会给人这种感

觉。她会把你带进另一个时空，一个更高远的场域，一个冲突正在发生，而你就像一个见证者。强烈的现场感和剧场感唤起了你的情感和道德冲动，而你就此向往起那个战场、那个故事式的时空，并把自己带入到其中——跟哈利波特、或兔子洞、或任何一个奇遇一样，喂养着人们超越自身的渴望。

很多人都有这种让人眩晕的能力，包括一些成功学导师或伟大领袖。在眩晕面前，是非对错并不重要。然而一旦离开了那个聆听的场域，无力感会迅速生起，而“我”跟“他”的差异成了焦点。而这种差异可以激起行动，也可以消灭行动——只需选择依附于他，跟随他，让聆听和追随取代原本应有的行动。

正如我此刻还在犹豫通篇文章该用“梁晓燕”还是“梁老师”这个称谓，或是那个早已淡化了的“梁粉”。她对我的影响确实是有多重可能的——让我尊敬、感恩，也让我畏惧、惭愧。

相似的，对于从事青年人工作的工作者来说，我与焯宏都在扮演这个角色，制造让人眩晕的机会。因此，反思这种力量，更多是出于我们自身的需要——反思我们要担当什么样的角色，是自我设限、鼓励批判；还是运用极致、“夹带私货”？如果自我设限，我们的经验又可以怎样传递？如果说让更多青年重获主体性是当下青年工作的一个焦点，那么如何处置我们这些公益先行者、青年工作者的经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用什么来陪伴青年？怎样避免我们取代了青年？我们怎样谨慎地运用我们的影响力，才不至于制造新的“统治—追随”文化？

回想访谈，已是半年前的事，时间让回忆逐渐发酵。回望那一段心路历程，反思和批判方姗姗到来。我们当时采取的探索方式，就是努力将她还原成一个人，至少让我们自己能更完整地认识她。在心里面，我们希望确认我们与她的距离并不遥远；希望确认我们并非如此无力、并非做不到她那么好；希望确认我们也并不弱。我们真心希望争取一种力量对等的对话，正如参与对话的陈焯宏写道：“她谈到几个陪伴青年人的故事，一方面，我们为梁老师对青年人的热忱而感动，另一方面，我们有一种隐约的疑问：这些青年人会有被梁老师需要的感觉吗？梁老师在与青年人互动的过程中，有无被影响？”

我们感觉到一种焦灼的心情。这大概

就是看到我们与梁老师的存在感的差异，而我们希望超越这个差异而造成的。我们希望寻回自己的主体性，就像不甘心被太阳焚毁一样。不过回头再想，为什么我们会执着于此？是不是除了这个方法，我们无法获得对她一个合乎人之常理的理解？有没有方法让我们走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

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的谈话并没有达到我们预设的一些期望，因为她还是很完美，挑战、困难都轻描淡写地略去了；但慢慢咀嚼和重组这些经验，加上自己在实践中碰到的问题作为对比，方感谈话给我带来的收获。我逐渐对梁老师多了一份理解和想象：为什么“距离”是她的主要命题，与人保持距离而又陪伴身旁的状态对她来说有何难度；而一个“日理万机”的领袖人物，如何有足够的心力去关注一个个具体的人、又如何看待由此带来的负担。

当我逐渐找到她所做出的种种行为与她所表达的社会理想之间的一致之处，当我尝试代入自己的角色思考“关注或陪伴一个同伴”对我意味着什么之时，我发现自己逐渐从对差异的关注中走了出来，离开了“抑或顺从抑或逆反”的选择，她的经验真正成为我思考的“对象”。假如没有接受这个极具挑战性的对话，没有在对话过程中的挣扎、省思和同伴讨论，她大概到现在还是我无法理解的“偶像”吧。☹️

将精神发展 带人社会转化的探索之路 ——记P' Nit姐姐

访谈_孙国嫒、韩红梅、李健、曾颖芳 文_孙国嫒

编者按

这位被称为“姐姐”的前辈来自泰国，却和中国的NGO青年工作者有着不浅的缘分——过去四年里，每年来中国与大家做工作坊，一起体验人的内在精神力量的发展，探讨可能的社会转化。她曾说，“我只是比你们早走几步……但我有了一些新的学习，有了体验，我就与大家分享。”让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跟随这位姐姐的脚步，去了解她独特的成长转化过程，她对人的转化和社会的转化有怎样的理解和行动，以及她与青年人形成的陪伴关系，又是怎样在分享的过程中被加深。

导师

Kijtiwachakul Dhammanond (昵称Nit), 1990年学士毕业于泰国农业大学社区林业专业。做过几年助教之后,因为受到自然农法农夫的鼓舞,她前往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继续农林学的硕士学习。毕业之后,她在亚太地区社区林业培训中心(The Center for People and Forests,简称RECOFTC)工作了五年,积累了与NGO和草根社区工作的经验。2000年获得奖学金在亚洲理工学院攻读流域综合发展博士学位。她一直对草根赋权感兴趣,坚信边缘个人和群体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带来改变并促进可持续发展。如今大多数人都失去了与内在灵性的连接,她却将灵性的追求视作生活道路的根本。为此,她愿倾注此生的心力,愿陪伴人们重溯回归内心灵性世界的入口,寻找个人转化与社会改变的关系。目前她担任“培育心灵和社会转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Nurturing Mind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简称INMiST)总干事。



作者

孙国嫒,进入发展领域的第一份工作就和青年人工作有关,这缘于我对自我的探索和对社会贫困等议题的关切,做发展工作契合我的价值观。我相信,个人与社区、乃至自然的互相联结有赖于文化改变和人的改变。

近两年在香港岭南大学进行文化研究博士学习,主要研究青年培力协作者的主体性的形成及其过程的关键因素,青年主体是如何与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进行互动和角力;我希望通过这个研究助力青年培力协作者反思并理解自身的成长,以及启发他们理解青年工作如何协作当代中国青年的主体的发展。业余时间我和伙伴们正在创立一个为青年工作者提供协作理念和资源分享的网站。

2014年11月,初秋的日子,生命如吸入一股清新空气,身体、精神都为之荡涤,耳边响起鸟儿清脆的叫声,告诉我自然与我一体,自然在供养着我。这美好的感受和生命的转化,都和一位来自泰国的老师有关,她的名字叫Kijtiwachakul Dhammanond,我们都称她为P' Nit——Nit姐姐的意思。

P' Nit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2011年夏天,漓江江畔,从船上跳下来的头发短短、皮肤黝黑、戴着眼镜的小人儿,非常活泼,问这问那,如果不是随行的朋友告知,我很难将她和我们要迎接的泰国老师联系在一起。之后,她每年都来中国,开展名为“自我觉察与社会发展”的工作坊,将自我觉察、内在力量培养和社会转化联结在一起。2012年秋天,我第一次有机会完整地参加P' Nit协作的工作坊。偶然或必然,那也是我的博士班读书生涯的开始,没想到,她所教的自我觉察的方法成为了我后来度过人生低谷的烛光,让我不至于陷入无尽黑暗,让我知道生命苦的同时,踏上寻找喜乐的道路。

P' Nit的成长故事

P' Nit出生于1960年代末一个华裔家庭。九岁之前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她,给小P' Nit心中埋下了种子——热爱自然、喜欢传统医学并且关注社会。

由于小时候没有和父母一起生活,回到父母身边后,她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因此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和朋友一起玩,帮老师做事情。小P' Nit酷爱读书,经常去社区图书馆借各种书看。高中时,因为她所在的学校离泰国农业大学很近,而这所大

学经过学生运动时代的洗礼,思想非常活跃,大学里有一家独立书店,专门出版一些进步书籍,成了P' Nit高中时经常光顾的地方。她在那里买了关于圣人、道、禅、自然农法、爱因斯坦、社会工作等各种书。也是在那时,她读了《一根稻草的革命》,决定大学读和农业、林业有关的专业。

P' Nit坦言,她的大学学习不是发生在课堂上,而是发生在她参与的社团和社会活动中,透过与不同人的接触和互动,透过参与不同的小组讨论和阅读,不断成长。

大一时参加了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乡村访问活动,由是她开始理解一些政治理念和70年代的泰国社会。她读大学时,虽然泰国的学生运动¹已经过去,但是学生运动的遗产仍然留在大学,比如大学中对社会主义和民主——人民参与——的讨论风气,各种服务民众的社团以及与校外NGO的广泛联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大学阶段,P' Nit就非常关注社会平等,并且开始思考民众如何参与社会事务以及实现自己的权利。

大学社团和学生骨干实际上有不同的路线——包括乡村建设、民主、人民民主等——都在试图寻找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P' Nit参加的社团叫做乡村大学,在寒暑假期间去乡村开展社区发展工作,包括农业技术、草本医药、给乡村学生组织营队服务;在开学时,则给城市里的建筑工的孩子补课。在社团里,有很多讨论,也有不少学长提供支持,因此P' Nit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P' Nit正是在大学里开始接触到NGO。那时NGO也非常重视学生,会开放一些空间给学生,比如开办一些座谈会、研讨会等。学生在设计、组织活动方面也会主动

1. 泰国大规模学生运动发生在1970年代,1976年冲突达到极致,有些学生领袖进入了丛林,有一些决定留在社会中进行社会改造。后来一部分学生运动分子开始在泰国组建社会团体,去乡村开展发展工作;同时出版一些和永续农业、和平、进步佛教(又称入世佛教,推动社会公平的佛教)有关的书籍。P' Nit的成长就是在这样逐渐开放的社会脉络下发生的。



身边响起鸟儿清脆的叫声，告诉我自然与我一体，自然在供养我。

寻找校外NGO的资源。P' Nit也参加过抗议修建水坝破坏农民生计的骑单车游行等活动。这些社会实践的经历，以及在实践自然农法的农场的短期工作，让她最终决定继续农业方面的硕士学习。

硕士毕业之后，P' Nit在乡村林业、农业等领域内工作，后来继续完成了博士学位，回到大学教书。到此，P' Nit的个人成长和转化的故事还未完成。她生命道路上的另外一条主线开始平行发展。

内在精神力量发展的道路

因为意识到自己对社会发展的批判和思想上的暴力，P' Nit大学时就开始阅读佛法。多年后，她意识到那时她只是“知道”很多佛法，佛法都只是存在于头脑中而已。

在大学教书之前，P' Nit参加了一个对她一生影响巨大的工作坊——灵性和冲突转化工作坊。

“参加工作坊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是没有真正理解佛法的，原有的认识崩溃了！光

是阅读是不够的。通过禅修竟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我们生气，我们知道自己生气，但还是生气，我们并不能控制自己，做出一些行动；再如，自己想做社会发展的事情，但不是因为我想对方好，而是我要一种成就感，没有觉察，就不能做好想要做好的事情。

在读博士之前我曾经在一个国际机构工作，我是带着很多想改变的希望和欢乐去做事情的，那时我生命的全部只有工作、工作。可后来我和我的老板交恶。我曾经很信赖我的老板，也期望他能信任我对工作的贡献，但是他并不认可，于是我辞职了，不得不放下工作。我觉得很失落且愤怒。这种愤怒在我心里持续了很多年，那种感觉就像失恋。我在这次工作坊中才认识到，这是愤怒的循环，也意识到我当时过分自信，伤害了我的老板，让他找不到自己在办公室的位置。但是当时的情绪和自信，没有让我觉察到这一点。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工具，去更多地认识自己。不应该让愤怒烧毁了我们的生命。我不惧怕身体的苦，但是我担心那些我们

自己带来的苦。就像我说的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的理论。第一支箭是发生了的身体的苦，但是我们因为这个苦有了很多想象、幻象，生出很多想法，这些想法成为第二支让我们很受伤的箭，让我们觉得苦。从那时起我开始觉察自己的生命，也发现自己原来读的那些佛法只停留在脑子里。只有通过禅修，才能活在日常生活里。而且我意识到凭借禅修练习，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我觉察。”

从自己的经历中，P' Nit亲身体会到了自我觉察和培养内在精神力量对个人的重要，之后她在自己的生活里不断练习内观禅修、和平教育和慈悲沟通。但是她却没有机会将这些融合在大学工作中。她对系所的课程设置不满，向学校申请成立一个静心学习中心，也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博士班的学生只是为了拿学位来学习，令她看不到希望。2010年6月，她辞去了大学的工作。

在大学教书期间，她利用晚上和周末

时间在NGO工作，那段经历让她觉得仅仅做外在的培力工作是不够的。她清楚自己的身体经验：内观能消解愤怒，获得一颗平静的心，但是她供职的NGO并不认同这类精神练习的重要性。

2010年7月，P' Nit参加了国际和平正义妇女伙伴中心（International Women's Partnership for Peace and Justice，简称IWP²）的培训，自那时起就开始有了清晰的想法，要将精神练习带入社会转化，将个人转化与社会转化结合在一起。

2011年，P' Nit创立了“培育心灵和社会转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Nurturing Mind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简称INMiST），机构名称有大写I和小写i。小写i是指自己，是很小很小的行动；大写I代表机构，表达一种将精神与社会转化结合在一起的本质。

她之所以强调精神修习、内在力量培养的重要性，是因为她看到做社会工作的



2. IWP是位于泰国清迈附近乡村的一个将入世佛教与性别平等、社会发展结合的培训团体，创立于2002年。关于IWP的介绍文字，请参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社会行动者》和《唤醒身体力量，点亮灵性心光》，载于《比邻泥土香》第六期，2014年。



人常常面对复杂的社区和社会局面,深刻地体验到社会和服务人群的苦难,但是如果工作者自身没有内在力量,将思考、情绪等混杂在一起,无法真正推进社会的进步。所以她觉得工作坊的主要目的是协助参加者发现、肯定自己独一无二的特质,并且通过正念练习——行禅、动中禅等——去增强自我觉知能力,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做出更加清明的行动。正念练习同时也是增加人的内在力量的途径,当内在之光点亮之时,外在世界的黑暗也只会是暂时的存在。

INMiST开展的主要工作有支持年轻人另类生活探索和组织内在力量培养的课程。也就是在2011年,P' Nit开始与社区伙伴合作,在中国开展“自我觉察与社会发展”工作坊,将佛教心理学的观点和工具与社会批判理论结合,将行动者/人的自我内在力量的培养,与对社会如何塑造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分析结合,让参加者意识到人的改变、日常文化和价值观改变的

意义——她认为这是社会转化的重要基础和目标。

自我关爱,与参与者共同体验和创造

第一次参加P' Nit的自我觉察与社会发展工作坊,我便感受到P' Nit非常不同于一些来自香港、西方国家的培训师。她一点老师的权威、架子都没有,就像一位邻家姐姐,非常有亲和力。最近一次工作坊,每天晚上工作结束之后,她都愿意指导我们小组工作,或进行小范围的非正式交流。在工作坊的几天时间里,她是“全然地把自己交给我们,毫无保留”。

P' Nit的工作坊非常强调体验和参加者共同创造知识。她很少会自己先讲一个模型或者理论,一般都是让参加者自己有一些体验和生活经验分享之后,再共同绘制一个理论或者模型。对此她背后的哲学是,如果参加者没有自己的体验,是不会真正领会那些理论、分析框架和工具的。

工作坊强调让参加者减少头脑的思

考,学会用心感受、用身体去觉知。每天清晨都是以瑜伽或者太极开始,工作坊中也设计了正念练习。参加者在这个过程中得以从日常快速、疲惫的工作中抽身出来,面对自己的身体、情绪和妄想,学习安在当下,而且透过不断练习,将正念的杆子往地里越打越深,牵住那如野马般飞奔的思想。这些对于很多参加者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也是走出舒适区的过程。因为对于从现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并且在现代逻辑中生活的青年人来说,我们常常是过于用脑,去思考、去分析、去预计,所以出现了如P' Nit所说的不平衡——我们失去了用心去感受的能力,失去了感知、觉察身体的能力。而她的工作坊正是试图让我们减少用脑,多体验,去觉察感受和身体。

P' Nit非常强调坚持日常禅修练习的重要性。在工作坊期间,每天晚上也有晚课练习,大家一起行禅、动中禅,最后半小时一起做慈心禅。在P' Nit的带领下,大家通过正念练习去培育内心慈悲和爱的种子,将慈悲和爱带给我们爱的人、受苦的人以及那些我们憎恨的人,透过修习去转化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苦楚。

在泰国,邀请P' Nit做培训的机构包括社区组织,参加者既有基层社区的居民,也有NGO中的项目工作人员,从基层劳工到中产阶级都有。培训参加者透过这些工作坊,回到自己,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比如曾经参加过培训的渔民社区的女性、城市贫困妇女反馈说,她们获得了更多的自信。过去她们会带着恐惧去抗争,现在则是带着爱与慈悲,运用内在的力量去抗争。她们意识到自己是谁,自己的特质,自己作为女性有什么样的能力和权力。她们意识到需要回到自己去看到力量的源泉,要照顾好自己,照顾自己与照顾别人一样重要。P' Nit和大家一起刮痧、做瑜伽、拔火罐、按摩,通过这些传统整合医学和身体护理方法让

大家回到自己的身体,从关爱身体开始,渐渐培养内在力量。

P' Nit对自我成长、自我关爱格外强调:如果你不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的需要,自己没有成长,你也无法支持其他青年人的成长,无法支持社区的变化。在她看来,自我成长和推动社会进步是一体的。只有深入地看到自己的需要和成长及其与大的社会理想图景的结合,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参加过工作坊的NGO工作人员反馈,从培训中看到自己身上内化的价值观,也看到自己在面对边缘女性时的歧视。虽然工作中,他们常常讨论很多外在的不公平,但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也内化了这些自己不喜欢的价值观。培训使他们意识到需要不断回到自己,觉察自己,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成长上,这样才有可能做好社会改变之事。

在与参与者的共同学习中,通过体验和创造,P' Nit与参与者们一起探索将个人精神发展与社会发展相融合的道路。

导师般的陪伴

P' Nit在大学教书时就发现很多年轻人想返乡,但是得不到父母的支持。P' Nit觉得这是很让人伤心的事情,“人们有土地,但是不愿意孩子回去,青年人返乡很难立足,做健康农业更被认为是疯子,人们对农业的理解就是为了挣钱,而不是可持续生活”。她和机构都愿意支持青年人返乡或者从事农业,因此P' Nit筹款成立了青年基金,提供资金给希望返乡的青年,支持他们回到土地的梦想。这个基金还有个很特别的要求:参加者必须做正念练习,P' Nit会将他们送到寺庙参加多次的十日禅修。

P' Nit陪伴这些年轻人成长,有求必应,虽然她也反思,对他们的支持有些过多了。年轻人的成长真的需要漫长的过

青年伙伴眼中的P' Nit

程——有时候她也感到有些沮丧，但是她依然持续支持这些年轻人。比如有一个青年在村子里做另类学校，邀请P' Nit去给孩子的妈妈做培训，她欣然应邀前往。另外，她也支持了一位老挝的女青年做本土健康的工作。过去三年里，P' Nit还将青年人送去学华德福教育，支持他们学习灵性教育。

“我希望通过培训让大家相信，透过自己的内在力量和集体力量能够促进社会改变，我希望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可以在每人每日的生活中践行。给他们一些工具，让他们更加独立，既是个人的独立，也是社区的独立。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有选择，必须将孩子送到学校，去医院看病，将产品卖给市场。我想让他们看到自己有很多选择。正如整全的医学可以比医院更好地照料人们，事实上现在有很多比主流学校更好的教育，主流学校反而会让孩子毁掉。总的来说，我希望通过培养人的内在力量让他们看到他们有很多选择，可以创造一个另类的社会。”

P' Nit在过去四年通过和中国的NGO青年工作者相处，对我们也有一些观察。P' Nit感觉到中国青年伙伴对学习有着非常强的渴求，因此非常积极主动。而且她看到参加培训的青年伙伴很坦率，有什么想法都直接表达出来，她能感受到我们是真正地在寻找和学习，而且她看到我们是在寻找我们的“根”，寻找我们自己。

但她也留意到中国的青年一代面临的一些限制：她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可能让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在与人相处方面不太灵活

和有弹性，有时候不知道如何妥协。另外，她认为我们这些青年人和泰国的青年人相比，可能身边的前辈更少。与其说青年人需要偶像或者模范，不如说青年人的成长需要有导师在路上的陪伴和适时的指引。在泰国，社会发展作为一个领域的历史较长，因此，40多岁、50多岁、60多岁的前辈都很多。泰国NGO领域的兄弟姐妹情谊也较深，一些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也和NGO关系紧密，所以泰国的年轻人在这样的社区里，可以更容易吸取到养分。

相比之下，中国青年人所处的成长环境更有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她觉得更要建立一个“僧团”——犹如一个互相支持的、由人组成的“社区”。大家在自己的“社区”里，多做一些动手的工作，多和自然在一起，而且不要觉得自己和“主流”不一样。P' Nit分享她的经验，她常常和自己工作领域以外的朋友或者社区居民交流，不让自己显得和别人不一样，而是尝试去听每个人的想法、理解他们的生活、在每个人身上看到美。当我们有一个美好、放松的心灵时，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也会不一样，我们也更能和对方分担苦难。

从某种意义上讲，P' Nit每年来一次中国，称得上是位遥远的老师，而所有参加过她的工作坊受她影响的青年伙伴，或许可以具备组成一个“僧团”的基础。就像我的同伴所表达的那样，P' Nit像身边懂我们的导师和伙伴，在适当的时候擦亮一根小火柴：这里可能有路，或者，有光和温暖。于是大家再摸索着，在未知中前行。☘

过去几年与P' Nit多次交往，她帮助我开始了内在生命的转化。我觉得，她能看到我内心深处的不安和恐惧，能够体会我复杂情绪和神不自信表现的背后，是因为对爱、接纳、认可的需求未被满足。而她，毫不吝啬地用微笑、欣赏和爱语拥抱我，让我感到被滋养，让我看到自己的美丽和价值，从而能够自我满足这些多年缺失的需求。对我而言，不仅是她带来的课程让人受益匪浅，她的慈悲和个人魅力更能带给人勇气和能量。

她对传统文化、传统医学的热爱也有目共睹。每次来中国，她都会带走整箱的中医用具，我们戏称那种有穴位的人体模型是她的“男朋友”，而她每次都要带几个“男朋友”回家。虽未亲眼所见，我相信她为泰国的乡村妇女、返乡青年刮痧、拔罐时，必然是正念地奉献着。

李健

初识P' Nit是在成都机场，我举着一块写着她名字的牌子在出口等候，心中忐忑地猜想着这位培训老师是什么样子的，还担心她出来要和我打招呼，我那开不了口的英语呀，真是着急。以至于后来她每次都要和我开玩笑，说我见到她时就告诉她我不会讲英语，别和我说话之类的。

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位老师和我的关系，她在我整个人生特别交困的时候出现，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我参加过最受益的培训就是在成都的那次“自我觉察与社会发展”工作坊，我第一次细致地看待自己的情绪、痛苦，练习觉察，深深感受那是多么的艰难。我总觉得修行是痛苦的，因为你时刻对抗的是那个内在的、传统的自己。它让人清晰地意识到此刻你站在哪里，在想什么，在时代的、个人的脉络下交织的那个十字路口是在哪里。

韩红梅

感觉P' Nit在我的个人成长路上，有着特别的意义，却又无法浓墨重彩地说出来。

2011年第一次跟P' Nit学习，两年后再次参加她的“自我觉察与社会发展”工作坊，以为自己是“好学生”、特别热心和尝试坚持练习的我，竟听到她对我说：“你完全没有理解静修是什么。”我当时感觉很委屈，不服气。又过了一年，我才体会到那时自己是如何将静修理解成了对自己的分析：看到自己的想法、模式及原因。

今年静修的练习多了，却愈发困惑：静修是为了什么？听说这是一个“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过程。我尝试去实践。但那到底是为了什么？问P' Nit，她说，就当它是每天早晚给心灵洗一次澡吧。后来，我愈发体会到这个回答对我的意义。

个人成长、修习的路，每个人都不一样，功课不同、风景也不同，在没有走到那里的时候，前面是未知的，甚至是漆黑的。比起可以浓墨重彩去形容的指路灯，P' Nit更像身边懂你的同伴，在适当的时候擦亮一根小火柴：这里可能有路，或者，有光和温暖。于是你再摸索着，在未知中前行。

曾颖芳

农的芬芳， 还要一代代流传

编者按

与专题中的另四篇有所不同，这篇文章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南腹地侗族传统相对保持较好的乡村社区——流芳村，青年人的“导师”是一位一直生活在家乡土地上的农民——吴世先。

对于第一次听说流芳的读者，在此有必要做个简要的介绍：流芳村，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茅贡乡的一个侗族村寨，距离省会贵阳有四百多公里，因为近十年的有机农业实践而小有名气。

中国有上亿的农村青年，他们的发展有什么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与更好的社会、更好的生活之间有什么关系？农村有什么样的传统和智慧去承载青年人的成长？

青年人成长的话题，本已宏大而深刻，再与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历史和近十年不同寻常的发展过程的乡村社区结合在一起，就变得更加有趣，但同时也似乎变得多倍的复杂——变化中的、真实的乡村社区，和生活在这一代代的人们，他们的故事非常丰富和厚重，其中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和层面，都是既重要又细致的，但是囿于有限的相处时间、观察视角和成文篇幅，这里很难缜密地呈现一个村寨的人与事的全貌，经过颇为艰难的过程磨出来的流芳故事由以下不同的角度组合呈现：



流芳村。

社区伙伴贵州办年轻的工作人员詹炜和编辑高雪松一起探访流芳，一边参与体验村庄生活，一边抓住各种机会与吴世先会长对话，通过访谈了解吴会长的人生经历以及对青年人成长和返乡创业的看法；

贵州乡土文化社¹项目官员张传辉，以一名侗族青年的视角，通过日常的观察与对话，叙述了他所知道的流芳故事，从另一个侧面勾勒出流芳青年及其背后的长者的生动形象，让我们更真切地体会到青年人与父辈、与社区的关系；

在以上两场青年人与吴会长的对话之外，我们还邀请社区伙伴贵州办项目经理黄寅作了一点背景补充，给我们诠释了故事所处的社区和文化场景。吴世先会长的思考和选择，不是凭空而来，其背后更深层的是流芳这样的传统村寨怎样面对自己的现在和将来，守住自己的“根”。

青年人，无论是外出或是回归，其实，不同的选择终究都是要回应两个问题：一是生计，二是意义。无论“回家”的心愿多么殷切，青年人回归的过程并不简单，青年人回来能为自己、为村寨做什么，村寨又能为自己的青年人做什么，不只是青年人要面对的问题，而是青年人和父母长辈甚至整个村寨都要面对的问题。希望可以通过以下相互补充的不同视角，帮我们更好地看到乡村的变与不变，不同代人成长的变与不变，更好地理解当今乡村社区和青年遇到的挑战以及他们的力量所在。

1. 贵州乡土文化社是致力于协助少数民族社区实现基于文化自觉的可持续发展的民间机构，成立于2008年。



吴世先, 1982年初中毕业后就留在家乡务农, 种田之外也种过药材、做过木工, 2005年, 社区伙伴和贵州大学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在流芳村推进有机农业实践, 他是第一个主动参与有机农业的实践者, 也是社区中重要的推动者之一, 因为是“流芳有机农业协会”的会长, 大家都习惯称他“吴会长”。在他近十年的影响和推动下, 全村164户近700亩稻田全部实行了有机耕种, 如今也已逐渐影响到周边村寨的部分村民。

作者

詹炜, 社区伙伴贵州办公室员工。爱好自由自在的生活, 从职场“半路出家”开始做公益, 做过社区伙伴的文化实习生, 也做过行动援助的青年实践者, 关注农村文化和可持续生计发展, 做过国际NGO的项目质量支持, 也参与过草根环保NGO的发展转型, 最后沉淀下来, 坚持在农村社区做一些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高雪松, 毕业后十多年的社会生涯都在NGO度过, 供职过几家机构, 中途曾因深感内心力量跟不上, 困惑和批判越来越多而停下脚步以寻找内在力量。近两年自由边缘人的工作状态, 虽离社会发展动态有点距离, 却因为外在事务的减少而有更多内在的觉察, 多了时间和空间看清自己信仰之事与生活的关联, 也为生命增添了更多可能性(如自我觉察, 朴门永续), 心里为此增添了几分踏实。虽近不惑之年但还是“青年”, 但愿前方的困惑不会总是限制行动, 也期待在行动中有更多的相互陪伴与支持。

张传辉, 贵州省黎平县龙额村80后侗家人。2003年至2009年在外打工, 2010年春节回乡开始组织公益助学活动, 召集当地青年组建“龙额侗寨公益团队”, 持续在家乡开展公益和文化纪录的活动。2012年4月加入贵州乡土文化社后, 执行了机构在贵州省黔东南州的瑶族、苗族和侗族地区的项目。



回到村寨, 支持青年人的另类选择

访谈/文_詹炜、高雪松

2014年8月下旬, 我们为访谈吴世先会长在流芳逗留了几天。会长白天忙于协会和流芳有机米销售的事情, 中间还会抽空带着我们转寨子, 介绍寨子的人、事、物及其变迁。那时正值农历七月末、八月初, 农活儿不算太多, 走在寨子里, 我们看到有机种植的老品种水稻在田里静静地生长、成熟, 看到有几户人家在修房子, 其他村民去帮忙, 看到妇女用传统方法染布、晒布的身影, 还听说那些天每家每户都有人去投工投劳, 修寨子背后山上的一段公路……所感受到的流芳的脉搏, 既有自然的活力, 又宁静而有序。

8月25日那天, 正好赶上寨子里有两家为孩子办升学酒, 今年考上大学的一男一女两位青年人, 即将离开家乡步入大学校园。当天, 全村人几乎都出动去两家道贺吃酒, 我们也跟着同去, 还有不少人专程从村外赶来, 客人们送上礼金、点起鞭炮, 庆祝的气氛像过节般热闹。

在流芳, 每年考上大学的青年人不算多, 大多数青年人在读完初中或高中后就出去打工了。和其他地方的乡村一样, 不少毕业后离家外出打工的流芳青年, 也“适应”了打工生活, 挣了钱, 回家结婚、盖新房子, 然后再出去打工……对于考上大学的流芳青年, 四年大学之后也要面临下一步的选择, 而以往考大学出去的流芳青年, 目前大都留在城市中, 寻找自己的位置

和价值。选择留在城市打拼还是回家? 对流芳的青年人来说, 是对两种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未来的选择。

吃升学酒那天的晚上, 吴会长在忙完家务和参加完寨子中的一些活动之后, 就坐在炉桌旁, 一边抽着烟一边和我们聊开了。那晚我们不聊有机稻米种植技术, 也不聊有机农业协会的发展, 而是聊与社区的青年人成长有关的话题, 以及他自己的经历。

我们猜想, 吴会长能够在这十年坚持有机农业实践, 并成为流芳的一名重要的社区带头人, 应该和他之前的历练有很大关系。他对往事的回忆印证了这一点。

当年的创业青年吴世先

吴会长说, 在流芳, 对青年人的界定不是以年龄来界定的, 也不是以是否结婚生子来界定, 而是以这个人是否成熟来判断。他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来说明: 比方说, 田里的水干了, 要放水到田里去, 让青年人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只是去将水放到田里而不做其他事情, 就说明他还是个青年人, 没有成熟, 而如果他不但去放了水, 还去检查了水渠, 修补了水道, 了解稻田缺水的原因, 就说明这个人想问题周全了, 那么他在老人心中就成熟了。

吴会长1965年出生, 是家族的长子长孙, 从小就帮助父母做家务, 照顾两个弟



我多么希望他们能留在家乡，留下来影响同龄人……

弟和一个妹妹。勤劳踏实的父母，对青少年时代的吴世先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榜样作用，吴会长在少年的生活中就已养成了承担责任的自觉性。1982年初中毕业后，他就留在家务农，种田自给自足、养活家人，后来成年结婚分家后，肩上的责任更大了，他更有意识地开始思考：在家乡有怎样的发展空间，怎样改善家里的经济收入。离开学校后，他保持着学习的习惯，常年订阅《科技报》、《中国青年》、《农村百事通》等报刊杂志，了解和农业生产有关的信息，有时他直接写信给有关的科技部门，甚至花钱去购买感兴趣的重要信息或资料——种植茯苓的技术就是这样得到的。第一年试种茯苓成功，第二年青年吴世先便约了同村的好友石远金一起去信用社贷款，扩大茯苓种植量。“我们是寨子里第一个去贷款的，贷了七百元。当时别人都说我们傻，父母也害怕我们失败，但因为有了第一年的尝试，并且有人愿意收购，我们还是比较大胆地去做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农村里逐渐有不少人出去打工，能够自己创业的人

非常少。会长记得当时寨子里有创业潜力和想法的青年人有三、四个，但他们后来都出去了，只有他和一起种茯苓的朋友留在家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朋友通过种茯苓的收入积累了资本，去学习裁缝，在坝寨开了一家服装店，实践自己的创业梦想。吴会长还是很坚定自己的想法和道路，坚持种植茯苓，四、五年后，家里的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除了种植茯苓，吴会长提到另外一项在我们听来很有意思的创业行动——改木料做家具。会长的爷爷在世的时候，是寨子里当时的两位木匠之一，会长跟着爷爷学过改料，掌握了基本功。后来他还在附近的家具厂学过艺，当时有市场需求，他就与其他人合伙开个工棚，改料加工家具，在那一段时期，这项收入是保障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

吴会长青年时期走过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曾经也尝试种竹荪和木耳，但都遭受了损失，经历过失败，也有低沉和挣扎，但没有因此否定自己，而是继续勤奋踏实地行动，积累经验和智慧，在坚持和调整中摸索平衡。吴会长缓缓地、平实

地讲述着自己青年时期的人生经历，听起来似乎波澜不惊但又与众不同。从吴会长的回忆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在勇敢尝试和承担责任中，不断探索自己存在的独立价值、自己与自己以及与外界关系、逐渐走向成熟的青年。

会长说，自己早年的人生经历，甚至没有跟自己的孩子们讲过，他也想找个机会，把孩子们聚在一起，给他们讲一讲自己的人生经历。

今天的流芳，“农”还是出路

和其他村寨有些不同的是，近几年里已经陆陆续续有十来位流芳的青年人回到家乡，包括吴会长的女儿、女婿和儿子、儿媳。这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外的打工生活，除了现金收入之外也很难带给人更多的安全感和成就感；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流芳的有机农业“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发展，除了在外的名气，也更让身在其中的流芳村民体会到自己生活中的农耕实践与侗族文化、与流芳所享有的自然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大家内心里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悄然增加。

吴会长告诉我们，流芳这些年有机农业做得有声有色，大家意识有很大提升，

也有越来越多外面的人关注流芳，来流芳交流、学习或旅游，带来了许多的机会，给青年人开放了很多的空间，协会和他本人都一直鼓励青年人回来，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看青年人自己的想法和行动。

和当年的青年吴世先相比，当下的流芳青年并不缺乏想法，有不少近年回来的青年人都想过在家乡搞药材种植或特色养殖，也确实有人有过一些实践，但能迈出第一步并认真坚持下去的人，目前还很少。

吴会长也很理解现在的青年人。他说，现在的时代，电视、网络发达，获取信息的途径也多样，人们的思路更开阔，青年人会面对更多的选择，机会与诱惑并存，难免会让人变得不够专注而有些浮躁。吴会长能体会青年人有他们自己的困惑，愿意多和他们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村里事务、协会事务，只要有年轻人参与的地方，会长就会参加，听听年轻人的想法，或者给些适当的建议。“青年人在面对选择的时候犹豫不决，做长辈的，要给他们一些引导，给他们创造一些机会，让他们有信心，让青年人慢慢成熟起来。”

尽管如此，吴会长倒并不太鼓励刚毕业的大学生马上回来创业，比如，流芳有



他在属于自己的生命历程中踏实地走下的每个足迹……

一位已经大学毕业在外工作几年的青年人，现在在深圳工作，做某品牌土猪的销售，像其他很多流芳青年一样，他每次回家都会找会长聊天，也很愿意听吴会长给他的建议。会长给他们在外奋斗的年轻人的建议是，可以先在外面学习知识和技能，积累经验，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回家来创业。

吴会长说自己对有远见的青年人是寄予很高的期望的。“我是多么希望他们能留在家乡，留下来影响同龄人，一代一代都留在家乡，把热血洒在自己的家乡，那该多好！”他在访谈快结束时说的这一句话，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吴会长还说，流芳的农耕文化保持至今，几百年来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虽然在过去几十年受到外界的干预和影响，一度让流芳丢掉了一些老传统，但是因为文化的根没有断，随着人们的意识提高，很多传统的东西还是能找得回来或者重

新构造的。他相信，未来三十年流芳的农耕文化也不会有大的变化，还会这样延续下去，而现在的青年人必将成为未来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吴会长希望有更多的青年人能够回来，回到家里做一些事情。

我们对面这位社区带头人，除了具有敢拼敢闯、坚持不懈的企业家精神和与身边同时代人不同的人生经历之外，还有发自内心的对自己的孩子以及其他青年一辈深沉的关爱。他的人生经历和他对成败接纳的态度，正是他能够支持和理解现在的青年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我们从访谈中了解到的吴会长，语言平实，想法实际，情感真挚，他不擅长谈论概念、理论，甚至没讲出我们所期待听到的他如何陪伴青年人成长的精彩故事，但是，这位社区带头人，在属于自己的生命历程中踏实地走下的每个足迹，或许正是影响本村寨的青年人、引领他们回归到自己社区的路线图。

青年人在村寨扎根

——流芳青年与社区相互磨合、陪伴的“家事”

文_张传辉

第一次有机会了解流芳，是在我加入了贵州乡土文化社不久后。在流芳做田野调查的那几天里，我们走访了村里的寨老、歌师、木匠，也认识了村里的许多青年人。用“许多”这个词是没错的，因为我在流芳看到的在地青年比很多村寨都要多。

那些天都住吴会长家里，记得那一次和吴会长聊到有机农业，聊到青年人。他

说，“流芳做了很多年的有机农业，但是青年人参与进来的并不多，大部分的中青年还是在外打工。有少部分懂得做古建筑的青年跟着工匠们在黔东南范围内打短工，这个季节是古建的淡季，所以还能看到一些青年在家。”说到这，在吴会长那俊朗的面孔里我看到了他的无奈。他又说道：“我希望村里的青年都能留在家里，

有青年人在家，村寨才有活力。”可当我问他“怎样才能留住青年人在家”的时候，会长又一次无奈地说，“也找不到好的办法。”

直到现在我都承认我的问题有点急或“刁钻”了，但我当时确实很想听到一些反馈，因为在我的家乡龙额，和流芳一样，也是侗寨，一方面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外务工，掌握传统知识的青年人少之又少，传统文化的传承已经出现断代；另一方面，有一些已经回来的青年人和我当初返乡的状况是一样的——鼓足勇气回来后却很是茫然。村寨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回来，但是大多数人却都要面对“回来能做什么”的现实。我当时希望面前这位和我父亲年纪相当的会长可以给我一些答案或建议。

那次田野调查，也让我结交了几位流芳的青年人，包括吴会长的儿子吴健康，还有石庆刚、石运贵等，因为都是80后，也说着共同的语言，所以很容易就成了朋友。

其中有一天，这伙青年人招呼我们去山上搞野炊，地点在流芳的水库旁边。水库其实不大，却是流芳的消防安全、洗菜洗衣服的重要水源，周围景色很美，水库边还修了一座风雨桥供劳作的村民歇脚休息。我们闲聊的时候又说到了生计的问题，其中石运贵说，“想要在家发展养殖业，水库可以养鸭子，山上可以养鸡。”马上旁边的一位青年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水库是整个寨子生活用水的水源地，在水库养鸭子就破坏水源了，村民肯定会收拾你！在山上养鸡还差不多，可以把山上的荒地都利用起来。”

流芳小伙伴们热血沸腾的“创业计划”让我印象格外深刻，也特别留意他们

的动态，后来就陆陆续续听到流芳的小伙子在养鸡养鸭，组建文化传承兴趣小组的消息。

2013年1月，因为要协助广西实习生²在贵州的拜访学习，我又一次到了流芳。那时，青年们个个都是“养殖户”了。吴健康拿了父亲的一万块钱和他姐夫石庆刚合伙在山上搞了个养鸡场。石运贵和石老小等四人也在山上养着走地鸡，还在水库里养起了鸭子（因为四人都染着黄头发，取名叫“潮男组合”）。大家的定位其实都很明确：生态小香鸡专供高端市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们的鸡吃的都是有机大米，肯定要比市场上贵”。销售渠道除了本地市场，还在建立网络销售平台。我不懂养殖，也不了解市场行情，所以不能判断他们发展养殖业的前景如何，但是我对于“潮男组合”可以在水库养鸭子就有些意外了。后来到村里和一些村民以及吴会长谈起这事，吴会长说：“水库的水不仅用作灌溉和消防，村民还用这水洗菜、洗衣服。几个青年在水库养鸭子确实会对水源有影响，有些村民也确实有怨言，但是这些青年要不就是谁家的侄子，要不就是谁家的兄弟，整个村寨就像一个大家庭，谁都不好太直接地说，更重要的是青年人在家能够做点什么事情，总比无所事事要好啊。”听到这番话，我顿时觉得既欣慰又忧虑。欣慰的是流芳青年们的创业能够得到家人和村民的支持，忧虑的是如果影响了村寨的正常生活，那这条创业的路会走多远。

那次走访，印象很深的还有青年们的“文化传承兴趣小组”。因为外出参加社区伙伴组织的参观学习受到启发，流芳的青年们自发成立了这个小组，开始去重新

2.社区伙伴与广西大学农学院合作，在广西开展青年实习生项目，支持青年人到关注生态农业、社区支持农业的广西民间公益组织全职实习一年。期待青年人在行动中得到成长，找到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和位置。

认识自己的村寨。小组的骨干成员是吴健康,我和他聊起养鸡和兴趣小组的时候,他说:“在湖南的阳烂侗寨看到一位老人很用心在写自己的村史……我觉得很惭愧,我们这一代对村寨的历史了解太少,所以回来后,我们在家的青年就成立了这个小组。以前在家没事做,觉得不仅家里人会讲,村里人也会说三道四。自己也觉得没出息,感觉很不舒服。现在我们创业,家里人还是很支持的,留在家里的青年多了,要做什么事情也就容易一些。”

走访期间,广西实习生与流芳文化传承兴趣小组的成员在吴会长家交流,来参加交流的不仅有年轻人,还有村里的寨老和吴会长。谈话间,寨老们和吴会长时不时地替这伙年轻人纠正或补充一些村寨信息,说到村寨的过去,老人们神采奕奕。整个交流更像是一个村寨故事会,青年人和他们的父辈、祖辈在一起回忆他们的村庄。我在一边被感染着,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这是长辈和后辈之间的对话,也是村寨过去和当下的对话。长辈更多的是缅怀,青年人却在这样的对话中增加了对家乡的了解,也增加了对家乡的认同。我在想,这种“认同”能不能成为青年人返乡和“留得住”的根本和动力呢?或者这种“认同”的动力能有多大?我希望在流芳的这伙青年人身上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在后来的两个月里,得知流芳文化传承兴趣小组在村寨寻碑、学烧木炭,活动做得风风火火,在流芳甚至周边村寨都产生影响。同时也得知,青年们的创业也受到沉重的打击。吴健康和姐夫的养鸡场最后亏了,吴健康跟父亲拿的一万块钱也打

了水漂。“潮男组合”虽然没有亏损,但养鸭对水库的水质产生影响,让村民抱怨不已,所以在把第一批鸭子卖了过后就没有继续了。对于这些青年人来说,2013年的春节或许是个苦涩的春节。我和健康在电话里聊,他告诉我,这次创业失败打击很沉重,大部分的青年在春节后又出去打工赚钱了。他和姐夫亏损了,父亲也没过多抱怨,而是和他们一起总结失败的原因。

2014年5月5日,流芳村举行了一次“招龙迎萨”的祭祀活动。用寨老的话说,就是要把流芳“后龙山”的龙和“萨岁”³重新请回来庇护村寨。整个村寨都因为这个活动而动了起来,吴会长和儿子健康也各负其责,会长负责策划游行活动,而以健康为骨干的流芳文化传承兴趣小组负责晚上的文艺晚会。整个活动庄重、热闹、有序地圆满完成。那两天里,我发现村里的青年又多了起来,我和一位青年石伟闲聊的时候,他说:“我家去年遭受了火灾,加上村里还发生了一些大事,寨老们认为是保佑村寨的‘萨岁’已经离开村寨了,所以就召集村寨来做这个活动。长这么大了,我也是第一次参加。村里的很多青年都回来参加这个活动了,除了热闹,每个人也都希望能有‘萨岁’保佑,平平安安的。但是活动结束了,很多青年又得出去找钱了。”

第二天,我们邀请了流芳村里的寨老、吴会长和青年人,还有其他三个村寨的青年人,大家坐到一起来聊各自的村寨现状、传统文化传承的想法等等。在交流会中,流芳的青年在和寨老讨论后,大家想要号召全村人来修复荒废已久的“萨岁水塘”⁴。在随后的两三个月里,青年人跟妇女们收集关于“萨岁”的侗歌,去听老人



讲关于“萨岁水塘”的故事,召集村民来开会讨论怎样修建水塘。我们参加了青年们的几次走访和会议,也感受到了青年们的热情和无力:青年人流动性太大,以吴健康为主的几个青年人感到力不从心。修建水塘不仅要人力,也需要财力,如何募集修建水塘的资金是青年们觉得很困难的事情。

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一位青年说:“想让村民来投工投劳大家都会愿意的,因为这个是村寨的传统,但是要村民出钱,村民是不会信任我们的。”在一旁的我仔细琢磨,也觉得不难理解:在侗族的传统社会组织机构里,青年人的作用和社会功能还不足以能组织一个公共事务。所以我很钦佩流芳的这几位青年人的勇气,也期待看到大家如何来应对这样的困难。在一旁的吴会长默默地注视着讨论得热火朝天的青年们,和很多时候一样,虽然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很有力量——“水塘是很有必要修复了,会让更多的人知道流芳的故事,而且水塘也有消防的作用”,“你们可以先去做一下民意调查嘛”。我知道在吴会长那里还有支持青年人行动的一笔经费,如果要拿来修建水塘是足够的,

但是吴会长却没有任何表示。或许他在观望,也在期待看到他儿子、这伙青年是怎样克服眼前的这些困难吧?我想是的!

迄今为止我在流芳遇见的故事,是相互磨合、包容和陪伴的“家事”。同样作为一名青年人,在流芳遇见的这些故事也引发了我更多的思考,回过头来看,我问吴会长的那个问题或许已经有了一些答案。

青年人返乡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返乡”。记得一位老师说过:“返乡的心态很重要,如果返乡只是为了创业赚钱那还不如进城打工。”这话听起来虽然尖锐,但是也在提醒着我们,不能只拿经济收入作为衡量返乡价值的唯一标准。

许多人在关注青年人成长,我觉得青年人成长就像是种树,家庭和村寨是青年人成长的土壤,信仰和价值感是土壤中的养分。树,耐心地把根扎稳,才能汲取土壤的养分,才能枝繁叶茂结出果实。家庭和村寨也需要给予青年人更多的理解和包容,这片土壤里的根密了,“水土流失”少了,一棵棵树苗就能变成森林!

不善于总结的我,在落笔之时想起我的家人,想起我的村寨,在我的成长路上给予了我的那些巨大能量!

3. 侗族南方方言区普遍崇拜的女性神,称为萨岁,意为始祖母,是最高的保护神。人们都认为她的神威最大,能主宰一切,保境安民,使六畜兴旺,村寨平安,几乎村村都设有“萨坛”来祭拜萨岁。

4. 流芳村“萨坛”旁边的一个水塘,在流芳村的一首祭萨古歌里唱到,这个水塘是“萨岁”用来洗菜洗衣服的。



社区守住自己的“根”

文_黄寅

流芳村从2005年开始发展有机农业，到如今快十年了，只要有其他村寨问及“有机农业能赚多少钱”这个话题，村民就会打趣地说：“你看到我们寨子哪家搞有机农业发财的嘛？有机农业，更重要的是吃得健康、环境健康，不为发财。”做有机农业这些年，流芳每年卖出大米的量变化不大，都是十二、三吨而已，村民要留下自己的口粮、牲畜的口粮和人情往来的稻谷，之外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才会售卖。

这几年其他寨子每年都有好几位老人因病过世，但流芳连一位因病过世的老人都没有，（流芳的村民）认为可能和农耕实践的变化直接相关——有机农业不仅让大家吃得健康，连稻田里面的鱼和鸭子也健康，喝的水也干净，寨子里热热闹闹，老人心情愉快，身体健康。村民意识到这些健康的山山水水是寨子的根，要好好保护下来，一代代传下去。

侗族有一句谚语叫“分山不分水”，意思是，山可以自己管好，但是水是流动的，是共有的，分不开的。侗族是住在水边的民族，流芳的村民已经开始意识到，如果

只有一个村子搞有机农业，生态还是保不下来的，只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管好水。

村民能够管好山水自然，靠的正是寨子的农耕文化，所以农耕文化也是寨子的根。前年流芳有机农业协会开年会，特别奖励了村里还在养牛的老人家，好多老人到台上去讲话时都哭了，老人说：“我的孩子们都劝我不要养牛了，养牛很辛苦，很麻烦，但是我觉得牛是我的老伙伴，我以前是放牛娃，现在是放牛翁，家里没有年轻人，我的心里话只有和牛说，农村没有牛怎么是农村，搞有机农业怎么能不养牛。”还有农户特别钟情于老品种的保护，觉得这样才是对得起祖宗。另外，换工互助也被农户认为是传统农耕最重要的一部分。

听一位侗族的老人家说过这样一句侗族谚语：“江山是主，人是客”。侗族村寨里的长辈们相信，只要守好他们的根，守好他们的文化，年轻人自然就懂怎么走下去。千百年来，村寨守护着自己的“根”，然后以各种形式运用各种平台影响和传递给年轻人，再陪伴年轻人慢慢地走下去。■

后记：寂寞繁华皆有意

文_郝冰

郝冰，现任北京天下溪自然学园园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毕业后在北师大任教，后投身于民间环保教育。先后在自然之友、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任职，并于2003年创建公益机构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主要工作领域为儿童自然教育，乡土教材开发，草原保护及贫困大学生能力提高等方面。译作《生命之家：蕾切尔·卡逊传》、《与孩子共享自然》、《森林中最后的孩子》。2010年和杨艳老师在北京合作创办天下溪自然学园，践行华德福幼教理念。2011年开始担任中国华德福幼教培训与督导项目北京培训中心协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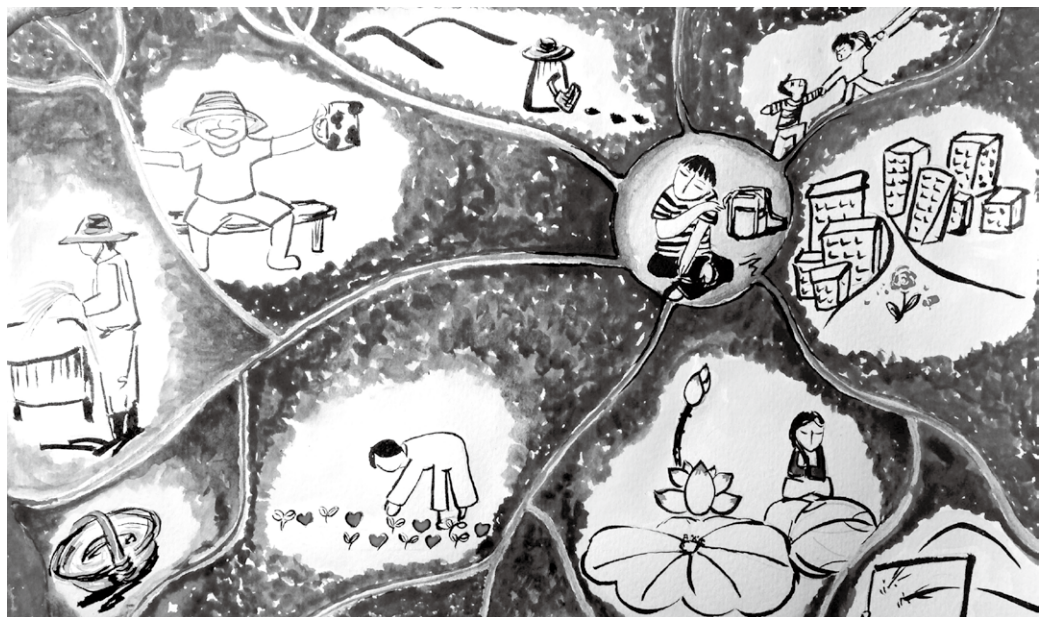
这是一组拟定在青年和青年导师之间的对话，青年都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公益圈，年纪在三十岁上下。青年导师来自大陆、台湾和泰国，多六十年代生人，活跃在社会发展领域。读罢，感觉这一场对话未相遇似相遇，意犹未尽。

易昆，来自台湾芦荻社大，不认为自己是青年导师，戏言自己是“青年牛奶”，台湾社会运动浪潮中的一位随行者，在野百合运动、工人运动以及社区营造运动中，皆沉浮其间。从最初的广场运动中获得存在感，到工会运动时期寻找“自我”与“世界运作”法则的困惑与恐慌，再到芦荻社大时期“陪伴青年真正地诚实地走一条发展自己也发展社会的路”的确定。一路走来，“自己”与“社会”似未海晏河清，但其从自身处境诚实应对，以一个真人，渐渐演化出宽容、温厚，松紧适宜的气象，吸引身边对社会运动有志愿的青年，和他们诚实地分享自己的经历、看法，引导他们诚实地面对自己未来的道路。

易昆在广场上获得政治启蒙的时候，陆

晓娅正在开疆辟土，在《中国青年报》旗下创办了“青春热线”，关注个人的生命状态。温婉的态度之下，有来自知青时代实际而深刻的生命经验与社会体验，从集体主义人格中裂变出的自觉，进而关注其他个体的生命状态。“青春热线”陪伴着热线那端的听众，也陪伴着这端年轻的志愿者，同时激发着晓娅在心理学的启迪下对人一探究竟。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运动和风起云涌的经济大潮前，在天意与人事之际，从青春热线到歌路营，对于人、对于生活的那份理想、温良与坚持，晓娅恰恰行得。

晓燕与晓娅，似不同实相同，都是冲破时代的雾霾才见到蓝天的勇者。梁晓燕直面生死大事，无一丝苟且与游移。与其说这勇气来自学问与知识，毋宁说来自天性与良知。公益圈大多数青年识得晓燕，多在她演讲的场合，往往觉得慷慨激昂、煌煌而论、侃侃而谈，有距离感甚至眩晕感。在她自己实则道情清旷，真诚磊落。实实在在接得住的青年也确实需要胆气与诚实。晓燕是自觉的青年



导师，除了希望青年人明理，更为难得的是，她和青年人在实际的工作关系与具体的事务中能做到尊重青年的主体性与发展，善莫大焉。当你知道她会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飞抵项目现场，只为陪年轻的工作人员，听她讲心里话，那个对青年温热侠义的梁晓燕就跃然而出了。

P'Nit来自泰国，跟着心中的愿望越走越远。在大学时代，走出家庭的圈子，走到社会运动中，获得农林学的博士，但是未止步于一个社会活动家和一个专家。而是在切实的生命关系中意识到自己的暴力与批判，走进灵性的领域，不断内观，让内心成为世界的舞台，了悟到：如果人不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的需要，自己没有成长，就无法支持其他青年人的成长，无法支持社区的变化。她决定将精神练习与社会转化结合在一起。从居民到NGO工作人员，从基层劳工到中产阶级，从泰国到中国，她在践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从修身开始，从完整统合的身心灵出发。参加过她工作坊的青年人说：“P'Nit像身边懂你的导师和伙伴，在适当的时候擦亮一根小火柴：这里可能有路，有光和温暖。”

吴世先，生活在黔东南的侗族村寨流芳村。他有农人的情怀，明白人与天地相通的本

分，回归土地回归传统，2005年他第一个在村里开始实践有机种植，历经10年，全村164户全部实现有机种植。他内心呼唤着村里的年轻人，“我是多么希望他们能留在家乡，留下来影响同龄人，一代一代都留在家乡，把热血洒在自己的家乡，那该多好！”在这个物质主义昌盛的时代，那些在城市里，彷徨、疏离、边缘的，浮光掠影找生活的青年人，什么时候能回来，扎下去，能在世代相传的土地上力气饱满、意气扬扬地耕出一条活路？现实的生命，容不下空谈，行胜于言，道不远人，温和自耕，行为世先，永续流芳。

在对话中，青年人更多地把自己放在了提问者 and 倾听者的角色。这些青年人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地寻求自我，希望在社会中探求一条有意义的路，但内游外求间，仍显迷茫与游移，甚至轻易地在对话中就丢下了“我”，放下了“我”，所以外在的路难免会偶感沉重与抑郁，失却活泼清朗的生命气象。青年导师的意义就在此时吧，在青年前行的路上，有那些温厚、温良、温热、温暖、温和的目光会在他们身上停留，而青年导师亦会在心灵与行动中开辟一个空间，让青年人亦主亦客地驻足。不过，终究路还是要自己走，寂寞繁华皆有意。☺

见·远



把人当回事的经济人生

文_曾德平

导读

提到“经济”一词，今天我们会想到甚么？国民生产总值？赚大钱？做生意？国际贸易？

英文economy一词源自古希腊语oikonomia，词根包括家庭/家居及管理两个部分，令人联想到本来这词就是指涉家居生活的照顾与管理。中文里的经济出自东晋时代的《抱朴子·内篇》“经世济俗”一说，意指治理天下、赈济俗人；今天泛指之经济财政，占有“食货”之说法，源自班固的《汉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日前中国主流对经济看似理所当然的“共识”，某程度上其实不过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社会在跌摸滚爬中强把外来概念硬吞成顺理成章。

这一期的《见·远》栏目我们尝试探讨一下经济此概念。首先我们请到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的曾德平教授为我们分享他对舒马赫的《佛教经济学》的阅读，从佛法八正道切入，将经济活动放回人的尊严与价值去理解。来自香港的社运青年周思中近年用心种田，并因与土地打交道让他重新思考对于小农来说经济、生计的真实意义，再一次映照出主流对经济理解之偏颇与狭隘。参与乡村建设超过10年的严晓辉于刚过去的暑期走访了英国转型城镇，发现转型城镇运动中对食物、能源及货币的再在地化有很深刻的反思与行动，并与中国传统的农村经济有着异曲同工的内在连结。接着我们节录了舒马赫学院的朱莉·理察德森博士的一篇论文，论文谈到仿效大自然运作模式的“韧性经济”与主流经济之不同价值，以及简述了“韧性经济”在转型城镇的运动中如何得以实践，丰富了严文中的分享。

最后我们十分荣幸能转载舒马赫学院创办人萨提斯·库玛的文章，文章指出要将现在主流的“战争经济学”转化为“和平经济学”，十分精彩地演绎出一种令人向往的经济生活模式。

编者按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系副教授，身兼设计、装置艺术、摄影、出版、艺术与设计批评家；曾积极参与菜园村反高铁运动，自此开始接触务农。作为佛教徒，作者在授课时会引用舒马赫的《佛教经济学》一文为教材，下面为他就这篇文章的一些省思与体会。

我不懂经济。我认识的大部分朋友都是不懂经济的，但却身不由己地参与经济活动。不是偶一为之，而是持续地从出生到生命完结一直参与。有趣的是，经济活动的焦点不是参与的人，而是“金钱”。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怎么生活，我们每天起床开始，或者，还未起床已经开始了，生活中的一事一物都或多或少是用金钱换取回来的。我们睡的床、寝具、毛巾、牙刷、衣服、鞋袜、电话……不胜枚举。经济活动俨然是“自然”不过的日常事。我们经常挂在口边的“金钱不是万能，没有钱便万万不能”说明了我们对于金钱的重视程度。我们口袋里的金钱何来？自小，我们不断在家里、学校和社会被教导以参与劳务换取报酬（金钱），使自己可以生活，并且活得愈来愈好。然后，更进一步接受了要把人生超过一半的时间押上去做这件事。最后，形成了社会大众的共识，建立了入职年龄、退休年龄、

工时、工资、有薪假期，以至连病的时候也要请病假等等的制度。从这样的角度看，参与劳务的确是不能不参与的人生大事，理应愈做愈快乐的啊！然而，在参与的过程中，我们感到这样的劳务不能天天做，我们需要定时每周放假，以至每年放“大”假，让身心放空。对于这样重要的事，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的呢？事实是，这种参与劳务换取金钱的做法不是“自然”的事，是我们建立出来的，人为的。当中最大的缺憾是，这种人为制度并不能保证人人可以活得愈来愈快乐。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既然如此，建立制度的我们为何不把缺憾修正呢？是目标出了问题吗？方法错了？抑或，在建立的过程中遗留了什么？

舒马赫(E.F. Schumacher)在其“把人当回事的经济学”的著作《小即是美》¹里，开展了“佛法经济”²的思考。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佛陀的教授“八正道”³中有“正

1. E.F.舒马赫(E.F. Schumacher) (1911-1977)，英籍德国人，世界知名的经济学者和企业家，被后人尊称为“可持续发展的先知”。1973年，舒马赫出版了《小即是美》(又译《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书中质疑西方经济目标是否值得向往，反对核能与化学农药，他也批评以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标准。该书一经推出便以其切中时弊和颇具争议的观点激起读者的热烈反响。

2. 1955年舒马赫访问缅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产生浓厚兴趣，此后担任了缅甸政府经济顾问。在缅甸期间，舒马赫由一个天主教徒转变为一个佛教徒，由一个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转变为一个“佛教经济学家”。他提出关于发展中国家技术路径选择的“中间技术”的思想，提出以“佛教经济学”指导人类经济行为以避免经济发展带来的灾难的主张。

3. 佛教教义，包括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命”的修行方法，故此，理应有“佛法经济”这种可行的发展模式。所谓“修行”就是依据佛陀的教导，修正过往的行事方式，改善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正命”是按照佛法的标准谋生，以不损害别人和环境的方法换取衣食住行的必需品，远离不正当的职业。所以，舒马赫相信，凭着“正命”的原则去修正谋生的方式，便会发展出一套“佛法经济”，以修正“现代经济”造成的种种问题和困局。舒马赫把现代经济和佛法经济作比较，指出两者之间的差异，包括工作的成效、机械生产和人的关系、消费和生活素质、简朴和非暴力的生活关系等等。

从生产的角度看，世人普遍认为人力是财富的基本来源。雇主和雇员对人力的理解却南辕北辙。雇主认为人力（雇员）是构成生产成本的主要因素，如果自动化无法全面取代人力的话，把人力减至最低是天经地义之举；雇员则认为牺牲了闲暇时间和舒适的生活去工作，工资只是补偿。也就是说，对雇主而言，没有雇员的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对雇员而言，无须上班而有收入是最理想的。舒马赫道出了现代经济生产模式既不能满足雇主的要求，也没法满足雇员的期望。为了谋生，雇主和雇员各出奇谋，发展出一套折衷的方法：分工，把生产流程化约成为微细的工序，一方面让生产速度加快，产量增加，另一方面生产工人只需要用最简单的肢体动作便能完成工作，无须任何技术性培训，表面上把“牺牲”减至最低。然而，这种方法只着重产品的质和量，没有把参与其中的人当作一回事，工作的成效也被狭隘地理解为产量的多少。

从佛法的角度看，工作潜藏着对人的正面效果。首先，工作作为人类提供开展其本领的机会；也使人在参与群体工作时，克服自己的自我中心习气；更为生存提供

所需物品和服务。这样继续发掘下去的话，工作的正面效果是无止境地丰富的。同理，假如把工作和闲暇看待成对立的话，只怕是一种天大的误会。工作并不是人性发展的外在机械性活动，佛法经济把工作成效聚焦在人的素质提升上，让工作变成伴随每一个人圆满其生命的助力。佛法把机械化分成两种。一种是强化人的技术和能力；另一种是把人的工作成效转变成机械化的奴役。第一种机械化的作用是协助人类自我净化，这是需要很大的外在和内在力量的。佛法视这样的净化过程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反之，现代经济利用机械化生产使人的欲望持续膨胀，人不断被劳役而不自知。最终，物凌驾于人。工业革命以来的整整一个世纪被喻为人类物质文明的高峰，已发展的国家和地方，普罗大众的物质生活是历史上最丰饶的。我们亲身体验过对物欲的永无止境的追逐了。只要我们愿意付出劳力和时间，必然得到一定程度的物质回报。但是，我们不能不抚心自问，人之为人，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是否有别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呢？

物质生活和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既不互相抵触，也不互相矛盾。舒马赫引述印度“甘地主义”经济学先锋人物古马拿巴（J.C. Kumarappa）的互信和非暴力经济理论，指出正面的工作定位滋养人的正面价值和活化品格的发展。优悦的工作环境让人的自由意志在建设性的轨道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故此，遇上失业时，最深层忧虑并不是没有收入，而是缺少了来自工作的滋养和活化的推动力。物质主义者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和物品对立起来，以为外在的物质条件改善，生命便得到提升。这种思维忽略了人的内在的需要和深藏的潜能。佛法里的“中道”把人从现代主义，包括经济，建构出来的种种二元对立关系中解放，让人安于互信和在非暴力的环境中

发展人类优秀的品格。放眼看看我们现在身处的对立关系，例如雇主和雇员、上司和下属、工作和闲暇、付出和补偿等等。我们一直以为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关系，只管在这中间努力，便可以从外在的“对方”赚取更多“合理的”回报，生活便“自然”愈来愈快乐了。真的是这样的吗？以香港为例，在过去的四五十年，经济持续“向上”发展，现在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物质相对地富庶的环境中。然而，我认识的朋友之中，并没有谁从物质生活中获得持久的快乐。有一些朋友感到物质上的享受仍未足够，有些感到工作没有满足感，有些认为自己的梦想还未达成，有些感到前景没有

佛法里的“中道”把人从现代主义，包括经济，建构出来的种种二元对立关系中解放，让人安于互信和在非暴力的环境中发展人类优秀的品格。

保障，有些感到人生失去了方向，有些感到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等等。相信大家对这些感受不会陌生，不是从周围的人那里听到，便是在自己身上发生。这些经验证明了单靠物质为主的发展，精神生活阙如⁴的话，我们内心不会安稳，生活不会快乐，渐渐地生活品格便失平衡。若然依循佛法经济原则生活的话，简朴的物质基础已然足够，快乐指数却很高。投放在物质上的追求愈低，包括生产和使用，我们便愈多闲暇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例如广义的创作活动，让自己可以滋养和活化自己内在的品格，呈现于外的是一种轻安自在的人生态度。

可惜的是，现代经济主义者，包括我们的大多数人，很难理解佛法经济的好处。一方面，我们认为所有的经济活动均

以消费为终极目的；另一方面，我们以消费量来计算生活水平，认为消费愈多，等于生活水平愈高。故此，现今市面上很多产品在推出市场前已把产品的“寿命”缩减，以至在一定的限期内便会自动报销，以助销情。我们对物质生活的过度依赖，使自己不能无止境地更新各式各样的日常用品。事实摆在眼前，全球化贸易把我们的生产力全数用在催谷⁵消费上，压力愈来愈大——受压者同时是施压者，快乐指数并没有因为消费力提高而有所提升。为

了生活大家斗个你死我活，透不过气来。因为对立关系衍生的竞争、因为权力差异产生的剥削、因为贫富悬殊引发的不公义、因为就业机会萎缩带来的不安、因为对精神自由渴求的落差等等不满情绪，人与人之间潜藏着的暴力被引爆，大型的社会抗争此起彼伏，这种现象在所有高度发展的消费城市都很普遍，并且愈演愈烈，参与的群体愈来愈年轻化，例如最近台湾的反服贸抗议。证明了工业文明既不能产生大众承许的结果，更没法保障稳定的发展。

就佛法经济模式提供的正面经验和长远的安定繁荣而言，佛法经济是值得推荐给相信经济成长远胜精神和宗教价值的信徒。因为我们面对的真正问题不是在“现代持续增长”和“传统停滞不前”之间任择其一。重点是如何确立发展的正确途径——盲从物质主义和停滞不前的传统之间的不偏不倚的中道，也就是“八正道”。⁶

4. 空缺，缺然，欠缺的意思。出处：“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礼仪制度阙如也。”——《后汉书·孝和皇帝纪》

5. 粤语词汇，原意是把谷种先放在营养液中培养，然后再栽植，以促进其生长。有人为促进事物的发展之意。



小农与经济， 或， 小农的经济

文/图_周思中

编者按

作者是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兼职教师，香港菜园村生活馆发起人之一。数年前作者参与的菜园村运动，引发了很多超越了事件本身的思考。从文化保育到对于传统生活方式的反思，参与者们开始更深一层地挖掘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轨迹。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化和当今的演变当中，蕴含了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同时又指引着解决之道。作者正试图通过“生活馆”的探索，来重新探索人和自然，资源与问题的真实关系。

由于备课关系，翻阅了一些关于食物和农业的历史，越翻越纳闷。流行的论述都以欧美经验为基础，述说几百年来先进国家如何将农业——尤其是帝国主义时期——“外判”到南美和非洲，让欧洲本土能将剩余劳动力和廉价粮食集中在新兴城市，为其往后的工业化累积原始资本。若讨论的是中国，故事同样是解放初期农村如何透过“自我剥削”协助城市发展累积国家资本。

纳闷的不关乎这些论点真确与否，而是这些论点的发展主义坐标及史观：无论是批判或保守的出发点，农业都宿命地是现代化工业化以至今天科技化及金融化的踏脚石，仿佛不全力与“发展”这趟高速列车同步的农业，是不值一提以至应该淘汰的。

笔者这说法，或许会引来另一种批判：全球现在十亿人口营养不良，印度每秒钟有多少农民因破产及欠债而灌下农药自杀，笔者还风凉地说农民农业不需要经济发展？笔者并非经济专业出身，对农村经济的认识完全是经验性的，但就是想尝试越俎代庖说经济，以这几年于香港新界八乡有限的务农经验为基础，捕捉某种小农或相关小生产者的“经济”，思考不以金融工业资本主义为目的论的“经济”。

一百年前的判断

幸好还是有例外。已出版了内地中译本的《四千年农夫》¹，四百多页的原文里有十页左右是关于香港的。作者F. H. King说多少次他与团队走在田间，都感到农民是被误解、被扭曲呈现和被不公正地贬抑的。他之所以有感，是因据说人靠衣装，而

农夫的回报及粗重或所谓肮脏的农务性质，仿佛就是其无可抵赖的衣装。然而，他却却是顶着千秋万代的战乱及苛捐杂税，以小面积精耕细作的方式，填饱多少人的肚子。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实践的农业不需依赖外部投入，却持久而甚至保育地力：引用源源不绝的河水山水不在话下，草木灰、人类粪便所制的“大肥”、以至洁净的猪舍也是卫生及收集猪粪一举两得等。

农业在当时是人类和植物货真价实的接口，直接而社会性的接口。一百年前作者认为农民守护着人类文明最佳利益的原因，刚过去的这个世纪却成了小农死罪的证据——所谓效率低，无工业化的规模，或无法接合工业。

生活馆不可能的起点

别说从全球的规模看，即使从本地生产总值看，香港的农业也几乎是“零”。据2013年出版的《香港统计年刊》，香港的蔬菜自给率为1.9%；包括农业、渔业、采石及采矿在内的初级生产再创新低；由2010年的0.1%跌至2011年的无法表达；农业及渔业的就业人数甚至被剔出统计范围之外。根据官方的雷达及标准，香港农业是不存在的。历史来看，战后香港的工业人口及资本，并不是从香港本地农村自我剥削或透过帝国主义奴役其他第三世界的农业生产而来的。香港战后供应城市工业人口的小农生产，也没经历什么国家或企业资本的集体化，而是农地直接成为廿²世纪七十年代的新市镇，以及今天缓冲市区房地产价格暴涨的低密度住宅发展项目。换言之，香港的农业轨迹有点奇怪，未

1. 1909年，美国农业部土壤局局长、威斯康星大学富兰克林·H·金(F. H. King)教授，远涉重洋携妻子游历中国、日本和高丽，考察三个东亚国家古老的农耕体系，回国后写下了《四千年农夫》。英文原著于1911年出版，2011年翻译成中文，由东方出版社在中国出版。这本书完整记录和研究了农业生产者真实的生活环境，讲述了东方各民族好的耕作方法，并反思学习他们保护自然资源的方法、及他们的经验。

2. 二十的意思。

必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模型所适用的案例。

笔者和朋友的农场名字“生活馆”，前身是叫“菜园村生活馆”，于2009年至2010年反高铁保菜园运动中诞生。那时候高铁的拨款刚于香港的立法会通过了，菜园村的拆迁几成定局，一大班支持菜园村民的行动者，一边学习耕种，学习将农业及相关的一系列知识和技艺引入原来几乎百分百的城市生活及消费选项里，另一边则继续守卫乡村，防止村民的房子及家园在另觅新地点前已遭暴力清拆，造成大规模的无家可归情况。对于笔者及其他于反高铁运动中开始学习耕作的参与者而言，学习农业的诱因倒不是食品安全无毒，而是从香港经济既倒于内地游资的乘托之际，一种相对独立自主的生活可能性的起点。但个中的思考仍然是抽象的，我们并不是“返乡”、“寻根”，开始学习耕种相当大程度被当时炽热的社会矛盾所推动。

几年下来，当香港社会矛盾被更抽象（或许同时也更具体）的中港矛盾所置换后，耕作的学习于我们也变为了另一组几乎完全不同的问题。笔者和同伴所学习的农法叫“永续农法”（permaculture）³，形象化一点来说，永续农法的耕种概念就是一棵大树，一棵树的树冠和树根会形成循环，落叶会跌在地上作为根部的覆盖物，令泥土保持湿润，同时令其他昆虫和微生物能生长，这些有机物在得到自己栖息之所后又能将其排泄物和其他腐烂的物质供给树木本身作养分之用。树冠及其覆盖的范围越大，其可容纳的雀鸟、蜜蜂等的小动物也越多，一个生生不息各取所需而无任何单位

能独占资源的循环系统，于焉形成。

不以消费能力为标准的自主

毕竟，香港是个超市和食物泛滥的城市，城市人不事农业生产却根本不缺食物，虽然城市的消费物价指数显示，低下阶层收入差不多30%都付给食物供应者了，但还是有大量各地廉价食物供应者乐意在这几百万低消费人口的市场中分一杯羹。在这城市耕种若只是为了满足有能力消费较高价格蔬菜的消费者，那不如到city'super⁴上班算了。

而生活馆农地的前身是一幅以常规化肥农药耕种的农地，开垦时土质像一片荒漠，了无生气。按永续农法的树木意象，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引入适当的生态机制（而不依赖购买回来的肥料），令农场的泥土建立自己的节奏，保持肥力，甚至长远改善土质让万物生长。在学习耕作的过程，这组问题便不仅成为种植和收成的“背景”或“生产条件”，而是逐渐成为建立和运作农场的最终目标。甚至乎，即使一开始开垦的土地是肥沃的“处女地”，但若长年累月以农药谋杀泥土里的微生物，使用大型农机重复翻土、大量水溶性化肥导致藻类泛滥及表土流失，那泥土的生命力该如何维护及重建？农夫若要依赖化肥农药，岂不是铺一条路将自己导向替大型农企打工？

在香港认真的投入农业，便意味着要抛弃浪漫的幻想，严格定位在如此一个环境从事农业种植的意义，并将这意义翻译为具体的操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虽然生活馆租用的农地面积只有那么丁点的两万平方呎（即两千平方米）⁵，但笔者认为



这仍然是不能超越的、几近绝对的伦理。

豆制品作坊：低调的循环及共享

若不用化肥，甚至不花钱买进口的有机肥料，如何补充泥土的养分呢？生活馆位于元朗八乡，附近还有不少小型豆制品作坊。当香港养猪业仍然兴旺的时候，据说这类小型豆制品作坊制造豆腐后的豆腐渣都会被猪农取去作饲料。今时今日养猪业式微后，这些豆腐渣却是要额外花钱请吊臂货车送到要付费的堆填区。我们一直取豆腐渣的豆腐厂，水源是廿四小时不停的山泉水，煮黄豆的燃料，则雇专人四处到建筑地盘收集弃置的木材。如此的豆制品作坊，与其说是生产豆腐豆浆腐皮之类的豆制品，倒不如说是经营资源回收和循环的业务，让香港的消费者有机会品尝仍然以老天爷赠送的山泉水制作的食品，以及赋予大量被弃置木材最后一次光和热。

能够从这作坊取豆腐渣，其实极度畅快，当我们一铲又一铲将豆腐渣铲进胶桶带走，感觉其实像是有某种并没记录在政府经济统计数据中的交易在秘密发生：作坊主持无需花费将豆腐渣送走，更根本是农场能免费得到让作物翠绿茁壮的养分。不知从哪砍伐得来的树木，短暂逗留建筑地盘后，谁知道竟然能促使黄豆变豆腐，

其剩余则滋养泥土和植物，最后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中介。这种交易，或曰这种经济，不在于纪录在案、数值增长、垄断集中等，而只是简单基本的互助及解决问题。然而，这种工作坊却是政府眼中的“问题”本身——有次与主持人聊起，他说政府欲逐步不再续牌，原因是“环保”云云。到其时，问题就不再是被废弃的木材还有没机会发光发热，而是连豆腐这种廉价简单却不能长期保存的食物，都要再三包装，以有冷冻设备的运输工具穿州过省，才能到达我们的餐桌，这然后就被称之为发展和现代化。

透过野草思考

回到生活馆的农场。肥料我们多用上述的豆腐渣，以及自制的堆肥。堆肥的材料来自将我们重重包围的荒废地里的野草，以及我们田地上收割剩下的有机物。多得⁶香港农地荒废情况严重，堆肥物料基本上取之不尽。而除之不尽的野草于此，又能逃出现代农业凡事控制思维的负面意义。附近的常规农夫每茬作物收成后，一般都广施除草剂，将田里所有植物无区别的毒杀，但尤其是夏天，更常见是头三两天举目苍夷，接着新叶子就像丧尸般从一片化学灾难后的植物茎部重新长出。要么再

3. Permaculture于香港多译作“永续农法”或“永续栽培”，而另一种中文译法为“朴门永续设计”则流通于台湾与大陆。“朴门永续设计”起源于1970年代的澳大利亚生态学家比尔莫利森、大卫霍姆格伦及其伙伴。朴门永续设计是一套整合性的设计系统，透过挖掘大自然的运作模式去设计人与自然合理、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

4. city'super为一香港连锁超市，专门针对中高档消费市场。

5. 约三亩地。

6. 粤语，多亏、有赖的意思。

喷洒一次，要么则承认除草剂的徒劳。经已恶名昭著的孟山都 (Monsanto) 7bt 棉花，不就是将抗除草剂的基因植到棉花上，以求其配套的除草剂不会伤及植株吗？主流农业经济的发展就是将野草看成问题，然后将各种化学品以至毒药的研发、生产、流通及应用变为产业。

基因改造的问题和农业化学的害处，这里就不多谈了。但归根究底，地球上、历史上也只有叶绿素（野草的和作物的）能收集太阳的能量并转化为糖分，这是地球所有生命及人类任何文明发展的前提。大多数人不吃野草，但也无需因为野草不能吃就将之视为仇人及敌人。野草晒干后能覆盖泥土表面，部分复制上述 permaculture 大树意象，让泥土保持湿润，让昆虫及微生物生长及活动，营造一个互相制衡而又互相支持的小生态。刚清除的野草则可以制作堆肥，同样是部分复制大树意象，让各种有机物加速分解，最终重新成为滋养作物的因素。换言之，生活馆尝试不将野草看成仇人，反之，我们牧草。不仅直接吃掉光合作用而成的果菜，还将光合作用作为帮助整个农场生产及运作的基本引擎。在这过程中，农场吃掉场内场外伸手可及的（免费）资源，果菜是人的食物，其他有机物就能吃其他东西，结果农场的生物量及生态质素欣欣向荣，与货币金钱消费却几乎毫无关系。

小结：只是你视若无睹

主流农业发展却是尝试将所有环节商业化、消费品化、控制、集中、垄断和牟利。如果这才是“经济”的话，结果其实难免荒诞：太阳既然无私地赠送食物给人

类，我们却将生态看为私有财产，将自己看为产权的排他拥有了。农业当然远远早于欧洲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等“主义”之前已存在，人类亦因小农才能发展至今时今日，今天的统计眼光、经济政策等却要求他们遵守一套后来的、将他们排斥的游戏规则，并在过程中将小农意识形态地污名化。

小农经济虽然在统计上节节败退，但不是因为他们的作业不可持续，恰恰相反，他们有许多方法、机制、关系都是世代相传树人育土，却没在资本及国际竞争中有甚么野心和战绩而已。以发展及增长为律令的社会，制度性地需要穷人（因为他们能提供廉价劳动力、因为他们需要福利从而能被制度监控、因为他们是扭曲和剧毒的食物生产系统的消费者、因为跨国农企从他们对种子农药化肥的依赖而盆满钵满，余不一一），却不容许希望摆脱或受制于资本及公权力控制的自由人。笔者才明白，为甚么有人会说，种植食物（小农形式的作业）可能是地球上最具威胁性的一种占领形式。

笔者愿意相信，生活馆的规模、产量和社群当然有改进空间，但我们更乐观其成的，是小农那种没有纪录在案的、秘而不宣的互助、不以地域竞争资本累积为目的之食物及社群生产，能遍地开花落地生根。☺



托特尼斯镇上的社区菜园

城市的未来 ——英国转型城镇的思考与启发

文/图 严晓辉

编者按

回应城市发展困境和城乡对立的冲突，英国的一些学者与社区协作者提出了“转型城镇”的构想。作者自2004年起参与当代乡村建设运动，并先后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¹、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²、小毛驴市民农园³等工作，现任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研究助理。当我们透过他的英国走访之行，以及关于“转型城镇”的核心议题，发现其实中国传统小农社会下的经济竟然与外国的尝试有不少相通的地方。然而，历史不会倒退。我们如何在不可逆转的城镇化发展大潮中把握好方向，需要更多的智慧与反思。

1. 2003年7月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等多家组织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联合发起成立。通过研究实践国内外及历史上各种乡村建设思想，培养乡村建设综合人才，推广乡村建设和农村综合发展实践经验。

2.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经过4年多运作后，在2008年转型为非赢利性的社会企业，组建成立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简称国仁），并从农村迁到北京，倡导“发展生态农业、支持健康消费、促进城乡互助”的行动理念，推动食品安全、生态文明与城乡良性互动。

3. 2009年国仁借鉴国际上的社区支持农业（CSA）经验，介入北京海淀区政府与中国人民大学产学研基地建设之中，于苏家坨镇后沙涧村启动了小毛驴市民农园项目，倡导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并希望重建乡村和城市社区和谐发展、相互信任的关系。

7. 孟山都的前身是化学工业公司，其生产的旗舰产品Roundup是全球知名的草甘膦除草剂。该公司目前也是转基因（GE）种子的领先生产商。

在城市和乡村长期二元对立的局面下，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似乎面临两种极端的方向：当很多农村地区被贴上贫困、落后、闭塞、欠发达等标签，城市在繁华的背后却已经面对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和食品安全等各种危机。同时间，无论是否发达，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的现实让所有人都无法逃避。我们如何选择我们的生活？虽然一些人开始了逆城市化的选择，掀起一系列返乡潮，但城市的未来是什么，现代发展模式调整的方向在哪里？或许，转型城镇（Transition Town）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让城市在发展的困境下走得更远；它也提醒我们，乡村和城市无法割裂，我们既要调整城市的模式，也要珍惜和借鉴乡土社会的宝贵经验，防止世界持续陷入城市化发展的误区。

转型城镇是由英国学者及社会活动家罗布·霍普斯金（Rob Hopkins）博士在2005年提出的城市改造构想，最开始主要应对气候暖化和石油峰值，后发展成为应对现代发展问题的一系列行动。霍普斯金博士曾是一位生态农业农艺师，研究可持续农业。9年前他在家乡托特尼斯镇（Totnes）发起了讨论，从组织人们聊天、看电影开始，讨论小镇的能源、食物、经济、组织等议题，重点是后石油时代的社区发展策略，他们逐渐提出“在地食物”、“社区生态承载力”和“韧性经济”等理念，这些概念开始摆脱全球范围内已经广泛形成的主流经济模式。随着转型试验在托特尼斯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居民加入了这个计划。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转型城镇由地区试验转变为广泛的全球参与网络，即进入2.0时代，他们开始培训不同地区的人们开展当地的转型试验，并为他们提供帮助，到2013年，已经有涵盖40多个国家超过1800个转型社区计划，转型城镇正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一场社会改造运

动。2014年7月，在社区伙伴的资助下，我同西南大学研究组一起到英国的托特尼斯和布里斯托尔（Bristol）等地参观学习，并有幸在舒马赫学院（Schumacher College）亲自拜访了霍普斯金博士。

上个世纪90年代成立的舒马赫学院，就坐落在托特尼斯镇，学院由印度学者萨提斯·库玛（Satish Kumar）创立，旨在推动可持续生活与生计的理念。学院开设研究生课程如《转型经济》、《整体科学》、《可持续园艺与食物生产》等，还举办公开培训课程如《培育生态世界观》、《户外环境教育入门》等，与转型城镇的目标非常一致，为转型网络发展提供学术资源以及技术支持。2012年，舒马赫学院与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建立合作关系，此次我们到英国学习转型城镇的行程都是由舒马赫学院安排。

转型城镇作为推动社区转型的一系列计划，最核心的议题是食物、能源和经济，并通过各种在地的解决方案，试图构建本地社区的可持续生活模式。经过多年的实践，已经发展出一套包含起步、深化、连接、构建、梦想等具有操作价值的步骤。本文通过对转型城镇最核心的三个议题（本地食物、能源在地化及社区经济）的讨论和介绍，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思考转型的真正内涵。

本地食物运动

数十年前，中国的农业议题是如何养活更多的人，我们的父辈大都有过饥饿的



坐落于托特尼斯镇的舒马赫学院



布里斯托尔街头关于支持本地经济的彩绘

经历；到我们这代人的时候，关于食物议题已近转变为如何吃好的营养学概念；然而近年来我们所面对的食物议题更多转变为食品安全问题。绿色革命让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的转变，也使得人们的食物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但食品工业的发展和食物的全球化似乎并不能解决食物问题。在英国，虽然人地配置要高于中国，但却有超过一半的食物需要依赖国外。本地食物运动恰恰是应对食品工业化和全球化而来，正是食物问题的重新凸显。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种危机，使得人们重新关注乡村、土地与食物。

在与托特尼斯当地CSA⁴机构交流的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我们希望本地生产的谷物是给当地人吃的！”要理解这句话，首先要了解当地的农业生产模式和食物结构。英国是土地私有的国

家，托特尼斯的大多数土地归地主所有，无论是地主自己经营还是出租经营，都是处在一个食品产业链条里。不同于中国的小农经济，农场主在农场种植单一的农作物或饲养牛羊，产出后统一销售给食品公司。这些公司对初级产品进行加工和包装，通过食品供应链供应到不同的市场，当地人再以商品的形式从市场购买，买来的也未必是本地产的。打个比方，你家门口是一片小麦田或一个牧场，你却很难直接吃到这里的小麦和牛奶，而需要去超市购买加工好的面包或奶酪，并且你买到的食品也未必是本地产，因为它可能来自旁边的地区甚至是更远的国家；同时这块田里的谷物可能卖给饲料厂，牛奶则加工成奶制品销往其他地方。我们曾经以为，商品化让人们的选择更自由，让资源的配置更合理，也让食物多样化。然而对当地人来说，一

4. CSA是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英文简称，常译为社区支持农业，指社区的消费者对农场运作作出承诺，让农场可以在法律上和精神上成为该社区的农场，让农民与消费者互相支持以及承担粮食生产的风险和分享利益。这是一种城乡社区相互支持、发展本地生产、本地消费模式的小区域公平经济合作方式。CSA的概念是不要中间商来操纵当地的食物经济，它可以恢复农民和消费者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农民在具有生态安全的农业系统中生产能带来健康的食物。



河滩有机农场的有机食品超市

方面多数人面临食物价格升高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同时，农场主则面对全球食物价格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单一化和掠夺式的生产，让人们和土地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没有在地的劳动，没有协作，人和人的关系也被打散了，只剩下金钱与商品的交易，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处在失业状态，在常规食物体系下，你也难以通过自己劳动来获取食物，除非你想办法弄到钱。因此，本地食物运动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涵，它需要将土地、食物、人和社区重新连接起来，重构一种生活化的关系，例如将公共的花园和草坪利用起来，由社员参与公共劳动并获得食物。此外，减少石油依赖也是本地食物运动的重要方向，采用有机的多样化的种植方式，不仅可以降低排放，也使得人们的食物更健康。

河滩有机农场(Riverford Organic Farms)是英国著名的有机食品宅配公司，在托特尼斯镇上占地3000多亩。农场主盖·沃特森(Guy Watson)的祖上曾是大地主，一度荒废的土地从1980年代开始被重新利用，并转型为有机农业。农场内有种植园、养牛场、餐厅，有配送系统，还有一

个大的生鲜超市，专门提供本地生产的新鲜食材。相比自己生产的部分，收集附近小农场的食材占据配送网络的主要部分。目前该农场有400多名员工，年营业额约3千万英镑，食物涵盖了蔬菜、主粮、肉类、加工食品等几乎所有食品类别。相比常规超市，这里的食物价格不算高，却是本地生产的新鲜食物，因此河滩有机农场很受当地人欢迎。

相比大农场，多功能的小农场则更多，学校菜园(School Farm)就是其中之一。哈儿·吉尔莫(Hal Gilmore)和伙伴经营着这个CSA农场，他们和舒马赫学院联合，开展农业教育的活动，并将食材供应给学院及周边的朋友。菜园非常整洁，看起来很有条理，种植的品种也很丰富，两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自信和幸福。吉尔莫也参与到转型城镇的其他工作，如社区货币的管理，社区组织及一些研究工作。

“咖啡蘑菇”也是一个小的创意食物项目。在一个社区菜园旁边，一对年轻人使用一个集装箱来种植蘑菇，蘑菇生长的基料就是咖啡渣。其实他们提供给居民的是一颗“蘑菇树”，一个可以持续产出蘑菇的

小方盒子。当盒子在集装箱培养到一定阶段，就可以搬到自己家里慢慢采蘑菇了。创意者想告诉人们，自己生产食物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只要你愿意花时间，你就可以利用各种资源生产出安全可口的食物。

镇上还有一些公共的菜园，由志愿者打理，供任何居民采摘和使用。其实，舒马赫学院里面也有一个小菜园，这个菜园更多是为学员提供实践的场所。菜园连接了厨房、堆肥池和生态厕所，形成了一个小的食物系统，为农业实践者提供参考。他们也经常组织学员规划新的生态农场，以带领大家更好地参与到可持续的本地食物思考中去。

新能源与在地开发

能源问题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来，工业化的主要目标是消费需求，因此能源危机实际上是过度消费与能源限定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发达地区往往将污染的代价转移出去，或者隐蔽起来，另

一方面则寄望于科技发展，试图开发新能源，后者往往带来新的危机。在欧洲多数早发工业化地区，由于污染和能源问题出现得比较早，因此也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出绿色能源、清洁能源等的概念，太阳能即是其中一种。太阳能的使用是能源在地利用的很好的选择，它可以就近、方便地转化太阳能的能量并替代部分常规能源。

由于过去太阳能产品的制造成本较高，与传统能源相比，从经济角度来看优势不大。一些欧洲城市为了鼓励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的利用，尤其是欧盟国家曾承诺2020年之前要将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提高到20%，因此政府将从石油公司征收来的碳排放税，补贴给居民鼓励安装太阳能。但是由于申请、安装、维护等还是相当麻烦，推广的速度并不快。最近几年来，中国和南亚一些国家制造业迅速发展，光伏产品的成本随之下降，进一步降低了太阳能的使用门槛，便有太阳能推广公司、新能源合作社等机构发展出来。他们作为中介，说服居民使用太阳能，并代为安装、维护，还统一帮用户申请能源补贴，形成一种相对成熟的推广模式，这种做法使得转型城镇、绿色城市等实践在能源领域有了新突破。

戴维·桑德斯(David Saunders)相信技术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他大半生都从事IT行业，他对太阳能的发展潜力充满信心，他在布里斯托尔成立了一个能源合作社(Bristol Power Co-op)，专门推广太阳能

艾米利亚·梅尔维尔(Emilia Melville)是另一个能源合作社(Bristol Energy Co-operative)的负责人，她通过组织读书会 and 社员建立连接，并在一栋新建的媒体中心屋顶安装了太阳能供电系统，可以为办公楼提供超过40%的电力。

但这种能源方案的不足之处是，一方面必须依赖石油公司的污染税，另一方面其实是将制造光伏产品的污染代价转移



极具创意的蘑菇生长盒



1镑面值的布镑



5镑面值的布镑

到了亚洲。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田松曾专门撰文分析过太阳能的利弊,他谈到太阳能其实是更加耗能的方式。因此,能源的议题的思考,节流比开源更重要,真正的转型城镇,是要改变其高耗能的生活方式,尝试一种绿色的文明,甚至需要重新评估当地的生态承载力,将生活方式与生态条件结合起来,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实现人与自然的融合。

新经济,新社区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自从使用了货币,很快就发明了“钱生钱”规则。这个规则越演愈烈,直到发展出了现代金融。而谁掌握金融资本,谁就获得其增值收益,掌握的越多,获得的就更多。伴随着资源资本化,全世界各地不同的资源也就随着货币的流动而流动,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从穷国聚集到富国,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力资源以及其创造的价值,越是全球化,越是自由流动,就越可能极端化,财富就越集中。同时,掌握货币发行权部分的国家,通过货币控制而主导金融市场,获取了全球金融市场更大收益。

在这样的规则下,一个社区如果处在一个广泛的和自由的货币系统,其自身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和积累都会受到限制,人们无形之中被货币绑架和剥削。从社区发展的角度,过度依赖能源公司提供的能源,例如购买石油和电力,便使得本地资源以货币的形式迅速流出;食物也是,托特尼斯

镇上居民之前超过九成的食物依赖超市系统,而这部分消费大都从社区流出;还有银行系统,一方面地方储蓄往往被大型公司利用,而居民信贷则需要支付更大的代价。因此,如何让资金和财富留在本地,形成一个在地的金融规则并为本地服务,是很多人思考新经济的主要出路之一。通过发行社区货币,实施地方贸易保护、鼓励在地消费、发展在地储蓄等手段,可以使一个社区的各种资源要素尽可能地保留下来,也为地方公共服务和财务积累提供了可能。

在托特尼斯的街道,可以看到一些商铺的玻璃墙外,除了张贴各种信用卡、银行卡等支付标签,还贴有明显社区货币的标签,这意味着当地人可以使用“托币”在店内消费。由于托币只在当地社区流通,从而防止货币外流,使得货币只为本地的生产、建设和消费服务。托币是由当地民间机构联合发起,目前发行规模较小,但正在逐步扩大。有意义的是通过本地货币交易形成的关系网络,可以为社区的转型提供良好的组织基础。

布里斯托尔在十九世纪以前是一个发达的港口城市,曾作为贩卖黑奴的据点和美洲玉米交易市场而闻名。失去世界港口地位后,自由经济让这个城市深受其害,市民运动活跃,曾经发生过多起反对全球连锁超市乐购(TESCO)的大型反抗运动。据说曾有超过九成的市民支持在地消费,反对乐购,可见当地民众对于在地经济的呼声很高。



店铺门口支持托币消费的标示

托特尼斯社区货币

在布里斯托尔市民运动的推动下,市议会批准发行布镑,并且成立专门的银行,负责本地货币的发行和管理。据说连市长的工资都是用布镑发放,很多商家还推出采用本币交易的电子交易系统。不过,在没有形成完整的在地金融系统之前,布镑和英镑之间是固定汇率和自由兑换的,发行规模也只有数十万英镑,暂时还不是一个封闭的社区货币系统,但是发行社区货币至少增加了人们的本地认同感,游客也可以使用英镑按照一定的兑换自由购买布镑,如果你不想在当地消费完,就可以当成旅游纪念币带回去收藏。这样其实也为当地旅游增加收入,有些地方政府也开始把转型城镇计划当作增加就业的手段之一。

生活感与社区凝聚力

转型城镇运动是一场温和的社会动员,这种动员把各种社会危机内部化和在地化,通过自我反思,自我调整和自我组织,形成一种新的社区文化,共同面对未来的生活,无形之中形成一种现实的反抗模式。

在转型城镇网络的实施步骤里,首先强调沟通、协商与合作,例如要首先建立自己与邻居的关系,再把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大家通过讨论、反省、分享,共同面对社区的危机。这个过程中主要批判的是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提倡社区共同体,注重生活的真

实价值和作为集体的生存文化。在转型城镇的理念里,劳动价值被强调,大家要一起劳动,生产生活物资,例如通过种菜、烹饪、做手工等换取劳动成果等。这样,人们的生活感就会增强,节约意识、公共观念、对自然和他人的敬畏心也会逐渐培养起来。之前通过金钱实现的价值,现在需要通过自己劳动;金钱曾经似乎让人们的生活变得独立,而劳动则需要协作,也需要照顾不同的人。

在私有化的世界里,公共部分越来越少。因为资源的转移是如此简单和迅速,你不会因为在意数千公里外的粮食短缺而停止浪费食物,你也不会因看到世界对面的土地污染而减少能源消耗,你更不会在意消费品背后的血汗工厂,甚至对谈论着公平却在无形中制造不公平而全然不知。但如果逐渐放弃对外界食物、石油和货币系统的依赖,社区自有资源就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地方生态的承载能力将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存,你的浪费、消耗、挥霍都影响眼前,它当然是共同的、感同身受的。基于这种生活价值的选择,一个社区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会改变,并且越来越回归现实,进而形成新的社区关系,这就是凝聚力。

一点启示

中国正处在高速发展之中,国际化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准,在忽略人地



作者(右一)及同行者与Julie Richardson(右四)在舒马赫学院合影。

资源差异的发展框架下,中国梦向西方看齐,中国的城市化率和现代化程度也不断加快。英国转型城镇运动可以从侧面反映西方社会城市化的危机,尤其在食物、能源和经济领域。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社会其实是很好的典范,完整的在地食物系统、和农业结合的、回应日常生活所需的能源组合,以及不太商品化的经济。城市危机重重,但城市化却在加快,农村的各种资源要素迅速流出、土地和环境被污染,农民也被裹挟进现代化的潮流之中。我们应该重视中国传统乡土社会节俭、朴

素、自足的生存价值和以村舍为本的社区精神,谨慎推进城市化,同时反思城市未来的出路。

社会改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近年来兴起的CSA运动和蓬勃发展的爱故乡活动⁵让人欣慰,爱故乡把城市和乡村连接起来,它提醒所有人放慢脚步,回头看看故乡,重新思考生活的方向,它也吸引了一大批返乡青年,回到郊区或乡下的田野里,做回普通人。我想这是中国的转型,也许不需要高深的理论,自信一点,慢一点就好。

2012年12月8日至11日,可持续实践与乡村建设国际研讨会在重庆西南大学召开。论坛试图探讨一种以民生为本而非以利润为本,同时具有“经济-生态”面向的粮食安全体系。会议邀请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思想家与行动者,对人类安全及可持续实践、统筹城乡和谐发展、乡村本土社区建设、生态环境可持续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同时通过交流合作发现并发展各南方国家在可持续实践方面的已有本土经验。我们在此节录了由舒马赫学院经济学课程主管、转型网络资产托管人朱莉·理查德森(Julie Richardson)博士在会议上分享的一篇关于转型网络与“韧性经济”的文章,进一步阐述转型网络的特点。

5.“爱故乡”计划缘起于201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和福建省正荣集团共同发起,倡导保存、弘扬乡村传统文化,保护、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关爱留在和离开故土的父老乡亲,培养乡村和社区建设的多种人才。

韧性力量的实践: 转型网络⁶ (节录)

朱莉·理查德森(Julie Richardson)著

巫爱金_翻译

转型城镇网络的产生,是对气候变化和石油峰值⁷的双重挑战的回应(参见www.transitiontowns.org)。这个运动的目的,是支持以社区为主导的方式来回应石油峰值和气候变化,并建立社区韧性及幸福感。当前全球涌现的转型社区网络所提倡的价值与其组织形态,正正反映出生态韧性的概念落实在本地经济时的模样。

透过个人转化与社区赋权,韧性而非持续的经济增长将成为确保生活质量的新机制。转型网络将“韧性”定义为:“一个具有抗干扰、并根据当下转变及时重组的系统,并因此而能维系该系统的核心功能、架构、身份与反馈的能力。”⁸转型城镇网络是地区性社区自发组织应对气候变化和石油峰值带来的双重冲击的一个出色典范。转型网络不会就经济和社区生活提供一个标准化、同质化的方案来摆脱石油依赖。相反,它提供了5个阶段或者转型的“因素”,以确保根植于当地背景的多元回应有可能发生。

第一阶段,“起步”,这一阶段是让人们聚集在他们的社区中去提高认识,创建社区可持续未来的愿景,形成工作小组并开启整个过程。第二阶段,“深化”,这一阶段是建立动力,并从其他区域的倡举中获得灵感来发展切实可行的计划。第三阶段是“连接”,包括争取更广泛的受众,例如当地政府、商业机构、学校和大学。第四个阶段是“建设”,包含一个更具战略性的方法为转型社区建立社会企业、能源公司、本土另类货币、生态村、社区支持农业计划和社区土地信托基金。“梦想”是最后一个阶段,完成以上循环并形成更大的愿景——如果转型的倡举可以连接在一起形成食品网络、学习网络和能源网络,并共同创造社会企业的一种新文化,那更大的地区甚至是国家将会变怎样?

许多论者认为转型网络的成功和显著成长与该网络的组织形态——即模拟生物中细胞生长中的多层次、单位间相互连接的结构——息息相关。

6. 原文的英文标题为“Putting Resilience into Practice: The Transition Network”

7“石油峰值”源于上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哈伯特(Hubbert)发现的矿物资源“钟形曲线”规律。哈伯特认为,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任何地区的石油产量都会达到最高点;达到峰值后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这是石油峰值理论的核心。1953年,哈伯特根据峰值理论预测美国本土48州的石油产量在1970年前后达到峰值。后来,美国本土石油产量果然在1970年左右到达峰值。从此以后,石油峰值问题逐渐受到关注。

8.Walker, B. Hollinger, C.S, Carpenter, S.R. & Kinzig, A. (2004)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Ecology and Society 9 (2)

生态韧性、经济韧性和转型网络

我们可以从韧性生态系统的原理中得到什么启示、并应用以形成新的韧性经济呢？我们以图表的方式来看看。

韧性生态系统	当前经济体系	韧性经济体系	转型网络
透过积极/消极的反馈进行自我调适的系统	线性系统（获取资源—制造—丢弃）的模式；产生的对外部的负面影响无法于系统内自动地自我处理	参考生态系统，将反馈、资源使用效率融入生产方法的设计的循环经济系统	发展基于闭合循环及生态友善的生产模式（例如，有机及森林食物系统）的本土经济
系统设计符合当地的生态条件	全球经济准则标准化；追求大规模和同质化的经济模式	强调合理的经济规模；建基于本地的环境与优势，重新发展本地化的经济，并强调多样化	通过社区参与来增加本地经济，将重点放在回应基本的生活需求；强调发展出来的方案需要符合当地情况
多元，以及只发展至一个合理的规模	金钱变成价值本身，变成需要储存的“财富”	金钱应扮演促进经济系统内部流动的催化剂	发行本地货币促进当地贸易；根据滞期原则，货币被储存一段时间后作废
酵母、催化剂的作用在于促进转化竞争和合作皆为促进生物演化的力量	市场体系建基于竞争	鼓励以合作来创造价值	强调互助的流程；鼓励企业间的合作
充满创意与新奇的东西，在过程中生发改变	崇尚规划、监管和风险管理、强调技术创新	实验性的、包含多种解决方案的、提倡社会和技术的创新	透过横跨多个社区的实验方法来寻找适合当地的生产及交换方式
发展受着生态条件的限制，注重效率，也强调足够就好	对运用科技克服生态限制乐观	生态和社会的条件乃经济活动的边界，所有经济活动必须在这两个领域内运转	探索低碳解决方案，减低对石油的依赖；除增长之外深化社区居民对幸福的更深层的理解

和平经济学

文_萨提斯·库玛(Satish Kumar) 译_张彩云

编者按

本文是舒马赫学院创始人萨提斯·库玛为2014年11月刊的《复兴与生态学人》¹杂志撰写的刊首语的初稿。感谢萨提斯·库玛同意本刊翻译、编辑并转载。

当代的经济学往往聚焦金钱和利润，并因此带来竞争、冲突和战争。在多数大学经济系的课堂上，其他价值如和平、可持续发展或道德等，被认为跟经济学无关。除了关注食物、居所和其他物质需要外，经济学也必须关心公义和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以及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可是，经济发展为后者带来的，往往是弊多于利。美国马里兰大学荣休教授赫尔曼·戴利在这期通讯指出，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可持续发展，“稳态经济”²对生命所采取的态度和实践方式，要比经济增长好得多。如果我们能同时重视生态和经济，

社会将会更安稳。

我认为我们现时拥有的是一套战争经济学。战争涉及使用资源的权力和对资源的控制。政治权力是其中一部分，但推动战争政治的，是贪求更多更大的利润，而这些利润来自拥有像石油、铀、雨林和土地等天然资源。

如果经济和企业的最终目标是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我们就无可避免地要取得和拥有天然资源。在这样的脉络下，国家利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前提就是：无论天然资源在哪里，都必须取得它们。较强大的国家为此在全球

1.《复兴与生态学人》(Resurgence & Ecologist)是英国著名的双月刊杂志，萨提斯·库玛长期担任该杂志的主编，该杂志被誉为绿色运动的艺术及灵性之声。网址：<http://www.resurgence.org/>

2.“稳态经济”是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教授早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新经济学理论。他质疑“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并认为各国（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应放弃追求增长，寻求建立稳态经济，即“整体上相对稳定而人口量与人均消费量的乘积轻微浮动的经济状态。”详见：<http://steadystate.org/act/sign-the-position/read-the-position-statement/>

各地设立军事基地。只要各国社会一天受着日益盛行的消费主义所左右，结束战争和在国与国间建立和平的梦想都难以实现。

和平不单是没有战争。和平是一种生活方式，是自愿节俭，并且简朴但优雅地过活的一种生活态度。和平的社会会为个人、社会和环境寻求福利，而不会不断追求物质上的富裕。不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国家追求的是“国民快乐净值”而非“国民生产净值”。

对生产和贩卖武器的商人来说，战争就是赚钱的最好时机；因为受雇于这些商人，不少平民百姓也变相依靠研究、发展和买卖武器维生。大笔资金给投进发展令军事行动更有成效和更有效率的创新科技中。国际冲突的两个主要成因就是对资源的控制和武器贸易。

为了满足人类的贪婪，很多国家不但跟其他国家作战，还向大自然宣战。在巨型的工厂式农场，动物遭到可怕和残酷的对待。在这些农场，无数的猪和牛的生存都只是为了给人类带来利润。滥捕海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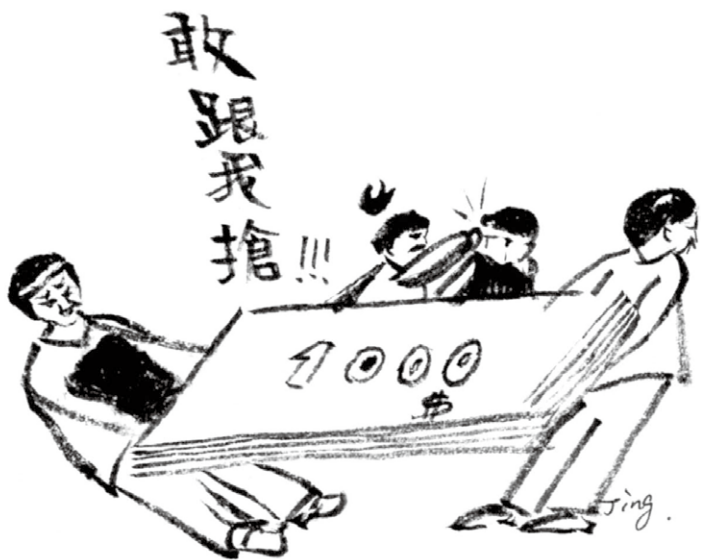
的鱼，毁灭雨林和毒害土地等行为，何尝不是对大自然的战争？如果人类要寻找真正带来和平的路，就必须改变我们做生意的方式。赚取适度的利润的机会总是存在的，但一门生意的目的和参与其中的人的动机必须源自一个关怀他人福祉、愿意分享和重视可持续发展的胸襟。

这样的动机不能由政府颁下，而必须来自每一个人的内心，而且必须是社会和政治文化不可分的一部分。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贪婪、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种子。要跟世界和平相处，我们首先要有一颗平和的心。一颗贪婪的心不可能是平和的。一颗平和的心是满足的和踏实的。我们时代的最大挑战是建立新的经济学，新的做生意的手法以及新的政治，而它们全部植根在道德和灵性的土壤里。利润和权力必须服从伦理和道德原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我们心里的冲突、国家之间的冲突和人类跟大自然的冲突减至最少。

金钱不应是量度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准。人类和动植物的福利必须成为我们判断经济是否良好的标准。❶



行动者



编者按

朱明，社区伙伴的前员工，也是《比邻泥土香》编创团队的前成员，这两年他“脱离组织”，远离城市，生活劳作在云南的乡村田野；这并非通常意义的“返乡”，而更像是异乡人在“找寻”能承载精神发展的真实生活的原乡，同时也在找寻自己。这“找寻之路”必定是一条不同寻常的路。他为何出发？在“路”上遇到了什么？对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有了怎样的新领悟？让我们从他的文字中来了解发现。

被人问起“这两年干什么去了”，我有些难回答。在生命里，困惑、问题多过方向和答案，跟自己都说不清楚，那就索性狠下心来，一天天过日子，就活在那个当下。看不见未来，就不去想未来。若人用心，生活中所经历的，留下的就是答案。当人循着内心，把自己敞开给命运，生活是一种长出来的状态。

回顾来云南这两年多的生活经历

来云南后，先在人子¹的共生社区，住了近十个月，这期间参加了社区的“生活大学”学习；后来在一个纳西族的农民家庭里租了房间，住到现在。人的经历，要串起来，才能隐约看得见那个相续的主线。回想，我是2005年末，去社区伙伴工作的，在社区支持农业（CSA）项目组里工作了七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在地合作伙伴的行动，但重点是对“社区支持农业”做法背后的对社会发展方式的省思，以及创造新的社会文化。另一方面，是协作在这个领域工作的青年人学习，协作他们内在的精神成长。

在这样的工作角色中，一边，你手里拉着“理想”的风筝，人是上扬的；但参与合作伙伴的在地行动过程，又拽着你脚踏实地，在现实中寻找出路。这其中的关键，是在于你对“中道”的把握。但人又不应执于在“中道”里感受到的平衡、安全和喜悦——而应对生活中出现的真实机缘和波动敏感着、开放着，在对中道的守持中，让健康、美好的东西，进入人们的生活里，感动人的心灵，让爱去把人與人、人与自然连接起来。

现在回头看这份工作，对人的要求其

实挺高的。做得不好，人就轻浮和撕裂了。这点是后来才认识到的。当项目发展到一定规模和积累到一定的丰富程度时，我对项目的方向就有些模糊了，同时也强烈感觉到“自己的缺乏”，例如没有与自然相处的直接经验，对农村和农民的想法缺乏了解等等。对本土化的“社区支持农业”在下一个阶段重点应放在哪里，也没有清晰的想象。

还原到自己价值观的层面，是在当时的情境下，对如何把“帮助人类的精神发展”和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看不清楚。或者说，那时我对自己的内在精神发展，也没有真正的认识。有很多时候，是在顺着机构积累下来的文化、理念，以及自己过去的经验在走，说到真诚和用心，只是在一个很浅的层面上。

辞职后来了云南，在人子共生社区的生活，一方面有生活细节，一方面有社区的带领人、同工²不断提供理念引导。看似两边都有，平衡态。他们对来体验的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挂上，先跟着走就好”。这是个有二十多年经历的平台，有传承，理念清晰，生活里也有非常丰富多样的尝试。但我在当时经历时，觉得人陷在很多不同形式的活动中，有很多形式是自己的短板，比如戏剧、晚会等，自己拘束而又觉得必须要参与，压力颇大。

另外，人子共生社区的日常生活里的内容安排得丰富紧密，缺少了个人摸索、感受、总结的空间。当然，这是在“生活环境中找原因”，若是积极、真实地向内看，更本质的应是“自身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已经意识到，想要在一定时间、空间里，有针

1. “人子”的含义来自于圣经，意为“人的孩子”，“人原来的样子”，“传承之子”。人子协会起源于台湾，他们自定义为：“不受薪的全时间员工，全天候陪人从新生活，透过共同实践均平组成人子一家村，并结合各地有缘人所建立的共生关联。”

2. 同工是宗教团体与信徒（尤其是基督教、基督徒），以及教育、辅导工作者（如教师、社工）彼此相称一同为一个群体服务的伙伴。

对性地去打磨”。比如踏踏实实的农村生活经历、对农村社会情况、农民生活的了解、人在自然中生存体验等等，这些都是在社区伙伴工作中，已经意识到的，来云南想要发展的方面。

回忆在人子共生社区的这段生活，心里是挺感恩的。说到“信仰、精神发展”，在思考层面上是有些认识的，但没有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而在共生社区，日常生活和信仰密集地交织在一起的状态，让一些东西在身体里扎根。有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去年，我已经在纳西族家庭生活后，曾经深夜在山里迷路，人有些崩溃，我下意识的反应是“与老天说话”——真的张开嘴，大声地说了一两个小时，过后人奇迹般地平静下来，这时候，才想到自救，找出路。这件事过后，在和人子共生社区的朋友交流这个部分的时候，他们总结得好：“能镇静下来，是老天在保守你”。想到这段经历，觉得在共生社区生活大学的学习，好像是个预演过程，让我有机会练习如何把理念融入日常生活里。而在纳西农民家里住下来，一个人独自面对生活时，那才是实战。

说到在不同的生活中转换，想起黑塞的《悉达多》³里有个细节，“悉达多追求精神的发展，在他的导师指导下修习，后来他发展到一个阶段，自己的精神可以进入不同的动物，在经验它们生活的同时，又能保持有意识的状态……”我只是在不同的人生状态下的角色转换，但也是能感觉到“每种生活，都有这种生活背后独特的意识”。

来云南之前，在帮忙社区伙伴预备第五期《比邻泥土香》，想牵头做一期“自然与人”的专题，但在操作过程里发现，以当时的情况，很难做出心里想要的感觉，后来这个题目就搁浅了。但自己是心有不甘的，来云南，是想着去一个贴近土地、自然的

地方生活，扎扎实实地有些积累。做“自然与人”专题这件事情，是一直放在心里的。

虽然转换了生活的状态和环境，意识会被周围的环境粘住，就好像现在，回忆过去在城市里的生活时的想法和愿望，会觉得挺遥远的。不过，我也不断提醒自己去觉察，在农村生活中，生活和环境所带来的意识和追求。我想，“觉察”是人类在精神发展方面获得的重要礼物，也是这个物质繁荣的时代所需要的。

从人子共生社区出来，搬去农家的第一天，正赶上房东“打油菜籽”，就是把油菜籽的豆荚在太阳下晒干，然后用一个简单的工具“二杆”，把油菜籽从豆荚里打出来。看他样样都是一个人在做，就跑过去帮忙了。我喜欢这种全身的，大汗淋漓的运动。

就这样，最初搬去农家的那段时间，基本是房东做什么，我就跟着他做，掰包谷、种鸡豆，在菜园里薅草、下菜种、浇沼液，状态就像个小孩子——“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有时候，觉得烦闷的时候，也会想“这样的，完全放下过去的生活经验，和生活的连续性，去面对新的当下，这样的人生是勇敢还是愚蠢？”但好像不这样走，就等于没有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是在恐惧的控制下。或许，在自己内心中有很多声音，我只是选择了过去最不敢碰触，最不信任自己的那部分。



拉市海上南尧的彝族村寨

3.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代表作之一。主要讲述释迦摩尼的开悟之道，1922年出版。



撒种鸡豆

在那段时间里，也是冲突、笑话不断。有一次，夜里穿过院子去上厕所，滑了一跤，结果左边的肩膀十多天都不能动。一个年轻人走路也能跌跤，被他们笑了很久。不过那次事情过后，我走路就会留心着周围的环境，不东想西想了。我不吃肉也让他们很好奇。一段时间他们觉得，我不吃肉很可怜，会影响健康。后来，见我的身体也还好，就认定我是“搞迷信的”。过去他们这里有“做迷信”的人，也是不吃肉，认为自己死了以后会变成神仙。他们总试图用在地的生活经验，去理解外面的人，外面的事。后来，我开始经验和理解了：“这种在踏实生活里形成的，朴素的认识世界的方法，是非常敏锐和直觉的。”看似“稚朴”，但是因应着传统乡村生活本身的丰富和复杂性而形成的，它又是非常整全、科学的。

我很喜欢他们所展现出来那种“活

泼泼的好奇”，这是经常在阳光下，做体力工作的人特有的，好像有种精神的活力在里面。也是因为喜欢那其中展现出来的健康，在挺长时间内，和他们一起工作和生活中，我都是发挥同感的状态——在“做”的行动中投入进去——可能在无意识里，我想拥有他们身上的特点，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吧。白天做完体力活，晚上疲惫得连日记都不想写，书放在眼前，一会儿人就睡着了。

来农村之前，我在社区伙伴工作七年，自己也上过“活力耕作⁴”方面的培训课且读过不少相关著作，自以为在生态农业和自然教育方面多少是受过训练的，所以会常常试着在聊天过程里和对方讲讲生态农业、社区支持农业的做法，也算是在社区伙伴时养成的工作习惯吧，记得工作那时，好像也会得到很好的回应。但在这里生活，没有了过去的工作平台，发现在现实里，自己懂的、能用起来的还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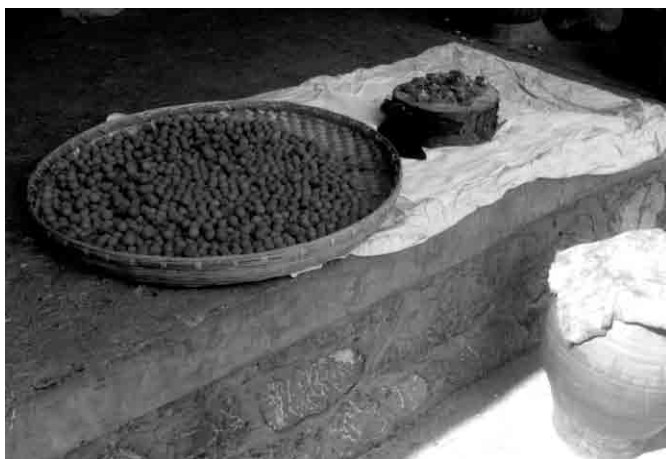
在农家生活的一些观察和省思

农民需要的是“一些可以和他们的现实马上结合起来的東西”。他们不是不晓得生态的道理，比如我的房东就晓得“山土”（树叶枯草等在地面上腐烂逐渐积累起来的一层土）的重要，他和我说：“在山里，树上的叶子、果子熟了、落了，霜来草枯死了，化为山土。有了山土，掉在里面的种子就更有活力，能生发出来。如果没有这一层山土，种子就会被太阳晒、被冻，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土壤是生态农业里的核心因素之一，在过去的传统耕作方法里，不管是纳西族还是彝族，他们会在旱季，去山上搂腐殖土背回来。种东西的时

4. 1924年6月，德国及奥地利农夫向人智学家鲁道夫施坦纳(Rudolf Steiner)要求，希望他能为欧洲农业的困境提供解决的对策，施坦纳为此做了八场演讲，成为日后自然活力农耕的基础理论。所谓的自然活力农耕是一个创造及维持生命能量的方法，将土壤视为人类健康的根本，以回归有机物到土壤中来保持其沃度，土壤不只是矿物质或有机物种种元素的结合而已，应将之视为一生命体，须保持其平衡。



传统火箭炉



制作梅子汁

候, 放去田里做基肥, 或是盖在苗上。

但今天的现实是, 家里的劳力主要是外出打工赚钱, 又有化肥可以依赖, 上山背土就成了辛苦事。整个社会都在“用钱来衡量价值”, 从这个角度上看, 农业就是辛苦又赚不到钱的工作。传统的农耕生活, 失去了能让农民内心安稳、获得幸福感的精神力量。

传统上以家族为基础形成的自然村, 在家家户户之间有多方面的安稳助力。纳西族称这样的做法叫“相帮”——不管是盖房子、庄稼收获时, 村民之间都是互相约起, 一起去做, 共同面对。但现在, 家族成员之间的互助体系, 也正在一点点地瓦解。壮劳力平常外出务工赚钱, 地里的活本来就顾不上, 农忙想请人的时候, 即使有宗族关系在, 也是要考虑人情, 要按市场价付工钱。这样, 农业生产的成本就抬上去了。过去是“为生活需要而耕作”, 而现在要考虑经济因素, 考虑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你在一些细微处, 能看得见生活在发生深刻的改变。比如在过去, 一家人想要盖房子, 会约起伙伴来上山砍木料, 立木架、泥砖上墙的时候, 全村人都会来帮忙, 也会留下吃酒, 好像节日一样。实际需要支付的, 只是大工匠的工钱, 金钱成本并不高。但现在, 是专业的包工团队来做, 价格也逐年升高, 起一所房子, 至少要三十多

万, 这是很多家庭无法负担的事情。旅游业发展、种植经济作物、外出务工赚钱、使用农药化肥、生活金钱成本增加、西医药治病代替传统的草医等等, 这些看似无关、细微而缓慢的变化, 却好像曹操打东吴时用铁链把自己的战船一一拴起来一样, 发展到一定的阶段, 就会完全改变村人的生活状态。

我说起有机菜比较清甜、有菜味, 我的房东不以为然。他觉得, 不用化肥, 菜的叶子长得“不旺不嫩”。现在人做饭, 油盐调料加得多, 鲜甜是感觉不到的, 只有“嫩”还感觉得到。而长得不旺, 就没有产量, 也卖不到什么钱。通过使用氮肥带来的“嫩、旺”, 虫子也喜欢, 不用农药, 就没有了收成。这个例子里, 看见了“为赚钱做事”和“追求强烈感官刺激”两个东西, 这是现在城市生活中的两个重要部分, 村人们只是在农村的环境里模仿了城市生活的追求。老子说“虚其心, 实其腹”, 这样才会养人内在的天地, 天清地宁。但全面看我们现在的的生活, 甚至大的气候、环境, 方方面面都是颠倒的, 哪里还是随顺天地的生活状态?

贴近泥土的生活, 有智慧

其实直到今天, 农家的传承并没有断, 村人有着丰富的耕作经验和对自然的

认识。一些我在永续耕作设计里学到的东西, 在这里有着更鲜活的表达。比如我们说的“就近原则”, 我的纳西邻居说是“远田不富家”; “厨房菜园”的设计, 这里几乎家家都是这样做的; 营养循环系统, 在纳西人以庭院为核心、种养结合的做法里, 体现得很明显; 很多人在网上介绍的火箭炉的设计原理, 和农家用玉米棒子烧火盆时的做法是一样的。

依据农历, 他们清楚每种作物适合的种植季节、生长周期以及生长过程里可能遇见的各种情况。植物有两个生长旺盛的季节, 一是春天; 另一个是“三伏天”——这是我过去不知道的。今年8月份有一天, 阿叔指着一棵树上发的新枝, 说“树发三伏枝了”。忽然间, 我对“春生、夏长”就有了实际的感觉。

前段时间, 梨树下落了一地梨子, 我就问阿叔是不是梨子熟了。他用刀切开一个梨子, 发现梨子的核里面很多虫卵, 从内向外烂。他说在4月20日至5月20日这段时间, 在本地有种天牛会把卵产在开花期末尾时的小梨子里面, 那时候如果不打农



传统养蜂蜂箱

药, 几乎全部果子都会生虫、落下。

丽江地区有很多品种的芸豆, 黑紫、红白、黑蓝、米黄、奶白, 各种颜色, 农家传统上都会在自家的菜园里种上些, 入夏就有豆荚吃。有一次, 他指着后院种起的芸豆, 让我看看出了什么状况。我见豆子长得很旺, 只是平常看到的叶子是深绿色的, 而这些是草绿色的, 有棵甚至是黄绿色。我猜是生了白飞虱(当地人的叫法), 它们喜欢藏在茂密叶子背后, 越靠近泥土, 有点湿气的地方就越多。他得意地笑着说“一定是蚂蚁在咬豆根”。后来, 我们走过去, 扒开叶子, 确实是有一大窝黄蚂蚁忙碌地跑来跑去, 那株叶子明显变黄的, 的确有很多蚂蚁在豆根处。

平常中, 这样的例子很多。他们不会总结出来, 但遇到时就会讲给你听, 记不记得住, 就看你用不用心了, 这应是农家生活知识的传承方式。我很尊重村里的这些经历过生活风雨的老人, 不过, 我也意识到, 他们丰富的本地知识, 是在一个求生存的意识状态里积累下来的, 目的是为了了一家人的生活需要。而一旦他们掌握了更强有力的, 对抗自然的方法, 他们就会把这些新方法发挥到极致。比如他们掌握昆虫出现的规律, 那他们会在很恰当的时机使用农药, 让昆虫无法在这个环境里生存下来。他们掌握了树木的生长规律, 那他们就会想建立有一定规模的果园, 修剪树形, 让树木矮化、透气、透光, 方便打药和摘果, 使用杀菌杀虫剂、套袋等技术, 而放弃传统的多样化, 种植适合本地的品种, 以及保持“自然树形”促进树木健康等做法。

农村需要属于自己的, 新的生活文化

现在, 他们也是把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规模化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上。这些经济作物多是从外面引进的, 比如“丽江雪桃”, 实际是从山东和安徽引进。每

个桃子可以长到一斤左右,但生长过程中,需要复杂的管理技术,去面对坐果时的虫害、雨季的病害、旱季光照过强时的裂果等问题,桃树的盛果期也只有六七年,其实并不适合本地种植。但因为售价高,政府在本地大面积推广。而一些适合本地生长的农作物,比如梅子、海棠果、茨满梨、老品种山药等,很适合当地土壤、气候,不用很复杂的管理,但因为一段时间里市场价低,人们就渐渐放弃了。

人们的内心追求发生了变化,过去人们是为了生活需要而耕作,而现在主要是为了现金收入。电视里的内容让人越来越认同城市文化,而观光旅游让人找到很容易赚钱的方法,这一外一内,很配套。而还在土地上耕作的人,也被裹挟着,卷了进来。我曾经在本地略略尝试过社区支持农业的做法,想鼓励他们种适合本地的传统品种,我来找在城市里的朋友和网络支持,后来发现,他们关注的是我有没有帮他们赚大钱的机会,见我有没有要“投资做大”的意思,虽然有些朋友,但想法“蠢笨”,要做的事情(种植的品种)是他们已想放弃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没有和我深入交往的兴趣。我意识到,社区支持农业帮不了他们,他们从城市的强势文化里,只看到一条出路,那就是赚到很多的钱。

我自己也困惑了挺长一段时间。白天忙碌起来的时候不觉得,但晚上,人静下来,就会想:“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的意义在哪里?”想要珍惜拥有,珍惜老天给的礼物——这干净的天空、水、山上的森林、鸟兽、肥沃泥土里那些丰富的物产、千年来纳西人在这里生活的积淀,这其中所蕴含的美好,怎么在自己的生活里活出来?大理古城厚重的人文气息在诱惑着我,但我心里还是不想就这样离开。我在想,也许这里的人,需要看到,城市里的人也有另外的、不同于主流的生活追求,有些部分,可以和他

们的生活经验、文化结合。有些活法,不需要很多钱,但让人心里觉得幸福。

我现在没有资源去通过项目来影响他们,但可以去创造自己在这个地方的生活,展现出新的生活文化。这是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而我也在这个创造自己生活的过程里,有机会去向本地人学习,进一步发展出与自然、与人更友好的生活态度。说“态度”,而没说“技巧”,是因为我觉得,具体的技巧,是因做法背后的态度、想法,因人的特质,在长时间的生活过程里发展出来的。

很感恩这个过程不是我一个人走过。这期间有许多朋友,或长或短,在这里停留、陪伴,离开也是牵挂,从他们在村里生活的过程、感受和认识里,我也学到很多。只有更多人的更深入的参与,才会在地创造出空间,一个小小的,存在于农村的社区,或者说是一所生活学校。这样,基于在土地上的扎实生活,发展出新的生活文化,滋养到这个地方的人,也滋养到从城市来参与这个事情的人。要做的事情清晰了,人就会有长时间走下去的力量。

我渐渐看清楚自己的特质,想要去做的,是城市和乡村生活文化的发展。在这样的生活文化里,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有更多的理解和尊重。脚下黑黝黝的泥土,人类追求精神之光,都给人力量。而其中最让人感到温暖的,是以真诚为根基的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



房东阿叔和他种植的雪桃



沃土支持的返乡青年全家福

我的返乡青年探访路

遇见乡村灵魂

文/图 小朱

编者按

作者是沃土工坊¹返乡青年支持项目的工作人员。他的工作主要是走访项目所支持的返乡青年,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面对的挑战和需要的资源,然后为他们招募合适的实习生。这份工作,正好间接达成了他返乡的心愿。

1. 沃土工坊(Nurture Land)是2006年在广州成立的一个志愿者团体,草创人员是一个城市的反思群体,逐步意识到很多社会问题来自商业社会中“城市-乡村、农夫-土地”之间的掠夺关系。从2008年起,沃土工坊正式开始作为CSA平台来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以合理的价格支持到从事有机耕作的小农户,同时也尽力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健康农产品。

我与沃土的缘分

高中时候的我出现了厌世情绪，想着以后要到城市，过每天推推搡搡的挤公车，尔虞我诈，坐在格子式的办公室的生活，就会打冷颤。农业的梦想也源于此，可以避世，走在麦田，挤挤麦子，摸摸玉米，美好的田园生活。慢慢地，却假戏成真，爱上了农业。

大三以前，就一直在关注农业，关注农村的一些政策，那时向往着美国式的大农业。可了解越多，知道那是化肥农药堆出来的粮食，这些东西越让我觉得厌倦。偶然间读到石嫣博士²的《我在美国当农民》，陷入其中不可自拔，之后着迷一样地买了很多健康农业的书籍来自我充实，像是又找到了组织。

大四上学期，知道了河南返乡青年王宁³，便与之取得联系，到归朴农园实习。王宁给我介绍沃土工坊，心向往之，回到学校便与沃土工坊负责人小郝取得联系，想去沃土做志愿者。2014年初，我前往广州做志愿者的前三天，王宁大哥告诉我沃土招募“返乡青年支持项目”项目助理的信息，试着投了份简历。于是，我换了个身份来到沃土。

张家口的乡村

到沃土后，即刻开始行动起来。张家口李遇夏是我探访的第二位返乡青年。

进了村子，异常的安静，没有孩子嚎叫着：“我藏好了，找我吧”。孩子真的和我们玩起了躲猫猫，他们却是躲到了城市，在这找不到；甚至没有年轻人玩着现时乡村文化流行的“斗地主”。穿过村子，看到了一群

老人在秸秆垛旁，在温暖的太阳下歪着斜着，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什么。看到了荒芜的院子长满荒草，看到了昔日辉煌的大剧院没了屋顶，看到了一位老人拄着拐杖蹒跚着向我们走来，她的儿女去了哪儿？

遇夏的爸爸说，村子之前有四五百人，现在只剩下一百来人，家里有男孩子的早搬去了城市，不然在这找不到媳妇儿。

村子的荒芜会传染，传染到了田地中。种植了作物的田地更加零星，冬天的黄土高原，徒增了一片荒凉。

乡村如同那位蹒跚的婆婆，儿女不在身边，老人的心会是怎样空旷？儿女就是她的灵魂，硬生生地被抽出体外。

这或许只是一个缩影。

看到这些想起自己那也只剩有一百来人的小村子。穿行其中，走上几步就可以看到已是满头白发的爷爷奶奶跟着孙子孙女屁股后面跑来跑去，甚至那小小的身影还会抬起那娇小的手指，指挥着老人们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外出打工赚取金钱的父母不在身边，老人的溺爱，让留守的孩子们已经无法理解“孝”字的含义。如果留心，走着，你可以看到有四五户家门紧锁，一些枯草从长满苔藓的墙上爬出来，偷偷观察着这个小村落的变迁，想着再过几年是不是还能占领几个院子？

这是我的家乡，河南一个普通的村落。平原的村子虽未有山区与丘陵地带那样触目惊心的衰败，谁知她是不是下一个“小山村”。

返乡人的战争

来沃土前，一直想着回家做个返乡人。

2. 石嫣在读博期间曾到美国学习生态农业，回国加入小毛驴市民农园团队，后创立了分享收获CSA项目，翻译了《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日本的永续农业》、《分享收获：社区支持农业指导手册》《慢是美好的：慢钱的魅力》三部相关著作，著有《我在美国当农民》一书。

3. 河南登封归朴农园创办人，更多故事请参阅《归朴：王宁的返乡路》一文，载于《比邻泥土香》第五期，2012年。



高中时家人听到我的想法只是一笑，当作小孩子的玩笑话而已。大二时，大学里的玩乐之风让我开始觉得厌倦，心想不如回家种地来得痛快。和家人商量要退学的事情，他们才知道高中的想法一直埋在我的心底，也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妈妈说：“你退学就别回家了”，70多岁的爷爷说：“你回家我就走，活了一辈子，你上了大学要回家种地，我丢不起这人……”

直到前段时间我才理解当时家人过激的反应。探访河南返乡青年白飞时，白飞说：“我回来的时候他们不理解，甚至看不起我、嘲笑我。现在想想，其实他们是瞧不起自己农民的身份，把这种情绪转嫁到了我的身上。”

遇夏的爸爸在村里担任会计，算是村里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2003年遇夏考上了父亲曾经就读的河北北方学院园艺专业。毕业之后，遇夏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农药

销售、导游、园艺……直到进入北京德润屋生态农场⁴。有机种植的蔬菜能使自己的身心得到安定，同时传达健康生活的理念。顾客对德润屋能提供无污染蔬菜而心存感激，这是其他行业所没有的。担任客服工作的遇夏深有感触。不久后当时还是男朋友的黄利峰也来到德润屋学习技术，小两口搭档着，过着轻松真实的幸福生活。

然而，家乡土地的贫瘠和荒废，时常让小两口惋惜不已。而公婆利用当地气候和土壤以生态方式种植出来的土豆品质非常好，这给了他们返乡的动力和决心。

我们来的时候，遇夏夫妇已返乡两年，看到的是一幅乐也融融的画面：三代同堂，一家团聚。可这两年，一定过得不容易。

首先是来自家人长辈的不理解。有利峰爷爷的不满：“花那么多钱供你上大学，怎么又回到农村了？”也有遇夏妈妈的忠告：“三年学个手艺人，一辈子种不出个庄

4. 北京德润屋生态农场于2004年开始运作，是北京最早开始社区支持农业尝试的单位之一。德润屋曾作为社区伙伴的“社区支持农业实习生项目”接待平台，而遇夏就是2009-2010年一届的实习生。



稼人。”这些不理解和压力，也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根植于他们几十年来的经验和教训。

农村本身就是一个社区，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村的“唾沫”要比城市来得猛烈而激烈，承担这些“唾沫”的人，不仅仅是返乡青年，而包含了返乡青年的整个家庭，父母承担的压力往往比返乡青年本人更甚。有时父母只能把这种压力再次转移到返乡青年的身上，以迫使他们再次返回城市，成为乡民再次羡慕的“成功人士”。

如果当时的我一意孤行，不知亲人们将会忍受怎样异样的眼光？那是一次注定不成功的返乡，我却还想着换个地方尝试一下。

准备好了吗？

继续回到学校的我，仍按捺不住那颗要蹦出来的心。半年后，我拿着全部的学费跑到同在一个市而又离家比较远的地方，准备开展种地大计。由于乡村社会的种种原因，种地的计划仍不能成功，没有技术、没有人脉、没有渠道的我灰溜溜地回到了学校，继续过着校园生活。

现在回想起来却也庆幸当时未成行的计划。只有理想主义者的热情和冲动，基

本可以预见结局有多凄惨。

除了乡亲的眼光，还有来自老天爷的考验以及劳作的艰辛。在遇夏的村子，村民们像供神一般供着村里唯一的一口老井。当地虽然有大片的梯田，却完全没有灌溉的条件，只能靠天吃饭。利峰家乡的土豆，在开花时节下了一场冰雹，收成只得一半。利峰家的土豆地离家比较远，农忙时两人根本顾不上回家。在田埂上挖个坑，把锅架上，烧点柴火，把早上的饭菜热热，就是辛苦一天的晚餐。就着车上水箱的一点点水，随便洗下脚，就在车里座椅上将就着睡一夜，第二天起来继续干活。即便如此，一年到头，还是没有多少收入。

准备好了再返乡吧，农村、农业再加上家乡的农民，容不得含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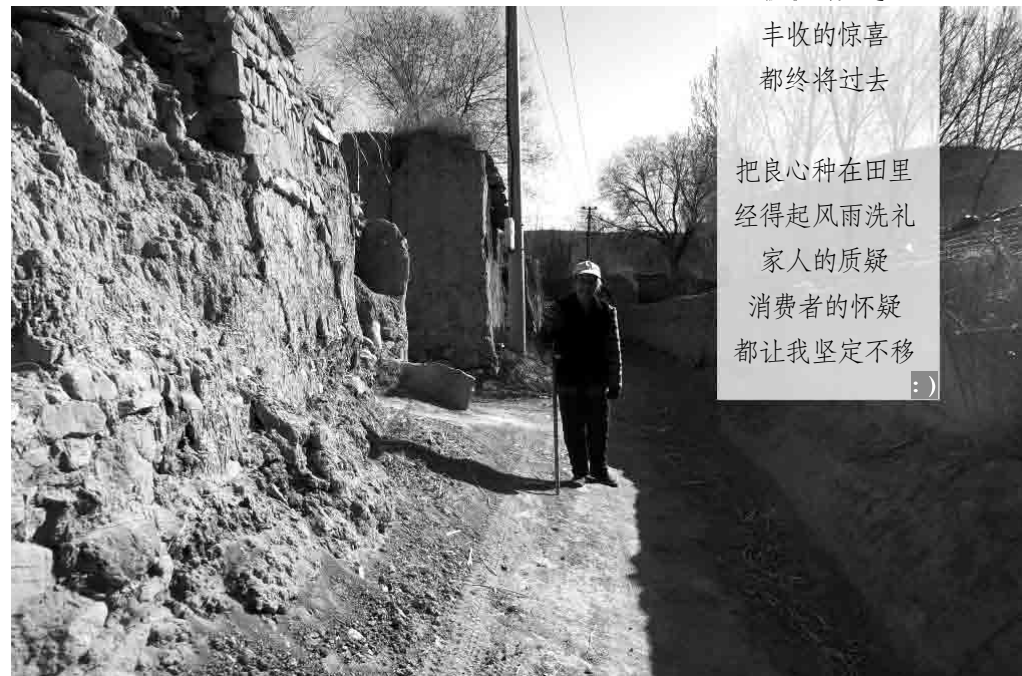
遇见乡村灵魂

来到沃土工坊，探访返乡青年是我的工作之一，正好也遂了那颗曾想返乡也不安分的心。我的探访之路仍然在继续，也会看到更多的返乡青年，我愿意更多地了解他们，写出他们感人的故事一同给大家分享，因为他们身上具备的某种情怀始终感动着我。

因为他们会想念小时的乡村，怀念土壤的气味，但看到周围满是荒草的院子，看到空虚的留守儿童，看到拄着拐杖低头走路的老人，他们觉得痛心，会有一种莫名的责任感让他们觉得需要做些改变。张扬寻找老师来家乡支教，王宁发动募捐为儿童寻找书籍，童军、姚慧峰、白飞等组建合作社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乡民。他们这是走在寻找乡村灵魂的路上，殊不知，他们已变成乡村新的灵魂。

他们不愿待年老时归乡，他们只愿意年轻时在能接触到的土地上做些好的改变，以此为志，他们就是乡村的现代图腾，保护着自己的家乡免受更大的破坏，恢复着已经没落的乡村文化。

这些返乡青年也是平凡的人，在他们的旅途中也会出现有对与错的道路，也愿更多人来守护这些善良的、以乡村的发展为己任的返乡青年们，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图腾，守护他们、监督他们，也跟着我们的脚步，追随着这些人的脚印，见证着他们的返乡路。



谨以此诗献给这些乡村灵魂：

把良心种在田里

小郝

不要问我我为什么回去
现在的生活并没有不满意
只是日益年迈的父母呀
他们终将老去

不要问我我为什么回去
城市的生活并不是不如意
只是
家里的那边土地
迟早需要年轻人担起

不要问我为什么回去
曾经我也想过要远离
那养育我的村庄啊
正日渐凋弊

把粮食种在田里
经得起风雨打击
歉收的失意
丰收的惊喜
都终将过去

把良心种在田里
经得起风雨洗礼
家人的质疑
消费者的怀疑
都让我坚定不移



编者按

大学毕业后，张扬找到了北京的一家央企工作。别人眼中安稳的城市生活过了8年，他还是选择回到家乡四川威远当他的“柠檬君”。2013年11月，张扬参加了社区伙伴举办的“朴门永续设计工作坊”，他对生活在土地上的不同生命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不得不提的那些药柠檬(化学柠檬)

有朋友建议柠檬君，不要去说别人的化学柠檬不好，然后衬托我的生态柠檬有多好。我说好吧，我同意不去诋毁一个人，也不去诋毁一个产品，但请听我分享一个最近的经历——

今年7月份，我和两位城里的消费者朋友，去参观一个生态柠檬园(网上宣传时

这样介绍)。到达时，除柠檬树之外，光秃秃的土壤，毫无生气。我摘下一根嫩枝条，让两位朋友问有什么味道没？朋友当时觉得没什么味道，我把枝条搓了几下，然后我们就上车了。

过了一会儿，两位朋友问“为什么药的味道这么浓？”我说：“这不是药的味道，这是刚才那个柠檬枝条的味道。”朋友受不

了：“快开窗，扔了。”但即便这样，两位朋友还是不停抱怨，“今天头特别疼，中毒了。”

市场上的柠檬就是这样被工业生产出来的，毫无生机的土壤，带着药味的柠檬树。但除了这种方式，还有别的办法吗？

下图的柠檬枝条很好看，但很遗憾的是，嫩枝条过多又壮，跟过量施肥有很大的关系。

追寻健康安全的种植方式

因为2013年柠檬价格的暴涨，为了逐利，化学柠檬园今年喷药达20次以上。在面对周围的柠檬种植都是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的时候，同时周围的人也告诉我，不用农药化肥，种不出柠檬，没有产量。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只能用儿时简单的记忆来告诉自己——不用农药化肥也是能种出庄稼的。只是不用农药化肥，怎样可以解决除草的问题，和保证柠檬树能结

出生态柠檬来呢？

在朋友的帮助和支持下，了解过活力农耕，自然农法¹，朴门农法。最终根据自己的生态柠檬园情况，选择了简单易学，也适合自己过往农作经历的朴门农法。

2014年朴门农法学习实践情况

杂草帮忙生态柠檬园

·关于杂草的记忆

从11岁开始，除了学习的时间，我就跟爸妈一起干农活儿。在农作的经历当中，印象最深的是，农活儿除四大紧工(收小麦，种玉米插秧，收玉米收水稻，种小麦收红薯翻土)外，一半以上的时间花在了拔草上。时常因为杂草太多，一个人拔完一亩地需要一个礼拜以上的时间。对于杂草，青少年时的记忆是深恶痛绝。

·“科学”的除草剂

高二时学生物，尤其学到杂草的属性相近，使用一种特殊的生长素可以使大部分杂草因为细胞过度分裂而死掉，从而实现除草的目的。心里窃喜，因此极力鼓励家里人买除草剂来除草，从而减轻劳动，只是母亲因为不习惯这样的转变，而不了了之。

·解决生态柠檬园杂草问题的办法

在返乡时，除草的事情期待交给“鸡、鸭、鹅”来帮忙做。限于地形，周围农民“嫉妒”，投入成本大三个方面原因，不得已放弃找“鸡、鸭、鹅”除草的方案，而选择人工割草的方案。

然而，虽然不会选择除草剂，但对于杂草的态度，还是认为杂草除了吃肥，没有太多价值。



1. 自然农法由日本的福冈正信于二战后首次提出。受中国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主张农业走与自然合作的道路，而不是征服自然，形成不翻耕、不施化肥、不中耕、不施化学农药的种植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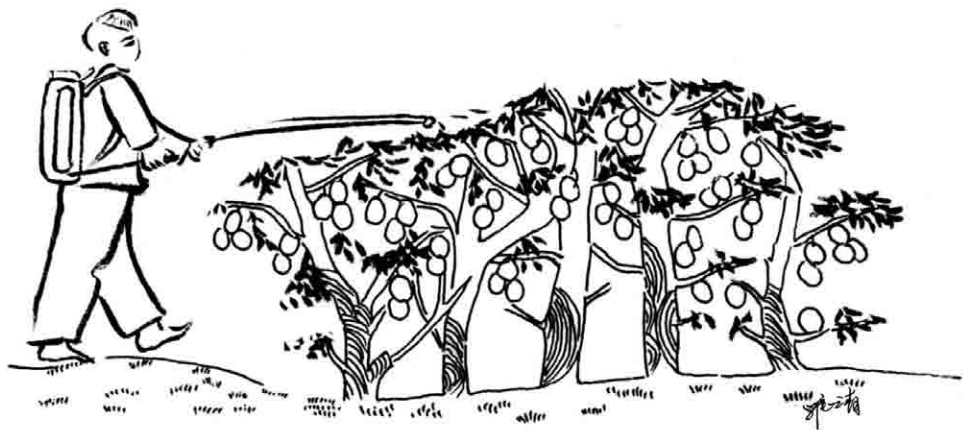
化学柠檬园的管理

对于杂草的态度是：只要杂草高到影响人在园子管理柠檬树（半个月-1个月喷一次农药）时，即开始喷洒除草剂（一年喷洒4-5次）。如此导致土壤里的微生物、小动物、有益菌类几乎灭绝，土壤的结构彻底破坏。当太阳出来时，直接照在土壤上，“烤土”；当雨水来临时，直接打在土壤上，“打土”，以至于土壤板结。当遇到今年的雨水特别多时，化学柠檬园的土壤就完全失去了它应有的调节功能。化学柠檬园，让柠檬树独自面对和处理过量雨水，导致积水太多，因而落果严重。



生态柠檬园的管理

今年雨水特别多，杂草异常茂盛。恰恰是这些茂盛的杂草，帮忙处理了土壤里过多的水分，尽最大可能维持土壤里水分、养分、微生物、菌类的共生平衡。因此，在生态柠檬园，柠檬树不是独自面对异常的气候，而是杂草来帮忙，整个土壤系统协同作用，一起来度过这些艰难时刻。因此，生态柠檬园的柠檬树们压力小很多，可以专心地抚育生态柠檬，从而，柠檬树落果轻微。



肥力让我不至于像木村阿公²刚开始那样颗粒无收

自然农法、活力农耕等，我相信都是特别好的学问。但对于我现在生态柠檬园情况，对于不施肥（自己做的生态堆肥），还不敢尝试。

今年，60亩生态柠檬园，预计出产7000斤生态柠檬。我自嘲，这7000斤生态柠檬，是我的救命柠檬，不至于像木村阿公那样颗粒无收。然而这7000斤生态柠檬，基本上都来自于土壤好且去年施肥较足的土地。

然而，这7000斤生态柠檬，能够挂果，直接原因却不是因为肥力足——而是因为肥力足，所以在冬天时，柠檬树能够安全过冬。肥力足的柠檬树，面临红黄蜘蛛虫害时，有足够的叶片够它们吃，被吃了后也不容易落叶。从而等冬去春来，生态柠檬园满园花色，能顺利挂果的，是那些有丰富叶子的柠檬树，那些因红黄蜘蛛把叶子给吃完了的柠檬树基本上不会顺利结柠檬。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化学柠檬的管理：在冬天来临之前，必须喷洒足够的农

药，把红黄蜘蛛及一些菌类毒死；同时施足够的肥，让柠檬树“吃饭”过冬。也就是为何，今年春花挂果，化学柠檬园的柠檬树特别茂盛，开花挂果非常顺利（当然在开花之前打保花的药，在挂果之后打保果的药），预计能有3000-4000斤/亩的化学柠檬，而我的生态柠檬园预计只有150斤/亩的生态柠檬。

朴门农法的生态堆肥，简单易学，也没有玄妙的东西，但对于我的生态柠檬园非常实用。

朴门农业，规划先行

在将近1年的朴门农法实践过程中，我受益颇多，也从理论上对农业有个系统的认知，并指导自己操作管理生态柠檬园。

当然，遇到的问题是，在生态柠檬园，做堆肥、施肥、喷洒酵素都非常的困难，成本很高。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于生态柠檬园限于条件，没能做布局规划。

因而，以后新的生态柠檬园要进行朴门实践，规划是首先要做的。对于其他计划涉足农业的朋友，也是特别的建议，请先把规划做好。■

2. 木村阿公是《这一生，至少当一次傻瓜》一书的主角、《苹果教我的事》一书的作者。在三十年前的日本，三十出头的木村阿公深信没有农药、没有化学肥料都能够种植出香甜的玉米、可口的苹果，周遭的亲戚、朋友和乡里都视他为傻瓜。最初几年苹果树的情况惨不忍睹，但他没有放弃，最后他从野生果树找到自然农法的解答，培育出令人惊叹的苹果。

·今年（2014年）杂草帮了大忙
直到学习朴门农法，才意识到对于果树来讲，只要保证不影响果树开花挂果、光合作用，杂草却是改善土壤，保护果树的好帮手。

今年生态柠檬园总共割草三次：开花时一次，7月-8月一次，10-11月一次。杂草在今年实际帮忙如下：

a. 割完草后，从杂草肥力上来看，看不出特别大的影响来。但是通过杂草可以看出这块土地的肥力程度。

b. 土壤从去年到今年两年的修复。由于杂草的保护，土壤里的微生物、小动物得以繁衍。如此，土壤的养分、空气得以增加。少部分土壤还是比较“瘦”，但大部分

土壤已展现土壤应有的样子，有泥土的香味，有空隙，团粒结构。

c. 受厄尔尼诺气候影响，今年四川雨水特多。自5月至7月不断的降雨，对柠檬的产量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离生态柠檬园2公里处的化学柠檬园，春花挂果特别多，预计亩产可以实现3000-4000斤。但后来过多的雨水导致落果，减产到亩产预计2000斤左右，预计减产37.5%左右。而我的生态柠檬园，春花挂果很少，平均下来预计一亩150斤左右。经过“雨季”的洗礼，还有120-130斤/亩，预计减产15%左右。

生态柠檬园比化学柠檬园减产少很多，一方面是本来产量低，但另一方面，杂草的功劳最大。

编者按

作为一名母亲，她是广州一个关注儿童健康成长环境的机构“三粒豆亲子工作室”的发起人之一，每周末广州各大图书馆都有她们组织的故事会。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她在课堂上会使用模拟法庭、参与式性别剧场等“非主流”教学方式。但很显然，学生和老师都乐此不疲。作为一名资深“驴友”，她把旅行和关注的议题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她好像总有使不完的精神，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生活着”的理想主义者，在城市漫游、思考、探索，想象城市是否可能诞生与主流的陈述所不同的故事。



慢城奥维耶托

让人迷惑的生活

在2012年，广州地区关注食物议题的朋友们每隔两周便会聚在一起，举办意大利卡罗·佩特里尼所著的《慢食运动》¹读书会。我们在读书会上讨论怎样的食物才算是优质、清洁和公平，每个人是如何理解食物主权，在我们居住的城市有多少的食物故事，其背后又在诉说着些什么。从此，“慢”这个字在我们眼里有了更丰富的涵义。

2013年某天，我走进北京路上的联合书店，进门便看到台版书籍《慢城——走访意大利的慢活之路》²，发现慢城的发起与慢食运动有着不解的渊源，而慢城更让我看到另一种城的可能性，即刻拿下。书还没来得及细细翻看，就因为工作前往北京。

作为一个曾在北京生活过4年的人来说，这座如同巨无霸般无限制发展的城市已经变得陌生而遥远。初见回龙观地铁站前大片空地时，我实在觉得有些浪费，直到高峰期时才弄明白，北京这个三十多万人口聚集的区域每天早晚一共两次，一次不落的上演春运故事。而后我又往另一个地区，沿着布满灰尘和垃圾、见不到一棵树的马路前往一流动人口社区，路边堆着传说中的集装箱楼房，一个个分割的房间如同监牢仅容得下一张床，而那很可能就是我的学生在毕业后即将栖息的居所，我突然觉得迷惑了。蚁族³，还有鼠族⁴在这

样一座巨大的城市里，他们对生活的期许究竟如何？生活的实质又是什么？

慢城奥维耶托

当我们来到罗马著名景点西班牙台阶时，我躲进附近街道的麦当劳餐厅躲避正午直射下来的炙热阳光，而这里，记载着慢食运动的开始。在上个世界80年代，为了阻止麦当劳将餐厅开在这里，卡罗·佩特里尼发起了一次别样的抗议活动：麦当劳为大家提供“快餐”，我们就告诉大家应该“慢食”；麦当劳的招牌是汉堡包，我们希望大家看到意大利传统食物意大利面究竟有多么美好。在这场抗议活动中，慢食运动诞生，卡罗·佩特里尼呼吁，应当将食物恢复到核心地位。食物不仅关乎我们的文化，当我们今天谈论永续发展时，更无法忽视在整个生产系统中，农业占据了70%以上的能源消耗，卡罗的话一点也没错。

那，慢的城，又应该是怎样的？离罗马不过一个小时的火车，便来到山城奥维耶托，《慢城——走访意大利的慢活之路》所描绘的一座城市。因为城市禁行汽车，人们只能依赖有轨缆车或者扶梯前往山上的小城。禁车的理由很简单，当地没人愿意推翻几百甚至上千年的街道和房屋，只为了能让汽车通行，他们相信，城市是属于人的，而人们只有在行走时才能相遇，才会彼此问候、

1. 书名全称《慢食运动：为什么食品要讲究优良、清洁、公平？》，作者卡罗·佩特里尼为意大利美食专栏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慢食运动的创始人。国内于2010年出版。

2. 继慢食运动后，另一个蔓延全世界的生活概念——慢城运动（Slow City）——也诞生在意大利的小城中。本书著者《La Vie》编辑部直接挺进慢城运动的发起地之一，也是国际慢城总部——意大利奥维耶托（Orvieto），在当今全球化社会，重新审视传统价值，探索永续经营的理想，如何落实于城市生活中。麦浩斯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

3. “蚁族”指的是那些聚居于城中村，收入不高、工作不稳定的“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学者廉思是“蚁族”一词的首创者，在其2009年出版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一书中对这个群体进行了访谈研究。

4. “鼠族”指租地下室来生活的一群人。因为收入不高，而房价和租金连连攀升，为了在大城市生活，越来越多新近涌入城市的住户只能成为地下房客。



作者母女二人行走在慢城

闲聊,从而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食物和文化被称为慢城的三大要素,奥维耶托四周被连绵不断的葡萄藤、橄榄树环绕,美丽而富饶,小杂货店则供应着当地农夫生产的蔬菜和瓜果,生态和本地种植早已获得居民的普遍认同。即使是一家小小的冰淇淋店,也是家族几代人经营下来,每天只根据最新鲜出产的水果来决定该生产什么口味的冰淇淋。沿着古朴的街道行走,你所熟知的连锁超市、麦当劳、星巴克或者大卖场,统统消失无影踪,对比起国内一线、二线城市所有高度同质化的商场和品牌,在这里,家族经营的小手工艺商店更让你惊喜,肉肠、皮革或者陶艺,每件商品都是独一无二。小城里有一家曾被评为“Best Café in Italy”(意大利最佳咖啡馆)的咖啡馆,古朴庭院里的网络与设施却是现代而人性化的,让人感觉时光交错,古老的城市将现代技术融合得恰到好处。当然,更让人羡慕的是,城里居民每天步行上班即可,商铺的工作时间常常是早晨11点到下午1点,中午关门谢客,下午4点到晚上7点再开门营业,这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时间

陪伴家人,而不是浪费在交通拥堵上。

所有的慢城都必要遵守慢城宪章中多达54条的政策:推广有机、反对基因改造农业、减少噪音和交通流量、增加绿地与徒步区、在地消费、奖励环保科技、保护当地美学与美食传统、培养热情好客的睦邻关系等等,同时也誓约要创造更健康的环境,让居民意识到缓慢步调的生活价值。没错,说到底这是在反全球化的延伸,也是传统文化的传承。

城市发展与生活探索

我始终认为,人们在最初建立城市时一定带着美好的生活期许,而今天我们对于城市生活的想象竟然如此贫乏,以至于除了高楼、马路跟购物商场,再无所求,城市越来越和人、和自然、和生活本身无关了。有人说,我们应该逃离,有人疑惑是否该留下,我希望能找到自己的答案。带着思考与疑惑,我在我们学校申请开设了一门全校的公选课——《城市发展与生活探索》,我在开课申请里写道:“在社会转型和主流发展观的影响下,以追求GDP为根本目标的城市发

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课程希望能探索和梳理城市中每个人面对大环境可以有的多元化选择,也让大家看到可持续生活的核心价值与可贵之处。”

那么像奥维耶托那种小而慢且美的城市我们身边是否真实存在呢?在我的第一堂课上,我让每个同学画一幅画,主题是“我们儿时的街道”,希望大家尽可能尝试画出在那条街道上你最怀念和珍视的事物。有的同学画下了小时候和伙伴们在大树下捉迷藏,又或者爬树掏鸟窝的场景;有人画儿时在小溪摸鱼虾,而现在小溪早已干涸;有人画的是街口土多店的邻居聚在一块家长里短;有人画的是房前的池塘,房后的森林,直到现在才发现小时候居住过的村庄简直就是现在的土豪小区,而所有那一切似乎已经远离。我们发现每个人最珍视的记忆里都少不了一棵树或者一湾水,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那份人情温暖,如果我们居住在一个有温度、有人情的野性城市里,生活一定会有更多想象。这次课程后来成为三粒豆“家园故事工作坊”的素材。

我也曾经让同学们用一句话形容他们眼里的广州,有人说密密麻麻的建筑,有人说看不到尽头的车龙和马路,有人说是耀眼的霓虹灯光,而这一切无不依靠稀缺的石油资源来维系。那一次课,我们一同观赏了讲述上个世



5. 全称《社区的力量——古巴如何度过石油危机》(The Power of Community: How Cuba Survived Peak Oil)。该片由Faith Morgan 执导,2006年由非营利组织Community Solution发布。纪录片讲述了1990年,古巴经历苏联解体、美国禁运制裁、石油进口量遽降所带来的能源严重短缺的危机,发展出可持续发展的有机农场和都市农园,重新创造出个低耗能的社会系统的历程。

半塔社区的“快乐厨房”

文/图 阳光



编者按

作者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小村庄中，在乡间田野中长大，在加入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农民之子）后接触到情意自然教育¹，深受感动，希望可以在打工社区中实践，“阳光”是她为自己取的自取的自然名（原名谭依雯）。农民之子从2013年开始在半塔村探索社区厨房，阳光体会到社区厨房让大家连接在了一起，正是这种连接，让她感受到了力量，并有信心去探索多元生活的可能性。阳光与《打工者“社区”萌芽之路》一文的作者欧子绮曾一起在半塔村共事，这篇文章可以让从生活的角度进一步解读“社区”、触碰到那些生活在社区里的活泼的人。

1. 香港的自然教育工作者清水（原名刘文清）在参与创办香港自然协会后，开始倡导推行以情意为先的自然教育理念，不以知识、技能主导，而在方法、内容上，着重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关系，培养对天地万物感通的心灵。“情意自然教育”的“情”是情感，“意”是意志。较侧重于先启发人本有的感情与对万事万物关爱之心，也培养人的行动意志，背后更注重是从而发展慈悲与智慧的平衡。这一理念也深受美国著名的自然教育家约瑟夫·康奈尔的启发，约瑟夫在其著作《与孩子共享自然》中提出了“流水学习法”，这正是情意自然教育的核心方法。

半塔，是坐落在北京五环城郊的一个村庄，这里聚集了从全国各地农村来城市挣钱的打工者，他们多半带着整个家庭，选择在这个生活成本相对低廉的社区落脚。因为生活的需要，生活在这里的大人几乎都是早出晚归，很多父母甚至都没有时间安心地给孩子做一顿可口的午餐。社区之中，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互动很少，很多人都把这里当成是一个随时可能被拆迁的“流动社区”，对其情感归属很低。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个社区又很奇特，有着它独特的魅力。每到傍晚时，你会看到整条街来来回回都是人，买菜的、卖菜的，街上有热气腾腾的馒头，空气里有饭菜的味道，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地方、乡土、民族背景的人……这是一个充满着生活与生命力的社区。

而我们，并不仅是来这个村里做公益项目的外来者，而是真真切切的生活在这个社区里的一个个成员，是半塔村的村民。我们机构的伙伴们大家都是生活在一起的，日常的生活都需要大家轮流来做饭，我们发现，每个伙伴对厨房的反应有所差异，有的人从小时候对厨房就已经了如指掌，自然是眼前一亮，兴奋地盘算着可以为大家做出什么样的美食；有的人可能是第一次下厨，自然是紧张忐忑。不管怎么样，当大家沉浸在厨房中时，每个人都很放松，你会发现，厨房成了我们工作之余大家心与心交流的一个空间。当我们有一些新的志愿者或社区的居民来的时候，我们也会邀请他们一起到我们的厨房中一展身手，这个过程中，大家就很自然地建立了连接。我们机构工作人员之间，以及和志愿者、社区居民之间良好的伙伴关系，很多程度上要归功于厨房这个空间呢。厨房，是一个有很多创造与想象的地方，让你在这里面可以找到心灵的价值与归属。

我们的社区厨房，也是在这样一个社区背景里面生长起来。我们希望能够通



合作饭菜香

过厨房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和热爱，并享受动手创造的乐趣和生活的自主感；亦想通过厨房，连接孩子、家庭和我们自己，传递和分享健康的食物及制作过程，建立彼此信任的小网络。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和大家分享节约惜福的品质。社区厨房以面对家长的“特色食物”和孩子的“每周一餐”两个活动来实现。其中“特色食物”侧重家乡与传统食物的学习及制作，通过此连接家庭和发掘社区资源；“每周一餐”侧重孩子自己动手制作食物，培养自主参与厨房劳作的热情。

社区厨房——特色食物：

还记得小时候，每次走亲串友、过节庆祝，大家都会用当地当季的食物，或者是自己家里种植的食材、自己加工的食物来做一桌子饭菜招呼亲友，走时还要把这些食物作为礼物送给亲友带上，以示祝福与关怀，这里面蕴含了真挚的情感。而在社区厨房里，我也感受到小时的那种情意浓浓的氛围。在清明节，我们一起做青稞；到端午节，我们一起包粽子；再到蔬菜多样的初夏，我们一起用各种蔬菜制作腌制菜。

清明节，我分享了湖南老家的一种美食——青稞，它圆润滑腻，有白色、绿色，轻轻一咬，还会吃到枣泥或是花生、芝麻、核桃、红糖的香甜味道。清明节的清晨，大伙一起在刚开春的北方的土地上去寻找艾叶，确实不易。但是大家不懈努力，终于在一块

荒地上找到了冒出不久的片片艾叶。“呀！咋是这样子的啦。以为会长得特别的高哩！这要弄到啥时候啊！”（山西人，得用山西口音说，会觉得另有一番味道）哈哈，想要吃到美食，哪有那么容易。我们快快地努力，终于采摘了不少的艾叶。我们风尘仆仆地从小树林里面走回到社区里面。开动了！家长、孩子们分成好几组开始行动。有清理艾叶的、炒花生和芝麻的、砸核桃的、和面的（糯米粉加入大米粉，比例是5:2）等等分工，大家忙得不亦乐乎。等大伙把所有的事情忙完后，我们就要开始包艾叶饭了。有家长提醒大家，需要把馅包进面皮里面，不要把馅包在外面。有的家长还特别检查了孩子们有没有洗手……等一个个青团做好后，装饰小组的人，又开始一个个地在青团上面点起了红色的枸杞与绿色的葡萄干，好漂亮呀！水沸了，开始上锅了。

有美食大厨韩大哥在，我们就不用担心不熟与技术问题了。因为锅小，所以青团得分拨蒸，韩大哥很有耐心地引导着秩序。韩大哥是我们在这半年里认识的一位社区大哥，他很早就出来打工了，美食手艺也是在北京工作时学会的。在嘈杂、快节奏、环境脏乱的半塔社区，有很多像韩大哥这样的奇人异士。比如精通医理与养生知识的李姐……

李姐，为人直爽，心直口快。每每看到一个来社区里面的人，她都会认真地观察一下，然后很认真地、关怀地跟你说你身体状况以及该注意什么，怎么用草药与饮食调理。如果你对她不了解，会觉得这个人好神奇啊，是不是学过正统的中医？但是如果你跟她有更多的交流，就会发现，其实这些经验都跟她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她的亲戚有很多都是地地道道的乡土医生，从小耳濡目染，所以李姐获得了很多在乡村里与自然共处的智慧与经验。这样的传统生活理念，也塑造了一个关心身体、饮食、健康的李姐，她懂得很多我们常见的植物、食物的

功效。尽管是生活在北京，她把这些从小的经验也带到自己的生活里，并分享给她的小女儿天骄。有一次，我们去她家里走访，看到她家里放了一大包苦麦菜及其他的植物，这些青青的野菜是早上她带着女儿去小树林里采摘的。当问及功效时，天骄跟我们说了一大堆。才6岁不到的天骄，能说医学里面的词汇，让我们自叹不如啊。而我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传承与学习过程，是最快、有效与快乐的了。李姐说，这种苦麦菜是夏天用来消暑、解毒最好的东西。夏天到来，每天吃点点是保养身体的好方法。了解后，对身体的照顾与关怀方式多了一些理解。

这半年里听说了很多有关传统美食与奇人异士的故事，大家彼此互助、分享、一起劳动、创造……而这些人、事、物通过厨房与食物继续发酵，让我们彼此熟悉并对这个社区有一定的归属感。因为大家结成了这样的关系，生活在这里的人不再是一个个的个体，更多的生活可能性在发生。在活动之余，我们也和很多家长聊聊天，从家长的分享中，我能感觉到，家长们之所以能够抽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是因为他们渴望分享、关怀、倾听，并且怀念以前大家一起过节、聊天、动手制作食物的氛围。这些需要，其实是每个人最本真简单的需求，然而在现代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离这样的需求有多远呢？

社区厨房——每周一餐：

在这样的一个社区中，厨房还蕴含着某种情感的期待。晚上，是孩子们最期待与幸福的时候。因为从早到晚，家长们基本在外面忙碌，早餐与午餐孩子们都只能在外面解决，而午餐一般都是面条、凉皮、饼、零食之类的食物（因为这样比较方便经济）。所以晚上开火，妈妈做上自己最爱吃的食物，当然对他们来说是最幸福的事情了。而且也是一天中，一家人能够相聚在一起的时刻。



中秋月饼工作坊合影

社区厨房不仅是家长的一个公共空间，也是孩子们在这里快乐学习与动手的地方。在每周六的上午，我们和社区里的孩子一起做午饭。孩子们从家里带一些食材，看大家汇聚在一起可以做一些什么菜，如果还缺菜，我们就去市集里买一些（半塔村每周二与周六有早市），顺便也捡一些被丢弃但还可以吃的食物。而这个过程，孩子们的参与热情都非常高。回来之后，我们就开始了各种的忙碌：洗菜、切菜、搭灶火、做米饭、煮汤、炒菜、接洗碗水、摆桌子、准备碗筷等。等所有的事情忙完后，我们美味的食物摆上桌，每个人心里与脸上都乐开了花。很多孩子都迫不及待地想尝一尝大家的手艺。然后我们一起轻轻唱起我们的餐前感恩歌：“握手吧！让我们握手吧！如果你想握握手，就请握握手！大地给我们美味的食物，太阳使它们成熟可口。亲爱的太阳，亲爱的大地，感谢你们无私的给予，愿我们享有美味的午餐……感谢所有的辛勤工作的人，愿天下所有的小朋友都有饭吃，请大家慢用”。在这样感恩、惜福的歌声里，我们带着美好的祝愿一起享受美妙的午餐。这样的场面，每周六都会在我们的小院里上演。

这半年里，有过好几十个孩子在这里一起制作与分享午餐。而我们发现，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大孩子还是小一点的孩子，对动手制作食物都特别的感兴趣，我们想，这不仅是因为孩子天生对食物敏感，也因为社区厨房给孩子们很大的空间去探索与创造，并且在这里面找到归属与价值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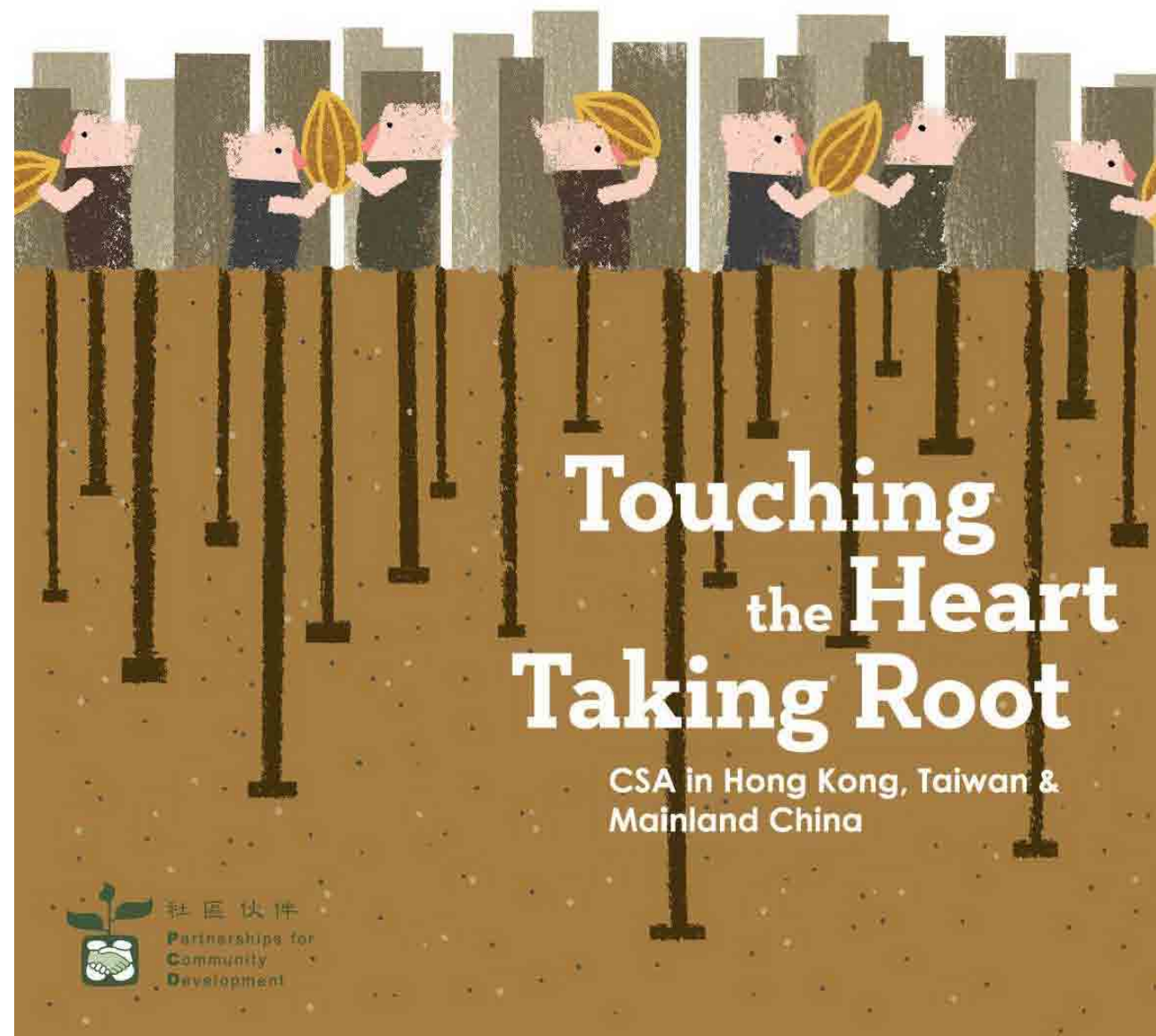
从孩子和家长笑脸和分享中，我们相信，在这个物质发达的社会，也许我们并不富裕，但只要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欢声笑语、友爱互助，我们的生活可以很富足……而我们在思考，作为一个扎根在社区的草根NGO组织（同时我们自己也在生活），我们可以发挥什么样的力量？社区里的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而我们可以和社区里的人一起创造什么？让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可以回到人本真的需要，从而可以对自己、他人、环境都是友好的……写到这里，我感觉自己的价值或者是社区厨房的意义就是让社区里的人了解传统的手工艺，以及食物的健康制作过程，对现在这样的城市来讲，这样的食品、手艺、心态是最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并且这些真真切切的东西才会让我们过上富足的生活。■

《自然农法——我的生存之道》



社区伙伴与中国环境出版社合作刚刚出版了《自然农法——我的生存之道》。这本书呈现了日本自然农业的实践者川口由一先生和“树懒俱乐部”创办人辻信一先生的对话，分享了川口先生过去30多年的人生故事，从自然农法的实践里，探索出自己一套独特的生存之道及人生哲学。川口先生的故事其实已经超越了农业本身，它面向每一个人，告诉我们人之为人的意义，作为生命个体及各自活好自己本分的意义。

该书将会在中国环境出版社合作的书店里发售。此外社区伙伴正在联系更多的平台寄售此书，感兴趣者请留意我们网站上公布的信息。



Touching the Heart, Taking Root: CSA in Hong Kong, Taiwan & Mainland China

在2014年初《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之舞动》一书的基础上，社区伙伴将当中10篇文章翻译成英文并辑入了1篇新文章，结集出版了新书Touching the Heart, Taking Root: CSA in Hong Kong, Taiwan & Mainland China。社区伙伴希望透过此书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分享这地区的实践经验，并藉此促进跨地的交流，让生态农业、社区支持农业能更健康的发展下去。

下载地址: http://www.pcd.org.hk/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Final_pdf_csa_eng_book.pdf

